

军中大医黎介寿

黎介寿院士传记

砥砺风雨的人民院士

成就辉煌的军中大医

一段世界医学史上的美妙传奇

一段中国医学界绝无仅有的佳话

我国肠外瘘治疗的鼻祖

临床营养支持的奠基人

亚洲人同种异体小肠移植的开拓者——黎介寿

目 录

引子

第一章 “黎氏” 传奇

第二章 流金岁月

1. 金童拜寿
2. 快乐童年

第三章 战火流亡

1. 烽火连天，颠沛流离
2.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第四章 结缘医学

1. 不为良相，即为良医
2. 结缘医学，懵懂初开
3. 双双高中，喜入杏园

第五章 初露锋芒

1. 医学人生，扬帆起航
2. 初生牛犊，展露锋芒
3. 战火砥砺，建功沙场

第六章 岁月阴霾

1. 肃反运动，有惊无险
2. 丹心可鉴，愈挫愈勇

第七章 信念之灯

1. 追求光明，重见天日
2. 历尽磨难，终入党门
3. 有国家，才有国人
4. 军队，是成就事业的沃土

第八章 攀登之路

1. 九曲回肠无穷尽

2. 从无到有成大业

第九章 无垠之爱

1. 做医生就要爱病人
2. 人命关天
3. 要做有良知的医生
4. 绝不轻言放弃

第十章 桃李满天

1. 看到学生在成长，就像自己的科学生命在延伸
2. 要为年轻人撑起一把“保护伞”
3. 严师出高徒
4. 好德行比学问更重要

第十一章 笑对选择

一生奔着光明走
——对话黎介寿之一
信念点亮人生

——对话黎介寿之二

第十二章 大家眼里的“大家”

1. 风雨无阻，信念如磐
2. 生命不息，追求不止
3. 醉心桃李，甘为人梯
4. 德医双馨，是为大医

第十三章 真情追忆

1. “兄弟院士”眼里的“院士兄弟”
2. 逝者长已矣，生者当自强

引子

有这样一位跋涉者，他从岳麓山下走来，他从湘江河畔走来，他从橘子洲头走来……

有这样一位奋斗者，他历经风雨沧桑，他在无悔征程中奏响生命激情的乐章，他在传奇岁月里谱写生命绚丽的诗行……

有这样一位攀登者，他的身影频繁闪耀在国际医学舞台上，他的名字永远镌刻在万千患者心坎里……

一位走过九十载风雨历程的人民院士；

一位铸就无数辉煌的军中大医。

一段世界医学史上美妙的传奇；

一段中国医学界绝无仅有的佳话。

我国肠外瘘治疗的鼻祖；

临床营养支持的奠基人；

亚洲人同种异体小肠移植的开拓者；

亚洲人同种异体小肠移植鼻祖——黎介寿。

第一章 “黎氏” 传奇

中国工程院院士，是国家设立的工程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身荣誉。

1996年5月8日，首都北京晴空万里，阳光和煦。这一天，对寻常百姓来说，只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日子，然而在军队医学专家黎鳌、黎介寿、黎磊石三兄弟的心里，阳光的温度直透心底，温暖人心。

因为就在这一天，黎介寿继哥哥黎鳌、弟弟黎磊石之后，也跻身于中国工程院院士的行列。黎氏三兄弟，一门三院士，成为世界医学史上一段佳话。

在中国古代，有大名鼎鼎的“三苏”：苏洵、苏轼、苏辙；有蜚声四海的“三曹”：曹操、曹丕、曹植。现代则有世人皆知的宋氏三姐妹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而如今黎家三院士横空出世，泱泱大中国前无古人。

十年前，同样是一个鲜花怒放的5月。这天午后，全军后勤科技成果授奖大会，在北京解放军总后勤部大礼堂隆重举行。

这次大会的规模、什么领导出席，至今已很少有人能记清，但有三个人的名字，却让人久久难以忘怀：黎鳌、黎介寿、黎磊石。因为他们分别是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烧伤的研究”、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肠痿的治疗与研究”、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肾脏病的研究与防治”的领衔完成者。黎氏三兄弟喜获三大奖，是那段时间中国医学界的美谈。

三兄弟是湖南浏阳人。他们同为医学界泰斗、首批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教授、军事医学界重点学科的带头人。

兄弟三人分别担任烧伤、普通外科、肾脏病三个全军专业组的组长，以及烧伤、普通外科、肾脏病三个全军研究所的所长，都在各自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如今，老大黎鳌、老三黎磊石已驾鹤西去。

黎鳌 1917 年 5 月出生，1999 年 9 月去世，享年 82 岁，原任第三军医大学副校长、西南医院解放军烧伤研究所名誉所长，总后卫生部专家组成员，是我国烧伤医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一代名师，在中国烧伤学界素有“百科全书”美誉。

黎介寿,1924年10月出生,1949年4月参加工作,1963年4月入伍,1996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医药卫生工程学部)。现任南京总医院副院长、全军普通外科研究所所长,专业技术1级、文职特级,医学教育家,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他是国家首批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先后荣膺军队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何梁何利”奖、中国医师奖、全国科技大会奖、江苏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获得军队和省部级以上高等级科技成果奖36项,1994年领衔完成亚洲首例同种异体小肠移植术(此成果入选当年“全国十大医药科技新闻之一”),2003年4月领衔完成亚洲首例肝肠联合移植术,2011年1月领衔完成的“肠功能障碍的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发表科研论文600多篇,担任13卷巨著《手术学全集》总主编,主编著作10部,参编著作31部;荣立一等功1次,二等功2次,2011年2月,他领导的普通外科被南京军区授予“科技创新模范医疗科室”荣誉称号。2013年1月,经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批准,普通外科荣膺“全军科技创新”群体奖。

黎磊石，1926年10月出生，2010年3月去世，享年84岁，原任南京总医院副院长、全军肾脏病研究所所长。1994年当选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医药卫生工程学部）。国际著名肾脏病学家，医学教育家，主任医师，教授。中华肾脏病学会及亚太地区肾脏病学会创始人之一。

黎鳌、黎磊石过世后，遵照他们的遗嘱，骨灰安撒于滚滚长江。而年已九旬的黎介寿，至今仍在长江之滨的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从事着神圣的医学事业，延续着世人为之称颂的“黎氏”传奇。

相关链接——引人注目的院士之家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名录中，父子院士有严济慈和严陆光，田绍武和田中群，谢家荣和谢学锦，杨廷宝和杨士莪等。父女院士有李四光和李林。兄弟院士有冯友兰和冯景兰，汪德昭和汪德熙，冯康和冯端，王守武和王守觉，杨福愉和杨福家，范维唐和范维澄，李德仁和李德毅等。3兄弟院士有黎鳌、黎介寿和黎磊石，梁思

成、梁思永和梁思礼。堂兄妹院士有唐孝威和唐孝炎。夫妻院士有钱三强和何泽慧，张文裕和王承书，曹天钦和谢希德，郑树森和李兰娟，吴仲华和李敏华，周廷冲和黄翠芬，闽思泽和陆婉珍，谷超豪和胡和生，邹承鲁和李林，徐光宪和高小霞，何炳林和陈茹玉，王阳元和杨芙清，许国志和蒋丽金，陈竺和陈赛娟等。

第二章 流金岁月

1. 金童拜寿

1924 年农历九月十三日零点三十分，湖南长沙望麓园四号的老宅里，一声嘹亮的啼哭响彻夜空，向世人宣告了又一个生命的诞生。

“是个男孩儿！”产妇黎周霞苍白的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碰巧的是，黎周霞的生日在农历九月十二日，男婴产出时，刚过她的 33 岁生日。周霞出生于长沙东乡，曾祖父是长沙很有名望的一位商人，可惜祖父是个纨绔子弟，把祖上艰辛创下的家业折腾得一败涂地。那个逐渐衰败的家庭重男轻女，没有让她念书。嫁到浏阳县西乡黎家后，周霞改随丈夫黎溥棠的姓，叫做黎周霞。

望着儿子宽宽的额头，一如星辰般明亮的双眸，恬然静卧在母亲的怀抱里，黎溥棠喜不自禁。在旧社会的中国，哪个男人的心目中，不期望多生几个儿子呢？

看着兴高采烈的丈夫，产后虚弱的黎周霞从被窝中伸出手，拉了拉丈夫的袖子说，“溥棠，别傻站着，给儿子起个名字吧！”

正在这时，只听见“哐”地一声，一个虎头虎脑的男孩，冒冒失失地闯进门来。

这个孩子叫黎鳌，是黎溥棠和黎周霞的大儿子，是年刚上小学二年级。顽皮的黎鳌，昨天晚上放学后破例没有出去玩耍。原指望着母亲生日到了，能吃上为她庆贺的佳肴，没想到，家里十分奇怪，不仅母亲的房门紧紧关闭，门口还莫名奇妙地拉上了一块白帘子。大人们围着灶台忙前忙后，一会儿烧开水，一会儿冲一碗红糖水端进屋里，只是不见心目中佳肴端上桌来。

好奇的黎鳌，看着一屋子人忙忙碌碌，睡意全无，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啊，啊……”突然，屋里传出母亲撕心裂肺的叫喊声。

“出什么事了！”黎鳌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不由分说便闯进了母亲的房间。正沉浸在喜悦中的黎溥棠吓了一跳，见是大儿子黎鳌，不禁又好气又好笑。

黎鳌焦急地问：“我妈怎么了？她生病了！”

奶奶看到大孙子闯进房去，急忙迈着小脚跑进去，拎着黎鳌的耳朵往外拉，笑咪咪地骂道，“小祖宗，快回你屋睡觉吧。没事，你妈又给你生了个弟弟！”

弟弟？黎鳌的眼睛一亮，是啊，自己虽然有过一个弟弟，可很小的时候就病死了。几个妹妹和自己也玩不到一块去，真没劲！这下可好，又有了个弟弟，我要带着他一块去湘江游泳，一块儿去赛马场骑马，一块玩扔石子，一块跟细伢子打架，那多带劲儿！兴奋的黎鳌，和大人一样整夜无眠。

“哇，哇！”婴儿的啼哭声越来越响亮，划破了寂静的夜空，惊飞了沉睡的鸟儿。

黎溥棠抱起儿子，细细看了看他的脸蛋，这孩子长得酷似黎鳌，宽额浓眉，天庭饱满，两眼炯炯有神。他在黎家的孩子中排行第五，该叫什么名字好呢？

望着冥思苦想的丈夫，妻子黎周霞轻轻地吐了一口气：“溥棠，老天在这个时候给了我老五，怕不是让他来给我祝寿的吧？只是这个生日，我过得太痛苦了，也许这辈子都忘不了！”

黎溥棠心头灵光一闪：“为此春酒，以介眉寿”……《诗经》里的这句话让他来了灵感。“春酒”就是用枣或稻子酿的酒，“眉寿”就是高寿的意思。“介”是个通假字，通“借”，相当于祈求的意思。“为此春酒，以介眉寿”，就是酿造好了春酒，为人祈求长寿的意思。这个孩子在妻子刚过完生日的时候出生，分明就是来祝寿的，那么，就叫“介寿”吧！听到“介寿”这个名字，襁褓中的孩子仿佛有了灵性，一下子停止了啼哭。

黎溥棠抱着儿子走出堂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清新的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菊香。

怀抱着儿子，黎溥棠突然想起长沙这个地名的由来。湖南的地名，多与星宿有关。比如，二十八星宿中，娄星和底星相交辉映的地方，就叫做“娄底”，“长沙星”是司人间寿命的，所以又叫“星沙”、“寿沙”。这个儿子出生在长沙，

又在妻子生日刚过那天降临，叫做“介寿”，实在是名至实归。

此时的黎家老五介寿一脸安祥，沉睡在父亲有力的臂弯里。全家人都怀着善良的愿望，希望他能像“长沙星”那样，给家里带来福禄满门的长盛之气。

上世纪之初，中华民族苦难深重，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民主革命先驱禹之谟等致力于兴办教育事业，在 1905 年创办了湖南“惟一学堂”，后更名为广益中学。

解放前的湖南私立广益中学，以慎选良师、严谨治学、质量优良、管理严格而闻名。黎溥棠和哥哥黎赞唐，便在这所中学任教。黎溥棠教英文，黎赞唐教算术。

当时，广益中学的薪俸是按照工作量计算的，教初中一节课银洋八角，教高中一节课银洋一元二角。虽然报酬不高，但黎溥棠和黎赞唐冲着学校的良好校风，一直坚持在那里任教。

1926 年，国民革命军北伐，革命势力高涨。就在这年夏天，英文教员黎溥棠担任了学校校长。连年战争，民不聊

生，当局教育司的教学经费也因战乱难以到位，广益中学当年不得不停止招收新生。

动乱纷争，世道崩坏，并没有影响到黎介寿享受童年的恩宠。母亲黎周霞将黎家祖传的长命锁，套在他的脖子上。按照奶奶的告诫，这个长命锁要戴到 12 岁，以保介寿无病无灾，健康成长。

然而，长命锁并没有给小介寿带来安康。相反，黎介寿生来就体弱多病，动不动就发烧咳嗽。倒是黎鳌，名字里虽然没有“寿”字，却长得高大壮实，虎虎有生气，就像他名字里的那个“鳌”字。

北伐战争愈演愈烈，黎溥棠任广益中学校长后的第二个月，湖南长沙“九七”国耻纪念反帝游行示威爆发了。黎校长亲自带着学生们上街游行。半个月后，也就是 1926 年农历九月二十四日（公历 10 月 26 日），在示威游行的风暴中，橘子洲头蹦出了四块石头，黎周霞又为黎溥棠生下了一个儿子。

黎家的孩子，出生时都有一番说道，黎鳌生在端午节前夜，是出来吃粽子的；黎中生在中秋，是出来吃月饼的；黎

介寿在母亲诞辰次日凌晨降生，是来给母亲祝寿的。而这最小的六子，出生时非年非节，他是来干什么的呢？

也许真有天意，由于连年战乱，当局顾不上办学兴学，黎溥棠和全校教师的薪水好几个月都没有着落，眼看就要“关门歇业”了，恰巧就在小六子呱呱坠地那天，教育局给广益中学的工资拨到位了。

那时候发工资不是发钱，而是发米票。按照当时的计量单位，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石，一石米相当于 120 斤，一张米票就是一石大米。

黎溥棠一下子发到了四张米票，全家人喜气洋洋。在那个兵慌马乱的年月，这四张米票能保证一家人几个月不用忍饥挨饿，这对一个已经揭不开锅的家庭来说，是多大的喜讯啊！望着米票上一个个大写的石字，黎溥棠心头灵光一闪：小六子给全家人带来了好福气，四张米票，每张一石，何不叫他“磊石”，就取“四四如意”（事事如意）之意？

怀抱着刚刚出生的磊石，照顾着满地奔走的介寿，9 岁的黎鳌又时不时地调皮捣乱，黎周霞的生活在这个动乱的岁月里，倒也十分充实。看着这三个或大或小的孩子，她的心

里踌躇满怀，唉，谁知道这三个儿子未来会走上一条怎样的道路呢？

她怎么也没想到，她含辛茹苦教养长大的三个儿子，将是未来拯救万千黎民于病痛和死亡的国医圣手、一代大医。

2. 快乐童年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大人们忙于“革命”和生计，日子过得浑浑噩噩、无所适从，黎介寿的童年却流金似火，无忧无虑。

几个孩子中，最让黎周霞省心的就是老五介寿，这个儿子从小乖巧，就算是趴在地上看蚂蚁打架，也能一看半天。他还有个嗜好，就是喜欢拆拆弄弄，家里的闹钟、蚊香架、马灯等物件，无一不被他“摧毁”得七零八落。刚开始，只是玩命地拆。后来，拆坏了还能再装起来。父母亲也就由着他折腾，毕竟在那个年代，小孩子的玩具很少，拆拆卸卸的，总比玩那些爬高上梯的危险游戏要好。

黎鳌和黎磊石就没那么让人省心了。

黎鳌是个孩子王，他满脑子都是新鲜玩意，街坊邻居那些半大小孩玩的，都是黎鳌玩剩下的。

黎磊石虽然小两岁，小时候却老是欺负黎介寿，哥哥总是谦和地让着这个刁蛮的弟弟，这个习惯一直保持了八十多年。

黎磊石从小爱看书，从四岁识字时开始，就看中国古典的四大名著，也不知道能不能看懂。有一段时间，家里开饭的时候，总是找不到黎鳌，他不是去湘江里游泳，就是在骑马场里骑马。后来，又找不到黎磊石，他准是躲在家里哪个角落里看书。小小的心灵里，被孙悟空、猪八戒、刘备、关羽、张飞等人物和精彩的小说情节占据了，哪里还顾得上吃饭？

找不到黎磊石，黎周霞经常急得团团转。这时，懂事的黎介寿就悄悄走到她身边，“妈，您别喊了，弟弟躲在门后看小说呢！”

黎周霞猛地拽开门，一把将小六子揪了出来，手掌举得高却落得轻，从黎磊石头上亲昵地拂过。磊石装作很疼的样

子，一手捂着头，一手拿着书，眼睛还盯着，一本正经地说：

“妈，您别打扰我，我看完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就吃饭！”

童年，就在黎介寿的拆拆卸卸和黎磊石的小说里，慢慢褪去了欢快的光影。不经意地，黎介寿和黎磊石也长大了。少年黎鳌早就摆脱了童年的顽皮，成长为一个勤奋好学的中学生。黎介寿和黎磊石又像大哥黎鳌那样，疯狂地迷上足球场上的绿茵，迷上了湘江的波浪。

和所有的少年一样，足球是最能发泄体力、展示雄性的运动。黎介寿、黎磊石兄弟俩都喜欢争着踢前锋和中锋的位置，谁也不肯当守门员。

足球场上，黎介寿一脚神传，足球飞快地跑到对方球门下，黎磊石配合哥哥猛地一射，球进啦！兄弟俩像充满活力的小狮子在足球场环游飞奔。黎介寿和黎磊石的童年，就如同飞速旋转的足球，激情四射地释放着青春的热量和光芒。谁说乱世里的孩子就没有快乐和追求？那飞速旋转的足球啊，就是两兄弟对自由和未来的憧憬。

第三章 战火流亡

1. 烽火连天，颠沛流离

父亲黎溥棠在广益中学当校长时，恰逢国家多事之秋，黎校长根本无法专事教学，一面组织学生参加反英示威游行，一面收拾“马日事变”给学校带来的残局，呕心沥血，费尽心机，而立之年，就患上了心脏病。

由于心力交瘁，黎溥棠不得不从校长的位置上病退下来。上海大夏大学的好友、教务长王祉伟来信盛邀他赴沪教学治病，他欣然前往，登上了东去的轮船。

丈夫到上海谋生路去了，黎周霞用柔弱的肩膀艰难地撑着这个家。两个女儿和黎介寿倒挺懂事，特别是黎介寿，不但不惹祸，还经常帮助妈妈做家务活。黎周霞烧得一手好菜，黎介寿经常帮助妈妈打下手，小小年纪，硬是把母亲的烹调手艺继承了下来。

1931年，黎周霞带着几个孩子来到上海打丈夫，一家人在这个繁华的大都市又团聚了。

过了两年，黎溥棠因故到南京任教，黎介寿和弟弟又跟随他来到南京，在游府西街小学念书。

1934年，黎溥棠就任两浙盐务管理局秘书，举家又迁往杭州。

1937年那个炎热的夏天，黎溥棠积劳成疾，郁郁而终。家里的顶梁柱倒了！在国立上海医学院读书的黎鳌赶回杭州，会同母亲黎周霞和几个弟妹，一家人将黎溥棠的遗体由杭州运到上海，又从水路将遗体从上海运往长沙。

在为父奔丧的船上，黎氏三兄弟听到了“卢沟桥事变”的枪声。虽说烈日如炙，可他们心里却如腊月寒霜。父亲走了，三兄弟一瞬间长大了许多。

黎鳌张开双臂，将两个弟弟揽入怀中，深深感受到自己肩上责任的重大。父亲走了，全家人赖以乘凉的大树轰然倒塌。但日子还要过下去。今后，自己就是顶梁柱了。

湖南长沙，黎溥棠的墓前，黎周霞哭得昏天黑地。这一年，黎鳌刚刚20岁，大学才念了两年；黎中16岁，正在念

高中；黎介寿 12 岁，小学刚刚毕业；黎磊石 10 岁，小学还没有念完。

弟弟去世了，哥哥黎赞唐担负起一家遗孤的抚养之责。黎赞唐是个有着侠肝义胆的人，尽管自己家里生有七个孩子，全家九口就指着他一个穷教书匠的微薄薪水过活，但他宁肯自己受穷挨饿，也不愿让弟弟的遗孤们受委屈。“弟妹，孩子们，只要我家还有一口吃的，就决不会饿着你们！”

话说得很实在，但实际上，黎赞唐也是力不从心。两家大大小小近 20 口人，连饭都吃不饱，更别提供这些孩子们念书了。好在广益中学坚持在烽火中办学，黎赞唐当时正在这所中学任教，近水楼台先得月，黎介寿和弟弟得以免费在这里就读。黎介寿虽然比黎磊石大两岁，可是他因病休了一年学，黎磊石又跳了一级，这样，兄弟俩就像双胞胎一样，被分到了一个班里，整天朝夕相处，形影不离。

黎赞唐是广益中学的名师，他对学生向来十分尽心，对弟弟的骨肉更加倾注心血。他教学虽然不是很严厉，却善于循循善诱，水到渠成。在伯父的调教下，黎介寿和弟弟的学习成绩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

在学习上，两兄弟憋着一鼓劲，你追我赶。“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们深深懂得：父亲去世了，伯父勒紧裤腰带供自己吃穿读书。惟有勤奋读书，才能回报伯友的抚育之恩。

正当兄弟俩在茫茫学海中尽情畅游之际，一场灾难从天而降。

1938年，日寇占领湖南的门户岳阳，战火步步逼近长沙。为“不让大好河山落入敌人之手”，国民党政府实行“焦土政策”，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亲自下令，于11月12日国父孙中山生日那天的深夜，在整个长沙城纵火。

夜黑风高，风助火势，长沙城两万人葬身火海，房屋建筑毁于一炬。黎介寿和弟弟亲眼目睹了这场人祸，“文夕大火”将他们赖以读书的广益中学化为灰烬。

无奈之下，黎赞唐带领全家老小，辗转来到湖南长郡中学任教。校长鲁立爱才若渴，广招贤士，听闻黎赞唐执教的广益中学被烧毁，就诚心诚意地聘请他来长郡中学任教。

卢沟桥的炮声接天连地，日寇疯狂进攻，倚仗其空中优势，妄图把中国这块大肥肉一口吞进肚里。在抗日战争的硝

烟里，长郡中学数次搬迁，先后转移到地处乡村的“湘乡会馆”、“蓝田玉茶庄”办学。

从城市到乡村，师生们因陋就简，把戏台改为物理、化学、生物实验室。这里的操场虽然小，却活跃着学校里高水平的篮球队和排球队。

清澈的蓝田河水，是黎介寿和弟弟最好的游泳场所。每年五月到十月，这里是两兄弟的乐园。学习之余，他们在河水里尽情嬉戏，披波斩浪，既锻炼了身体，又锤炼了意志。

2.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父亲英年早逝，在黎介寿心中，埋下了奋发成才振兴中华的种子，尽管他对未来将选择怎样的路依然十分困惑。靠知识改变命运，改变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这种信念激励着他勤奋攻读，不及其余。

夜阑寂静，劳作了一天的人们纷纷入睡，黎介寿和弟弟趴在书桌上，就着昏暗的菜油灯光做作业。由于伯父一家负担太重，他们买不起作业本，只能用毛边纸代替。兄弟俩是

同班同学，尽管平时关系十分融洽，但遇到学习上的问题，总是争得面红耳赤，直到彻底弄懂为止。

当时，学生上学的费用很低，但即便如此，黎介寿兄弟俩还是缴不起学费。得知学校规定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可以免去学杂费，兄弟俩欢欣鼓舞。他们宁愿付出比一般家庭孩子多得多的努力，也要使自己的成绩名列前茅，以换取免费入学的机会。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机会对于自己来说，太宝贵了。看着伯父黎赞唐日益苍老的面容、由于操劳佝偻着的腰，他们没有理由放松自己的学习。

在长郡中学，黎介寿和弟弟从初二读到高中。1941年，他们又回到父亲曾经任教的广益中学。无论是在长郡中学，还是在广益中学，教学条件都十分艰苦，很多学生放弃了奔波，选择在乱世中浑浑噩噩随波逐流，但兄弟俩没有选择这样的活法。当学生就要做最好的学生，这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冬天来了，吃午饭的时候，人们经常在操场边看到两个身影，那就是黎介寿、黎磊石兄弟俩。在篮球架下面，他们拿出一个馒头，掰成两半，一人一半，就着白开水匆匆吃下，然后，两兄弟开始出题互考。艰难困苦，压不倒不服输的人。

他们的身体虽然单薄，但知识的力量使其充实起来，并不畏惧来自各个方面的困难。

长郡中学英才辈出，不仅拥有徐特立、王季范、鲁立刚、黎赞唐等一代名师，也涌现出任弼时、李富春、李立三、肖劲光、陈赓、甘泗淇、曾三等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还培养出沈其震、张孝骞等专家学者。

在 60 多年后的南京，兄弟俩仍然对广益中学和长郡中学这两所有着光荣传统的学校记忆犹新。在这里，他们不仅学到了扎实的基础知识，而且学到了做人的准则，收获了人生中第一笔攻坚克难的精神财富。风雨飘摇之中，烽火弥漫之际，他们在艰难的日子里，吮吸着知识的琼浆，追求着人生的理想。

伯父黎赞唐家的日子，终于入不敷出。在那样兵荒马乱的年代，靠一个经常拿不到工资的教师来养活十几张嘴，困难可想而知。再苦再累，仁厚的伯父拼死撑起抚育遗孤的责任，黎介寿一家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为了补贴家用，黎周霞承接了为当地富户浆洗衣物的工作，收入不高但也算是为这个家尽了一点力。懂事的黎中，

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广西大学，她勤工俭学养活自己，终于因为交不起学费而辍学。万般无奈，她到学校所在地广西桂林邮局找了份职员的差事，挣点零花钱全都交给母亲。

1942年，伯父黎赞唐那点微薄的薪水，实在供养不起弟弟一家了。为了不让黎赞唐为难，正在读高二的黎介寿和弟弟主动辍学了，与母亲黎周霞一起，来了广西桂林投奔二姐黎中。

抗战的烽烟，中断了兄弟俩的小学学业；贫穷的生活，又迫使兄弟俩一起高中辍学。为了生计，他们在桂林当过押运员，成天跟车押运货物；当过推销员，整天推销钢笔、复写纸等文具；当过勤杂工，每天马不停蹄地打扫卫生。

但即便生活如此困苦，他们仍然没有放下书本。在飞驰的卡车上，在人来人往的闹市口，在肮脏的马路边，兄弟俩一边为生计打拼，一边为未来苦读，日子就这样一天天捱了过去。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生活磨砺出锋利的石头。黎介寿坚信，机会总是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积贫积弱的中国，不

可能永远沉睡下去。终将有一天，他和弟弟会从蛰伏中飞腾起来，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

第四章 结缘医学

60 多年后，即便面对共和国院士的头衔，黎介寿仍然坦言，学医不是自己的初衷。黎介寿喜欢理工科，学医是他在痛苦的年代里一种无奈的选择。而一旦有所选择，他就朝着既定的目标，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1. 不为良相，即为良医

今天，人们热议起黎家三院士，总是愿意去揣测黎家人有什么优秀的遗传基因。其实，如果说真的有什么遗传基因，那么黎家的遗传基因就是读书和教书。

黎家是一个教育世家，黎氏三兄弟的曾祖父黎星渠是个教书匠，伯父黎赞唐、父亲黎溥棠是个教书匠；黎鳌、黎介寿、黎磊石最愿意让人称呼的，不是医学大家，而是医学教育家；黎鳌的女儿海蒂、海芪是教书匠，他的外孙、外孙女仍然是教书匠。

他们这一大家子，根本就没有医学的遗传。

少年的黎介寿钟情于理工科。这也难怪，理工科这个美丽的维纳斯，似乎是天下男儿青睐的女神。

他的理想是去学机械，孩提时，他就是拆拆卸卸的高手，小小的心灵中，埋下了渴望成为工程师的种子。黎磊石的梦想更夸张，他憧憬着有朝一日，他能去造飞机，在蓝天上放飞梦想。

1942年，黎介寿和弟弟在广西桂林参加了高考，填报志愿时，哥俩犯了难。按照他俩当时的学习成绩，报考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都绰绰有余。但两所大学四根金条的昂贵学费，让他们望而却步。

既要免收学费，还要能提供免费饭费，这样的大学是才哥俩的首选。选来选去，黎介寿和弟弟如愿以偿，分别考上了机械化学校和东方语言学校。

黎氏三兄弟注定与长江有缘。黎鳌考上了南京中央大学，在长江之尾；而黎介寿和弟弟报考的学校又都在重庆，在长江之头。

考上了大学，学费是免掉了，但路费却免不了。从广西桂林到四川重庆，黎介寿兄弟俩实在承受不了昂贵的路费，只好写信向大哥黎鳌求助。

远在南昌国立中正医学院工作的黎鳌看了弟弟的信，沉思良久，回信给黎介寿和黎磊石。

他在信中说，五弟、六弟，考上大学是人生大事，我由衷地为你们高兴。但我们都是没有父亲的孩子，选择职业不能光凭自己的兴趣，要充分考虑经济实力和就业出路。学了理工科和文科，将来工作到哪里落实？在如今这个世道，又如何去发展？思量再三，我觉得不如学医实在，一来可直接服务于百姓，二来也可以解决生计问题。

在信中，黎鳌希望两个弟弟能先到自己工作的医院，找一份练习生的工作，管吃管住，边工作边复习，明年再报考中正医学院。另外，他也婉转地告诉两个弟弟，从桂林到重庆路途太远，路费他也实在是爱莫能助，而从桂林到南昌则花费不多，自己还可以想办法筹集。

黎介寿十分理解大哥的想法。是啊，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够饱读诗书已属不易，哪还有穷孩子随心所欲报考大学的权利？

不为良相，即为良医。兄弟俩这样安慰着自己，愉快地采纳了大哥的建议，告别母亲和二姐，一路“搭黄鱼”（搭人家的顺车）向南昌赶去。

至此，黎介寿、黎磊石兄弟俩，沿着大哥黎鳌的足迹，也走了漫漫医学之路。

2. 结缘医学，懵懂初开

为了“搭黄鱼”，黎介寿和弟弟一路上受了无数的冷眼，挨了无数的训斥，三天后，终于在南昌见到了大哥黎鳌。

在这三天里，黎鳌也马不停蹄地帮助两个弟弟在国立中正医学院“铺路”。

他找到校长王子珩，恳求为两个弟弟在医学院找一份糊口的工作。“就当练习生，不用发工资，只要给口饭吃、给张铺睡就行”。

对于黎鳌的要求，王校长一口答应。不用发工资就收了两个练习生，还因此卖给了得力干将一个面子，这样的顺水人情，何乐而不为？

黎介寿和弟弟到南昌后的第二天，就穿上了白大褂，到门诊部检验科当起了练习生。所谓练习生，就相当于现在检验科的化验员，每天洗试管、收标本，在显微镜下观察血、尿、大便、痰等，脏、累、重活，连实习生都不愿意干的活，他们干。

兄弟俩的到来，让当时科里的化验技师喜出望外，过去只有他一个人干这些活，现在好了，他可以完全甩开这摊事，做自己喜欢又一直想做的科研工作，真是“想睡觉了就有人送来枕头”。

黎介寿和弟弟虽然年纪不大，但什么苦都吃过，什么苦都能吃，干这些粗活，对他们来说，就是小菜一碟。

一天，兄弟俩找到化验技师，大胆表示想学一学如何看显微镜。技师冲着他俩工作的劲头，爽快地答应了兄弟俩的请求。很快，他俩就学会了熟练使用显微镜。

练习生的生活极其清苦，说是管吃，可吃的是清汤寡水，顿顿不熬饥；说是管住，可由于战乱，医学院四处搬迁，兄弟俩只能就便睡在门诊部。而这个门诊部，就设在一个破旧的祠堂里，四面漏风，夏天蚊子嗡嗡，冬天寒风凛冽。

生活就是一锅滚水，鸡蛋煮进去变得像石头一样硬邦邦；只有茶叶，在滚水里煮，慢慢舒展开来，最后变成可口的香茶。黎介寿深深懂得，目前的生活，已经是自己能够争取来的最好的工作了。尽管肚子里没有一点油水，身上没有一点暖意，他和弟弟仍然高兴地徜徉在知识的海洋里，精神的力量，让他们的学识和内心世界不断丰富起来。

时光如白驹过隙，一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黎介寿兄弟俩成了优秀的练习生，原本就好的功课更加烂熟于心。

这一年，中正医学院的考场就设在江西永新县附近的界化垅，离医学院很远。临行前，黎鳌特意走街串巷，买来了猪肉，做了一碗红烧肉，为两个弟弟壮行。在那个兵荒马乱、物资匮乏的年代，有碗红烧肉吃，是什么样的概念啊！黎介寿的脑海中，早已没有了红烧肉的记忆。

看着两个弟弟大口吃着红烧肉，大哥黎鳌就像一个慈祥的父亲，“好好考，不要慌，不要提前交卷，做完要复查”。听着大哥那些老生常谈的话，黎介寿眼里噙着泪，一个劲地点头。

3. 双双高中，喜入杏园

在地中海东岸的沙漠中生长着一种蒲公英，它不按季节舒展自己的生命，如果没有雨，它们一生一世都不开花。但只要有一场小雨，不论这场雨什么时候落下，它们都会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迅速开出自己的花朵，并在雨水被蒸发干之前，做完结子、传播等所有的事情。

以色列人把这种蒲公英送给拥有智慧而又有志气的人。他们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发展自己、提升自己的机会就像沙漠里的雨一样少，但只要有蒲公英的品性，在机会来临的时候，勇敢地抓住，大胆去做事，同样就成为一个成功的人。

黎介寿就想成为这样的人。事实证明，他就是这样的人。

目送着两个弟弟消失在自己的视线，走向属于他们的人生考场，黎鳌的心里很踏实。他充分相信，弟弟们一定会成功。他始终认为，不管是在哪条路上，只要持之以恒地走下去，一定会得到承认和回报。

“黎教员，有你的信件！”一个月之后，喜报如期而至，打开信封，只见两张红艳艳的录取通知书，就像两个弟弟的笑脸一样，展现在黎鳌的面前。他兴奋地拥抱了妻子汪素娟，收到这个喜讯，真比自己当年考上医学院还要高兴。

1942年8月，黎介寿和弟弟终于如愿以偿，考取了管饭、管吃又不用交学费的国立中正医学院。

大学的门是跨进了，可是兄弟俩的心却不在医学上。黎介寿还在幻想着当工程师，黎磊石则做着造飞机的美梦。兄弟俩对医学兴趣不高，生物、解剖、伤寒论、本草纲目……学得人直发晕。

黎鳌得知两个弟弟学习成绩平平，心里很急。他板起面孔，苦口婆心地对他们说：“医学这门学科，是哭着进去，笑着出来。很多名人都是学医出身，孙中山、鲁迅都是先学的医学。不为良相，即为良医。我们既然当不了良相，为什

么不好好当一个良医呢？医学院条件这么好，免收学费还管饭管住，但这些条件不养懒汉，你们这届学生的淘汰率是很高的，能不能吃得这碗饭，还要看你们的学习成绩！”话糙理不糙。黎鳌的话没有一句大道理，却深深打动了两个弟弟的心。

当时，作为有着国家级水平的国立中正医学院，师资力量强、教学质量高，学生的英语课全部由外国传教士来教，上医学课也全部用英语教学，黎介寿和弟弟在这里潜心研读，接受了正规的医学教育。

大学二年级，功课开始丰富起来，解剖课和组织胚胎学课就是个时候开始的。兄弟俩脑子里装满了骨骼、肌肉、血管、神经的位置和走向，连做梦都是在解剖尸体。

老师讲理论，下午就让学生到实验室做动物实验。黎介寿和弟弟从不用实验室的动物，他们总是结伴出去逮青蛙、逮兔子，逮回来一道做实验。黎介寿从小就喜欢拆拆卸卸，动手能力极强，做起动物标本来又快又好；黎磊石文字功底好，写起实验报告来一套一套的，兄弟俩合作起来，总是受到老师表扬。

表扬一多，兴趣就来了。有时候，大学生也跟小学生一样。

更让兄弟俩高兴的是，在临床课期间，他们的外科学课教员，就是大哥黎鳌。跟别的同学一起喊着“黎教员好！”兄弟俩特别得劲儿。

这种得劲儿，很快就被大哥的丰富学识所替代。看着大哥在讲台讲得条理清晰、头头是道，黎介寿佩服之至。黎鳌讲课很少看教案，却从来没有卡过壳，仿佛知识就装在他的脑子里。作为同胞兄弟，黎介寿和弟弟不仅可以在课堂上聆听到大哥的精彩讲课，回到家里还能单独开小灶，他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医学的无穷魅力。

黎介寿兄弟俩的心性彻底变了，当命运之神确定了自己的人生坐标后，他们变得义无反顾。人体的奥秘千变万化，发病机病也瞬息万变，有很多领域，现代的人还远远没有涉猎，即便穷尽一生也难以通晓。从这个角度看，在医学上学贯中西并不比亲手造一架飞机更简单。

行动上的自觉，来源于信念上的坚定。黎介寿兄弟俩终于成了医学女神的忠实追随者。热爱是最好的老师，这种认

可和追随，使得兄弟俩的学习成绩就像升温了的水银柱，呼呼往上升。

最终决定莘莘学子命运的，还是国立中正医学院的应试教育。医学院实行严格的淘汰制，一门功课不及格就要补考，补考不及格就要留级，而且只允许留一次级。如果有两门功课不及格，那就只有退学。家境好的学生不怕淘汰，反正只是来医学院镀个金，可黎介寿兄弟俩不一样，只有一条路，狭路相逢勇者胜！

各门考试兵不血刃却危机四伏，黎介寿和黎磊石过五关斩六将，硬是从书山文海中杀出重围，以优异的成绩顺利毕业。回望自己的大学之路，兄弟俩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入学时班里共有 130 个同学，通过激烈地优胜劣汰，有 101 个学生被淘汰出局，到了毕业时只剩下了 29 个。

想当初，要不时及时调整心态，奋起直追，两颗未来的医学巨星恐怕就要遽然而落了。

第五章 初露锋芒

1. 医学人生，扬帆起航

1948年6月28日，24岁的黎介寿结束了5年的大学生活，来到了南京中央医院做实习医生。

中央医院，顾名思义，是国民政府政要看病的地方，地位显赫，技术一流。这一年，医院在全国招收40名实习生，黎介寿兄弟俩是以中正医学院名列前茅的成绩考取的。除了兄弟俩，还有北京协和医学校、燕京大学和金陵大学等学校的学生尖子。

站在中央医院门口，面对“井”字形的门诊大楼，黎介寿兄弟俩的心情特别畅快，人生的航船将从这里起航。

走进人事科，里面坐着一位中年秘书，兄弟俩虔诚地将自己和弟弟的录取通知书递了过去。

人事秘书抬头看看，俩人身材虽然不高，但国字脸，大眼睛，高鼻梁，长得眉清目秀、一表人才。再看看录取通知书上的名字，疑惑地问：“你们是不是兄弟俩？”

黎介寿回答：“是的，我是哥哥，他是弟弟。”

人事秘书赞叹地说：“一家出了两个大学生，而且都分到了中央医院，不简单啊！”

黎介寿自豪地说：“我家里有四个大学生，除了我们俩，我的哥哥和二姐也是大学生。”

“啊！”人事秘书一脸惊讶。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很多人都吃不上饭，哪还有机会读书，而黎家四个孩子不仅读了书，而且还都考上了大学。他又问：“你们的父母是干什么的？”黎介寿说：“我的父亲去世了，他在世的时候做过老师。母亲是普通的家庭妇女。”

人事秘书说：“那你们家庭条件并不好啊？”黎磊石自嘲地说：“是的。这些年，我们兄弟俩一直在流浪。”

也许是同情，也许是好感，登记后，人事秘书说：“你们去外科实习吧。”学医的都想当外科医生，兄弟俩相视一笑。毕竟年轻，心里有什么想法都挂在脸上。其实，这样的安排再正常不过了，实习医生轮流到各个科实习是医院的规定，他们被分到外科，只不过占了一点先机而已，三个月后他们又会被轮流到其它科实习。

但是，这个时候的黎介寿兄弟俩，对自己的前途充满着期待，全身都是激情，像火一样，不点都会燃的。

医院坐落在绿树掩映的中山东路，四层高的病房大楼红砖青瓦，卓尔不群，它是由著名建筑学家梁廷宝设计，1929年由国民政府和爱国华侨胡文虎、胡文豹出资修建的，是中国第一个国立西医院。医院设有外科、内科、妇产科等 8 个科，共有 800 多名医护人员，其中专家 40 多位。外科是医院的大科，由普通外科、胸外科、泌尿外科、骨科四个科室组成，主任是许殿乙。

黎介寿和黎磊石走进科主任办公室，许主任正在低头看病历，他们恭敬地站在主任面前，黎介寿说：“我俩是今年来的实习生。”许主任抬头看了看他俩，客气地说：“欢迎你们！我们这里正需要大学生。你们是人才，好好干吧。”他们就这样成为中央医院的人了。

接下来的事情，让黎介寿兄弟俩有点意外。负责安顿他俩的医生把他们带到住处，只见一个大铁皮房，两米来高，又旧又破，里面放着七八张小铁床。这是抗日战争时期美国

难民署援建中国的难民房。这位医生说：“医院没有钱给医护人员盖房子，只能让你们受点委屈了。”

正是盛夏时节，南京有“四大火炉”之称，兄弟俩走进房内，好家伙，真像火炉一样，起码也有 40 多度。到了晚上，兄弟俩想睡觉，可用手一抹凉席，滚烫滚烫的，实在是睡不下去。

这时，一位好心人看他俩在铁皮房外转了一圈又一圈，就建议道：病房大楼的楼顶凉快，可以到那儿睡。黎介寿和弟弟抱着一床凉席来到医院的房顶，还没有躺下，蚊子就嗡嗡地飞了过来。哥俩手脚并用，想驱赶它们，可蚊子哪会听他们的？这天夜晚，他们几乎和蚊子战斗了一夜。

对此，弟弟黎磊石牢骚满腹，“一个堂堂的中央医院，医务人员竟然还睡难民房。”当时，国民党一心跟共产党打仗，那有精力搞建设，总统府里的高官们，都在为家小的吃喝和出路发愁，中央医院又能怎样？

尽管一晚上没有睡，第二天早上 7 点不到，黎介寿和弟弟就进了病房。兄弟俩都是苦出身的人，不怕吃苦，就怕没有苦可吃。

从这以后，黎介寿兄弟俩每天早上 6 点半，就准时来到病房，一直干到晚上 7 点才下班。他们知道，这里的实习对于自己来说太重要了。干得好，就能留下来。这是全国最好的大医院，哪个做医生的不希望在这里发展，除非他的脑子进水了。

2. 初生牛犊，展露锋芒

时光在忙忙碌碌中就来到了 1949 年，正当黎介寿兄弟俩在南京中央医院实习时，南京解放了。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看到国民党党旗从总统府的旗杆上降落，百姓们高兴得心花怒放，他们敲锣打鼓载歌载舞欢庆南京的解放。

看到这一切，黎介寿兄弟俩隐约地感觉到，自己新的机遇又来临了。

大嫂汪素娟的一句话说得不错，“三岁看小，七岁看老”。她早就说过，五弟黎介寿心灵手巧，将来一定会当外科医生，而六弟黎磊石极其内秀，当内科医生会更出色。

果然不出所料，黎介寿工作的认真劲儿，和他的动手能力，在实习中受到了耳鼻喉科主任的亲睐，他一门心思想把黎介寿留在科里发展。

而对病人热情周到、对工作一丝不苟且文思敏捷、基础扎实的黎介寿，被科主任视为宝贝。

可黎介寿觉得手术室对他更具有诱惑力，他渴望着能够站在手术台上，亲自为病人做外科手术，普通外科才是自己最憧憬的科室。

1949年7月1日，黎介寿兄弟俩以优异的成绩，从国立中正医学院毕业了，黎介寿如愿分到了南京中央医院外科，当了一名外科住院医师。

黎介寿和黎磊石这对苦难兄弟的发展轨迹，可谓是惊人的相似。他们相差两岁，却像双胞胎似的，从初一就在一个班里念书，一直到高中、大学，都是同班同学。

这回大学毕业，兄弟俩又一起分在南京中央医院。由于他们都是单身未婚，又一同分到医护楼的同一间宿舍、同一架“牛窝床”，老实的黎介寿睡下铺，调皮的黎磊石睡上铺。

年轻的黎介寿兄弟俩，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每天早晨六点一刻，他们准时起床，六点半到病房，黎介寿到普通外科给病人换药，黎磊石到内科查看病人，在主治医生上班之前，他们已经为病人处理好了一切。

每天晚上的夜查房，他们从来都不会错过。其他年轻的医生都去看电影、谈恋爱了，他们还要来到病房，认真地观察每个患者的病情。

由于在南京没有家，兄弟俩基本上不过星期天和节假日，整天窝在病房里。他们似乎养成了习惯，一天不看病人就吃不香睡不着，只有在查看过病人后才能踏实地睡觉。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25岁的黎介寿，成了医院大外科实力最强的住院医生；而23岁的黎磊石，也成为内科最拔尖的住院医生。在生活中，他们是一对亲兄弟；而在工作上，他们铆着劲、比着干，争先恐后。

这样的工作状态，一直延续到两兄弟耄耋之年。同为工程院的资深院士，老哥俩只要看到彼此的进步，就会奋起直追，比学赶超，成就了一段黎氏双星、璀璨杏林的佳话。

3. 战火砥砺，建功沙场

1949年冬天，解放浙江沿海岛屿的战斗打响了，黎磊石还不是军人，却作为医疗骨干，随医疗组参加了解放宁波和舟山群岛的战斗。他在前线出生入死，救死扶伤，人称“黎大胆”。

1951年底，黎磊石结束了抗美援朝医疗队的工作，回到了南京华东军区医院，并迅速找到了自己的工作坐标，在内科岗位上做出了突出的成绩。1952年，26岁的黎磊石被提拔为医院最年轻的主治医生。

黎氏兄弟注定要在同一个战场上相逢，只是时间发生了错位。战场还是那个战场，黎磊石回到了医院，黎介寿又打起背包，作为第三批华东军区医院医疗队副队长，来到了长春后方医院，负责治疗朝鲜战场运送来的伤员。

在这期间，黎介寿两次入朝，一次是去前线建立血库，一次是去战场救治伤员。外伤伤员，占了战创伤伤员的大多数。黎介寿精湛的外科技术，在这里有着极大的用武之地。

当看到战士们穿着薄薄的棉衣在极度严寒中浴血奋战，看到有的战士脚趾头冻掉了仍然不下火线，不是军人、不是党员的黎介寿，深深被志愿军战士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所感染。

时至今日，志愿军战士“小黑脸”的模样仍留在黎介寿脑海中。“小黑脸”二十出头，山东人，负伤送到战地医院没几天，就嚷着要重返前线。一天，黎介寿惊讶地发现“小黑脸”在尿血，原来他的膀胱受伤出血，怕不能再到前线去，就一直隐瞒着。经过治疗，“小黑脸”又投入战斗。几个月后，一名从前线下来的伤员说，他和“小黑脸”是一个连的，在一次阻击战中，遭遇美军飞机轰炸，连里大部分战友牺牲了，“小黑脸”的尸骨都没有找全。

那一刻，黎介寿握手术刀的手颤抖了。他深深感到，这是一群可以为追求信仰而献出生命的人，战斗在这支队伍中，不会有错。在零下 40℃的严寒中，黎介寿夜以继日地救治伤员，荣立战功。

1953 年，黎介寿回到南京华东军区医院，担任外科总住院医师。他的工作大胆泼辣又干练沉稳，既不锋芒毕露，

又显得有板有眼。1954年8月，他正式担任医院普通外科主治医师。

第六章 岁月阴霾

1. 肃反运动，有惊无险

在人民军队的医院里工作，黎介寿曾经有过一段日子是提心吊胆度过的。作为原国民政府中央医院的医务人员，人民解放军的接管人员，他们深深为自己在旧政府治下医院工作的经历而担忧。

现在想起来，当初他和弟弟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认识也只是初步的。

更令兄弟俩担心的是，他俩还有过一段“不光彩”的历史。

1943年秋天，考上中正医学院的第一个周末，高黎介寿兄弟俩一届的同学兼同乡贺高秋和李隆刚，神秘兮兮地找到他俩。

“学校里的大部分学生都是‘三青团’，你们也应该加入。”“三青团”是什么？就是国民党的助手——“三民主义青年团”。这在当年可是个时髦的进步组织。

贺高秋、李隆刚进一步劝说，“三青团”是爱国抗日的团体，你们要积极追求政治上的进步，就必须加入进来。

当时全国正掀起军民同心抗日的高潮，哪个年轻人不爱国？哪个年轻人不是一腔热血？于是，在两个同学兼老乡的介绍下，黎介寿兄弟俩就加入了“三青团”。

1944年，医学院由江西永新迁到唐江，学生分散居住，黎介寿兄弟俩加入“三青团”筹备处，任干事会干事。在这期间，他们参加过“三青团”的一些活动，比如，参加话剧《寄生草》的演出，到庐山参加团夏令营活动，接受蒋介石、蒋经国和陈诚的训话。当时，他哪里知道“三青团”会是这样，如果知道，打死也不会参加。唉，人生就是有陷阱，一不小心，一只脚就踩进去了。

这些“不光彩”的过去，一直埋藏在兄弟俩的内心深处。真是怕什么就来什么，1956年，肃反运动开始了，组织上要求每个人都要把自己在旧社会干过的事写出来，尤其要把参加过什么组织写清楚。这让黎介寿兄弟俩很是为难，甚至忐忑不安起来。

加入反动组织，这可不是一般的问题，性质十分严重。本来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再加上“三青团”历史，那进步就更没有戏了。

是写还是不写？那些天，黎介寿兄弟俩白天吃饭不香，晚上彻夜难眠，工作也没有劲头。苦思冥想了几几天，兄弟俩想明白了：自己又没有做过对不起共产党的事，有什么好隐瞒的呢？大不了也就是当时政治上不够成熟。

兄弟俩从铺板上一跃而起，一口气写了 20 多张纸，把自己的过去像竹筒倒豆子一样倒了出来。

原先人们只把黎介寿兄弟俩当作普通的医生，没想到他们还是“三青团”的骨干分子，这就不得了了。

“他们到底有没有干过什么坏事？他们是不是隐藏在医院里的特务？”

本着“既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的原则，医院立即派出 4 个调查组，分别到福州、上海、广州、南昌等地调查黎介寿兄弟俩的历史。

一个多月下来，终于把他们的情況搞清楚。黎介寿兄弟俩确实曾经是“三青团”骨干分子，但他们从来没有做

过反人民、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事。离开中正医学院后，他们就同“三青团”断绝了来往。

谢天谢地，历史问题总算搞清楚了。鉴于兄弟俩认错态度比较好，最后组织上把他们定性为“反动组织的骨干分子”，这与“反革命分子”是有较大区别的。

尽管不再受到追究和处罚，可在当时，黎介寿兄弟俩的政治前途也是相当黯淡的，但他们不怨天不怨地，只怪自己稀里糊涂做错了事。

是啊！当个人命运不济的时候，不能把所有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在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爬起来。黎介寿和黎磊石暗暗下了决心：要用行动来洗刷自己的污点，证明自己对党的忠心，对人民的热爱。他们为病人服务的思想更强烈了，对医学技术的追求也更强烈了。

不久后，他们的工作热情和医术才干得到了医院领导的认可和肯定，先后被提升为外科副主任、内科副主任。

这个结果，出乎黎介寿兄弟俩意料之外，又在他们真诚的期盼之中。“共产党胸怀宽广，我们唯有好好工作，服务人民，才能塑造全新的自我。”

1963年4月，黎介寿、黎磊石融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队伍，成了光荣的人民军医。

2. 丹心可鉴，愈挫愈勇

1966年5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全面暴发，“斗、批、改”运动在全国展开。在国家层面，政治上长期动乱，民主和法制被肆意践踏，科学文化教育事业被严重摧残，历史文化遗产遭到巨大破坏。

不幸的是，黎鳌、黎介寿、黎磊石三位医学专家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和弟弟黎磊石不一样，黎介寿对党忠诚，热爱事业，关心病人，加上性情温和、与人为善，又有什么“命”可“革”的呢？

“既然是‘三青团’分子，就不可能没有问题。”反动派存心挑刺，“黎介寿一天到晚看外国资料，这是为出国当叛徒打基础啊！”

更可笑的是，还有人在他和弟弟的名字上做起了文章。黎介寿、黎磊石，各取一个字，合起来就是“介石”。显然，这哥俩崇拜蒋介石，多反动啊！

欲治其罪，何患无词？真是何其搞笑，就连当年父亲黎溥棠起的名字，难道也有投敌反共的先见之明？

无奈之下，黎介寿也被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撤销了科室副主任职务，苦心经营的实验室也被人砸了。

正当有人继续准备对黎介寿下手时，一个病人救了他。

这个病人是谁？军区副参谋长，叫邓士俊。一次，他在外出执行任务时，乘坐的小车撞到南京中山门外的一颗大树上，车翻人伤，腹部外伤并发肠外瘘！军区许世友司令员得知情况后，要求军区医院派出最好的医生进行救治。最好的医生是谁？人们自然想到了外科医生黎介寿。

许司令员对黎介寿也是十分赞赏。一次，他生病住进了军区医院外科，因为情况危急，当班医生黎介寿诊断后就要施治，正要给首长打针，却被随行的工作人员拦住了：“这针打下去，万一出了事怎么办？”还真是，给首长看病有一

条不成文的规定：必须将治疗方案请示相关部门获准后才能救治。

黎介寿不答应了：“首长痛成这个样子，怎么等得起呢？你们这样做，是对首长的身体不负责任。”他理直气壮地说：“我是医生，出了事我负责！”

许司令员听到争论后，觉得黎介寿讲得有道理，就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患者看病不听医生的听谁的？就按他说的办。”

一针下去，许司令员疼痛立解。

无独有偶，还有一次，国防部长粟裕大将来南京视察，晚上突然肚子剧烈地疼起来。黎介寿受命紧急出诊，认为是心脏病导致的肠痉挛，毫不犹豫就要施治，工作人员也是不同意，说要等其他医生来了一道会诊后再行治疗。将军痛成这样，哪能再等？黎介寿坚持立即给将军打了一针。等别的医生赶来时，将军已经不痛了。

次日，北京、上海的专家来会诊，都称赞黎介寿做得好。后来，粟裕一见到南京来人就说：你们那个叫黎介寿的

年轻外科医生了不得，很果断。这些年，从来没有哪个医生敢这么快给我打针的。

这一次，由黎介寿出马，自然深得信任。

许司令员明确指示：“成立邓副参谋长救治小组，黎介寿当负责人，任何人不能干扰这个治疗小组！”

在那个动乱的年代，这条指示就等于给即将挨批斗的黎介寿发了一个“特赦令”，从此，他就安安心心在治疗小组治病了。

邓副参谋长的病前前后后治了一年多，终于治愈。病人和家属高兴，许世友司令员高兴，黎介寿更高兴。黎介寿高兴的，不仅仅是治好这个病人，而是在肠痿治疗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突破，达到了国内最高水平。可是，在总结表彰会上，因为是“臭老九”、“反动学术权威”，这件好事他连边都没有沾上，不仅没有受到表彰，还说他是“错误医疗路线”的代表。这不是偷天换日吗？黎介寿实在受不了了，悄悄离开了会场。

也许是为了排泄心中的郁闷，也许是怀念童年的生活，他信步来到了游府西街小学。游府西街是一条与中山路平行

的小街，三四米宽的马路，两边是低矮的房屋。十一二岁的时候，黎介寿和弟弟在游府西街小学上过两年学。这里有他的欢乐，也有他的梦想，他要看看如今学校是什么样子。

转了一圈，黎介寿发现，学校的房子、操场、围墙变化不大，而学习的环境却变化了。在学校门口，他看到一位老师正带着一群挑着担、扛着锄头的学生向外走去。显然，师生们是要去农村劳动。

啊！这是一个不重视学习的时代，更是一个不重视知识分子的时代，很多事情是黑白颠倒的。黎介寿忽然领悟到：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做了一点点小事还想表扬，没门！要不是这个病人，自己早就和弟弟黎磊石一样，被关进牛棚批斗了。

既然无法改变现实，那就只有改变自己。心态一变平和，黎介寿的眼光就远了。他默默对自己说：历史是不会埋没一个人的，我所做的工作总有一天会被人认可。

过了不久，科主任把黎介寿叫到办公室，郑重其事地对他说：“你对肠道治疗有很深的研究。现在这方面的病人

很多，医院决定成立普通外科肠外瘘治疗组，由你牵头负责。”

压在黎介寿心头上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下了，成立肠外瘘治疗组，还让他牵头负责，这不就是对他医疗技术的最好肯定吗？

然而，正当黎介寿准备放开手脚大干的时候，医院接到上级通知，要求派医生到农村改造，类似于干部到“五七”干校学习一样。黎介寿是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当然是改造的重点。他与20多人一起，被下放到革命老区安徽金寨白大公社。临行前，医院领导对他们说：“你们是要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不能带药，更不能暴露医生的身份。”

唉，命运这东西，像儿戏一样，叫人琢磨不透——黎介寿要当农民了。

也好，这辈子还没有当过农民，当一回也不是什么坏事。可是，农民并不是好当的。到了金寨白大公社，黎介寿被安排住在一个庙里。这个庙是农民用来圈牛圈羊的，很破旧，有窗子没有窗帘，有门框没有门板，门口正对着一块坟

地。报到那天晚上，他刚睡下，一阵风吹过来，把挡在门口的竹帘吹倒了，好似有无数野鬼在追打。若非黎介寿是个医生，见惯了生生死死，连魂都要被吓出来。

生活条件是艰苦些，但就个人命运来看，在那个年代，远离城市的农村改造，其实是一种幸事。这里没有纷争，没有打斗，只有新鲜的空气、绿色的蔬菜和淳朴的感情。

那些日子，黎介寿自觉接受改造，同农民兄弟同吃同喝同学同劳动。可是，他是医生，他有救治病人的天职，又不能暴露医生的身份，不能暴露身份就不能给农民兄弟看病。因为这个，常常使他痛苦不堪。

有一天，他看到一个被批斗的地主脖子肿得大大的，显然是患了甲状腺瘤，这种病很可怕，不及时治疗就会有生命危险。黎介寿觉得自己不能袖手旁观，一个医生怎能对病重的患者视而不见呢？除非他的良心被狗吃了。他宁可被打倒，宁可被批斗，也要救这个病人。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他为病人做了甲状腺切除手术，病人得救了，可他的身份也暴露了。

不过，他虽然私自给人看病，暴露了医生身份，违反了纪律，但当时在农村，农民成天忙着种田，谁会来管这样的闲事？

不仅如此，黎介寿还一下子出名了。“黎介寿是个外科大夫，还是个军医！”一传十，十传百，乡亲们都知道了。这下好了，乡下人崇拜城里的医生，何况还是个军医，有病不找他又找谁？好家伙，看病的人越来越多，黎介寿有求必应。

事情传到了公社革委会主任的耳朵里，这是个正派人物，也有头脑，立即把黎介寿调到公社卫生院，不让他当农民了，专门让他当医生，还让他当老师，带教农村里的“赤脚医生”。

黎介寿本来是到农村接受改造的，实际上又干起了老本行。他当年带出来的8个“赤脚医生”，后来还有一位当上了金寨县人民医院的院长。

黎介寿到底是权威，像臭豆腐一样，闻起来臭吃起来香。在白大公社干了不到一年，医院又把从农村调回来了。也许有的人不喜欢他这个人，但需要他的本领。

黎介寿回到军区医院，正是一个冬天。踏着漫天飞雪返城，他的心中却洋溢着一种温暖。这正如一位诗人所写，“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第七章 信念之灯

黎介寿从成为光荣的人民医生那一刻起，就像孩童找到了失散多年的母亲，在党的哺育下茁壮成长。

1. 追求光明，重见天日

在苦难深重的旧中国，在原国民政府南京中央医院，黎介寿兄弟俩亲眼目睹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与无能，亲身感受了劳苦大众的贫困与无奈，他们渴望着翻身做主，盼望着重见天日。

大学时期，他们参加过学生运动，接受过民主思想的熏陶。在耳濡目染中，他们深深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进步的党，是一个民主的党，是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党。

而真正让黎介寿兄弟俩下定决心要跟共产党走的，是他们对人民解放军的深刻认识和深切感悟。

新中国成立的前几个月，南京城的气氛骤然紧张了起来，人心惶惶，共产党的军队要打过长江的消息满天飞。这

段时间，物价飞涨，金圆券几乎成为废纸，一万元只能买一碗面条。

黎介寿非常关注时事，天天看中央日报，蒋介石下野了，国民党的军队天天在打败仗，而共产党的军队所向披靡，向南京步步逼近，指挥部已从西柏坡迁到北平城，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员已发出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令。

果然，不几天，医院接到通知，要求医务人员做好撤退的准备。医院领导找到黎介寿兄弟俩，“你们有什么打算？”当然，这个“打算”指的是走还是留。

兄弟俩没答话。走与留不是小事，是选择国民党还是选择共产党、是选择旧政府还是选择新政府的大事，涉及个人的前途和命运。

晚上，黎介寿和黎磊石坐在床头商议着。黎介寿对弟弟说：“当官的要逃，是怕共产党的军队打他们，我们又没有干什么坏事，跑什么？”黎磊石说：“国民党都不行了，我们跟着跑能有什么前途？”黎磊石的想法和哥哥是一样的，多年颠沛流离的生活，让他看透了政府的腐败无能。“这些

年国民党打内战，害苦了老百姓。这个政府有什么希望？该改朝换代了。”

兄弟俩喝完整整一坛酒，将酒坛摔得粉碎。他们定下了决心：就留在医院不走，迎接共产党的到来，投入新中国的怀抱。

这时，二姐黎中从上海拍来电报，要求黎介寿兄弟俩去上海见面。

姐姐在广西，怎么到了上海？原来，黎中在广西桂林工作时，嫁给了一位国民党军官，现在，姐夫蒋梦辉已是国军坦克学院的少校教员了。根据国军的撤离计划，蒋梦辉带着家人准备在上海乘船前往台湾。骨肉亲情。临行前，姐姐给南京的黎介寿兄弟俩拍来电报。

到了上海，兄弟俩不仅见到了多年未见的姐姐姐夫，还见到了日夜思念的母亲黎周霞。从1942年离开桂林到现在，母子、姐弟一别就是7年，这7年中，远隔千山万水，一家人有多少牵挂，有多少思念，实在是无法想象。黎周霞拉着两个儿子的手，喜极泪下，激动得差点连话都说不出来。

姐姐黎中说：“叫你俩来上海，就是商量一件事。我和你们的姐夫马上就要去台湾了，妈妈也跟着我们一道去。我想让你们也去。”

在去上海的路上，黎介寿和黎磊石就猜想姐姐要他们去的原委，果然如此。听到这句话，兄弟俩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商量好了，准备留在南京。”姐姐问道：“留在南京好吗？”黎介寿反问：“去台湾好吗？”见姐弟仨这样，母亲说话了：“这事儿不勉强。他俩都是大人了，路怎么走，由他们自己定。”黎周霞虽然没多少文化，却很开明。

不过，做姐姐的，总是希望自己的弟弟好。她又说：“将来这个世道究竟怎么样，谁也不知道。国共之间打了几十年的仗，成了死对头。爸爸做过国民党的官，虽然去世了，但人死账不烂。你们不走，将来共产党的军队打过来了，我总是有点不放心。”

“爸爸做过国民党的官，我们又没有做过。我不信共产党会对我们怎样。如果共产党像个旧政府宣传的那样坏，他们不会得民心的，也不会得天下的。”黎介寿说。

姐姐又说：“你们是中正医学院的大学生，国民党很器重，到台湾肯定有很好的前途。再说，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多少可以相互照顾一点。”黎介寿说：“共产党也需要看病的医生。只要我们踏踏实实地干，在哪里都会有前途的。留下来不走，我相信前途会更好。”

看到两兄弟是“吃了秤砣铁了心”，黎中只得无奈地说：“既然这样，我也不勉强。”

在一旁的母亲比谁都难受。这一别，又不知什么时候能见面了，眼泪不禁夺眶而出。

黎介寿兄弟俩从上海回来不久，南京就解放了。那天，南京城被老百姓的锣鼓和鞭炮闹翻了天。他们的心也闹翻了天。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黎介寿在笔记本中写道：国民党走了，共产党来了，改朝换代了。美哉美哉！今为何日？国家之新纪元也。

后来他们才知道，在地下党的活动下，医院里的大多数人，包括院长姚克方都留下了。中央医院被解放军接管后，科里来了一名解放军女指导员。她一身军装，短发齐耳，长得很清秀。这天，她把科里的全体人员召集起来说：“我知

道，你们对旧社会看不惯，瞧不起，不愿意跟着国民党去堕落，留下来，投入到新中国的怀抱，你们的路走对了。跟着毛主席的队伍走，就找到了为人民服务、为新中国服务的道路，相信不会让你们失望的。从现在起，你们就是光荣的新中国的医生了。”听了这话，黎介寿兄弟俩和所有留下来的人都激动万分。

新中国诞生了，南京成了一个新世界。黎介寿兄弟俩发现，几乎是一夜之间，南京街头的丑恶现象绝迹了，赌博的没有了，抽大烟的没有了，秦淮河边的妓院也关门了。犹如梭罗所说：阳光如此温暖，坏人也会回头。

与此同时，人民群众建设新中国的热情被极大地激发了出来，每个人都有冲天的干劲。看到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气象，黎介寿兄弟俩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共产党太伟大了，这个国家有希望了。

2. 历尽磨难，终入党门

人民解放军接管“中央医院”后，医院每天都在发生新的变化，发展势头蒸蒸日上，黎介寿对工作充满了热情，对自己的前途和未来充满了信心。

1955年，已经负责科室全面工作的黎介寿，心中萌生了加入党组织的念头。每当看到党员们加班加点为党工作，或者参加党的会议，或者在集体学习，他就特别羡慕，并有一种强烈的冲动：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明白，要想成为新中国的一名优秀医务工作者，加入党组织是不可缺少的。也只有加入党组织，自己才有更大的前途和进步。

一天学习讨论时，黎介寿说：“我现在还不是党员，但我要做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坐在他对面的一位同志瞅了他一眼，不咸不淡地说：“你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能当党外布尔什维克。”

黎介寿本来是想表达进步的愿望，没想到会遭到别人的鄙视，他的脸一下红了。

想进步没有错，但在那个时代不行。一个人的身份是十分重要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毛主席讲得很清楚，有的人能吸收到组织上，有的人就不可能，这是原则

问题。可黎介寿不知道，也不明白。同样是医生，同样为病人服务，别人能入党，凭什么他不能？黎介寿不服气，又找到医院组织科杜股长：“像我这样的人，能不能入党？”

杜股长了解黎介寿，不假思索地说：“党的大门很神圣，不是什么人都能进的。你出生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个人又是知识分子，按规定是不允许入党的。”

黎介寿的心一下凉了。别人说他不能入党他还有点不信，杜股长说他不能入党他不能不信。杜股长是什么人，是党的工作者，最有权威，他说不行，那是真不行。一个人不怕道路有曲折，就怕前途不光明。黎介寿觉得自己人生道路一下子黑暗起来了。那一刻，他有点受不了了。是伤感，是内心深处的伤感，仿佛做人的尊严被剥夺了，自尊也没有了。一个巨大的痛苦缠绕着他。

但他转念一想，入党只不过是形式，听党话跟党走为党干才是最重要的。全国那么多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难道都能入党吗？党员只是少数，不做党员不是同样可以为病人服务吗？自己不是也说过，要当党外布尔什维克吗？黎介寿想通了。

自 1950 年以来，黎介寿和弟弟先后数十次向组织递交过入党申请书，由于历史原因，一直没有被批准。但他们对党的信仰一直没有动摇，一如既往为党工作，默默无闻为党奉献。

改革开放后，国家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得知这一消息后，黎介寿和弟弟如同沙漠中久行的路人，遇到清冽的泉水，兴奋不已，又一次提出了入党申请，几十年的夙愿终于成为现实。

黎介寿在入党申请书中写道：

我出生在旧社会，对新旧社会有着亲身体验与对比。解放前的中国，外有帝国主义侵略，内有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民族受欺侮，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使贫苦人民翻身解放，新中国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

多年来，在党的不断教育下，我热爱党，总想为党做一些事情。但由于自我改造不够努力，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仍有存在，骄傲自满这一缺点没有能很好克服，妨碍了我的进步，

也影响了党的工作。今后，我要努力克服缺点。现在我虽然已 54 岁，但年龄不能阻挡我朝“又红又专”的方向前进，更不能阻挡我为党更好地工作。我渴望在以后的岁月里，在党组织的直接监督教育下，努力改造世界观，为人民做更多的工作。

1979 年 3 月，黎介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30 多年后，身为医学大家、共和国院士的黎介寿，依然没有忘记入党时的铮铮誓言，始终以一名共产党员的身份告诫自己，要在有生之年为党多做贡献。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开始后，黎介寿把它当成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教育活动之中。他不但带领全体普通外科研究所党员认真学习，还亲手记下了 10 多万字的读书笔记，字迹工整，内容翔实，碑帖般的笔记记载着一个普通党员的滚滚心潮。

在普通外科研究所，党的威望至高无上，所里的任何决策都要由支部讨论，形成决议后才能施行。

2010年夏天，在通往井冈山北山烈士陵园的109级台阶上，一位老人攀登的身影越来越近。他就是87岁的黎介寿。

黎介寿一贯重视党员教育，每年的“七一”前后，都要亲自组织普通外科研究所的党员参观红色遗址，瞻仰红色遗迹，开展重温入党誓词、军人誓词等形式多样的党日活动。

盛夏的井冈山骄阳似火，太阳向大地肆意倾撒着热量。山高林深、坡陡路险，研究所的党员们在山路上艰难行进。

晌午时分，山里的温度已近40℃。大家沿着当年红军的挑粮小道行进。在这支队伍的后面，耄耋之年的黎介寿，头戴一顶太阳帽，一手拄着拐杖，一手叉腰，全身早已被汗水湿透。

边上的总护士长彭南海心疼地说：“黎老，你年纪这么大，身体又不好，咱们休息一下再走吧。”

“南海，咱们此行不是来旅游休闲的，咱们是来信念之山取经的啊！”

是啊，如今，党的信念已深深根植于黎介寿的心底。“我们的事业就像登山，要有毅力才行，继续爬吧！”黎介寿头也不回地朝着主峰迈进。

3. 有国家，才有国人

黎介寿认为，一个人必须是爱国的，因为有国家才有国人，也才会有自己，而爱国必须有所行动，尽最大努力为国家做一些事情。

在外强欺凌的旧中国，为了求学，他们辗转长沙、上海、江西等地，颠沛流离，受尽磨难。从中学到大学，迫于战乱，几乎每年换一个地方。后来，他们考上了可以免去吃住、学费的前国立中正医学院。

黎介寿常跟学生讲，中国人要有中国人的志气，应该在中国自己的国土上谋求事业的发展。他平时谦虚和蔼，在国内讲学从不张扬，对自己的骄人成就也闭口不谈。但到国外讲学，他却时时不忘宣传祖国的强大，展示“中华牌”。

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黎介寿应邀去瑞典讲学，介绍我国医学界的老鼠实验情况。在大会发言时，一位外国专家不屑地挑衅道：“你知道不知道？老鼠是没有胆的！”

黎介寿被这位外国专家傲慢的态度激怒了，马上反击道：“我不但很清楚，而且比你知道得要早得多！”

2003 年，黎介寿到日本讲学，一位日本教授称赞道：“我知道你们 1994 年就做了小肠移植手术，我们去年才做，你们真了不起！”这一刻，是黎介寿最引以为豪的时刻，他感到自己的付出能为祖国争光，再苦再累也值得。

爱国，并不等于一切排斥外国。为了学习先进的技术和新鲜的经验，黎介寿鼓励和支持自己的学生出国，但要求他们学成了必须回来。

他认为，留在国外工作即使条件再好、待遇再高，也只是给外国人打工，永远没有当家做主人的感觉；中国人要在自己的土地上成就事业，事业做强做大了，会感受到强烈的光荣感和自豪感。不要总是认为外国的好，也要看到中国的好，国家发展是很快的。比如现在在中国的高速公路上行驶，已分不出这是中国的道路还是欧洲的道路了。“在事业上，

要有强烈的争先、争气意识，人家有的我们要有，人家没有的我们也要有，人家没有做成的我们也要做成，这样，出去后才会真正受到平等对待，才会真正受到尊敬，这要成为做工作、出成绩的动力。”

4. 军队，是成就事业的沃土

军队，是黎介寿成就事业的沃土；部队官兵，是他永远服务的对象。他认为，作为医生，要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作为军医，就是要全心全意为战场和部队官兵服务。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了。此时的黎介寿还是“中央医院”的实习医生，正当他对自己的去留拿不定主意的时候，解放军秋毫无犯的严明纪律，坚定了他留下来的决心。这天清晨，初春的寒风中，一排排身着米黄色薄军装的解放军战士和衣而卧。他们是深夜进城的，为了不惊民、不扰民，全部睡在大街上。黎介寿内心为之一振，深深地被这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所折服。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他积极响应祖国号召，先后奔赴鸭绿江，参加志愿军医疗团。黎介寿每次到车站送行伤病员，都会被战士们高昂的士气和视死如归的革命意志深深感染。火车南下回家乡，火车北上去前线。“再见了，妈妈，别伤心，别难过……”苏联共青团之歌的优美旋律在广场上一次次回荡。伤口尚未痊愈的战士缠着绷带，面对亲人与战友挽留，执意要求重返前线继续战斗。那时，他真正地感受到了什么是党，什么是人民军队，什么是国际主义。

对人民军队的理解，让黎介寿兄弟俩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这支军队，选择了为官兵、为战场服务。

黎介寿常说，作为军医，宗旨是全心全意为官兵服务。“官兵们在训练场上摸爬滚打，担负着保家卫家的使命，他们生病了、负伤了，我们有义务有责任让他们尽快恢复健康啊！”

以前科里病房床位少，住院条件差，一些患病的战士只能睡在走廊里的加床上。他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冬天，他经常要摸一摸战士的被子，提醒护士给战士加被褥；夏天，他晚上总要到病房看看，提醒护士给战士放风扇和灭蚊器。很

多时候，院士陪着战士一起散步、谈心，成了医院一道靓丽的风景！

经黎介寿诊治过的战士，总是尊称他为“黎爷爷”。一声“黎爷爷”，叫出了战士们心中万千爱意、无限感激。

2003年8月，“南京路上好八连”战士杨宵，因全小肠坏死转入普通外科研究所救治。黎介寿亲自主刀，为他实施了全军第一例小肠移植手术。

“黎爷爷，我怕是活不长了……”手术后的杨宵一度情绪低落。

“你是个坚强的孩子，更是一个顽强的战士，你现在正在与病魔战斗！你一定会胜利的。”黎介寿给他送来了励志书籍，扬起他生命的风帆。

住院期间，正值杨宵19岁生日。黎介寿把蛋糕送到他的床头，和他一起唱生日快乐歌。当得知杨宵思念连队、想念战友时，还特意为他安装电话，开通了“杨宵热线”。当电波从遥远的连队给杨宵捎来了战友们的问候时，感激的泪水止不住地从杨宵眼眶中滑落。小杨感慨地说：“黎爷爷，真是比亲爷爷还要亲！”

在黎介寿看来，身为军人，要么在战斗，要么就在准备战斗，这就是军人的使命，这就是军人的担当。

伊拉克战争爆发后，美军将战伤控制技术广泛应用于战场医疗救治，利用全球定位系统实施远程医疗会诊，提高了战伤救治效率。这种卫勤保障的新模式，牵动了黎介寿的心。他暗下决心，要研究适合我军实际的战场救治新模式。

当黎介寿准备把研究方向投向未来战场时，却陷入了两难。有的人劝他，这是一个你不曾熟悉的课题，搞了可能就是瞎折腾；也有人说，这不是你一个老人家该做的事，体力和精力都不适合，还不如继续搞好临床医学的研究；还有人甚至说，这是一个和平年代，搞科研不提高科室的经济效益，就没有地位，就没有价值和意义。

黎介寿坚决不为所动，市场连着战场，只有战场坚固才能市场昌盛，民富国强。他坚信一个道理，历史上没有绝对的和平时期，只有战争时期和非战争时期。

说干就干，毫不迟疑。2006年，黎介寿走出病房，带着自己的课题组，展开了一项本不属于他这个82岁老人的战创伤研究课题。

“黎老，您也要参加训练呀！”见惯了穿白大褂的黎介寿，突然见到了穿迷彩服的他，官兵们有些不知所措。

“穿一天军装就要担一天使命。”黎介寿铿锵有力的话语，让围在他身边的官兵们脸上顿时写满了敬意。

应对危重战创伤，传统的处理办法是“一包、二缝、三锯”，争取首次手术解决主要问题。但在战场条件下，由于手术治疗条件受限，往往会忽视危及伤员生命的各种隐患，造成机体二次损伤，给后期治疗带来新的困难，并且不利于大批量伤员快速通过。

长江之畔、东海之滨、丛山荒漠印记了一位老者的足迹，更见证了黎介寿勇挑重任的担当。

图书馆、研究室、卫勤训练基地留下了一位老者的汗水，更承载着黎介寿情系打赢的执著。

从部队和战场的实际需要出发，做造福官兵的事。黎介寿主动牵头，勇挑重担，积极与医院9个外科联合开展了“损伤控制性手术”研究，重点解决危重战创伤给伤员造成的生理环境紊乱、免疫功能抑制及多器官功能障碍等问题，在全

军率先开展运用控制性分期治疗应对复杂战创伤的科学研究。

总部的卫勤专家来了，诸军兵种的军事专家来了，可爱的战士们来了……2010年，这一全新的救治模式在与诸军兵种联合作战卫勤演练中成功对接。演练结果显示，伤员的通过率增加了一倍，确定性治疗率提高了13%，达到了“伤而不残、残而不废”的目标。

近年来，黎介寿经过反复研究，发现在体外循环治疗中，可引入连续性血液净化技术，利用滤过、透析以及吸附的原理，连续不断地清除机体内的有害物质。他在全军率先提出，将连续性血液技术运用到未来战场化学生物武器伤、感染、战创伤、多脏器功能障碍的救治中。

实践证明，这一技术具有超强的解毒、降温功能，在多器官支持方面具有不可替代、优势明显，特别是在危重患者的救治中发挥了不可比拟的作用。

战场能应战，平时能应急。这是黎介寿对军队医院履行职责使命的独特理解。

2002年9月，南京汤山爆发群体性中毒事件，整个金陵城警报长鸣、哭声一片，中毒群众和家属遍地哀号、惨不忍睹。一时间，军、警、民联动，参与到这项救治活动中。当时的紧张氛围无法形容，就近医院相继接收中毒群众。由于批量大、人员多、时间紧，一时无法判定群众中了什么毒。

大批病人被紧急送至南京总医院，许多医护人员没见过这种场面，加上检验结果要等两小时，都有些手足无措……

江苏省、南京市领导心急如焚，第一时间赶到救治现场督战，安抚群众。时间就是生命，耽误了最佳救治时间，可能会有许多群众死亡，其中包括不少学生和妇女儿童。黎介寿闻讯火速赶到，仔细检查病人出现的症状。

在紧张而慌乱的现场，黎介寿院士如同中流砥柱。“是‘毒鼠强’！”经过短暂地商量，黎介寿果断建议医院领导，“站着的，分流至其他医院；躺着的，留在南京总医院！”

话说出去了，人救不活怎么办？千钧一发之际，黎介寿院士把巨大的风险留给了自己。

“应该是毒鼠强！”他的诊断被立即通报至各家收治医院。两小时后，检验结果与两位院士的判断完全吻合！

千钧一发之际，黎介寿的准确判断和大义担当，从死神手里硬生生抢下两个小时的宝贵时间，使数以百计的中毒病人得以获救。

第八章 攀登之路

在地中海东岸干涸的沙漠中，生长着一种蒲公英，它不是按季节来舒展自己的生命的，如果没有雨，它们一生一世都不开花。但只要有一场小雨，不论这场雨在什么时候落下，它们都会抓住这一难得的机会，在雨水被蒸发干之前，迅速开花、结子、传播。

这个故事启示我们：在人的一生中，发展自己、成就事业的机会，就像沙漠里的雨水一样少，但只要有蒲公英的品性，在机会来临的时候，果敢地抓住，大胆地实践，就会成为一个事业有成的人。

黎介寿就像那些珍惜机会、展示美丽的蒲公英。60 多年来，他以睿智的目光不断跟进世界医学最前沿，一次又一次紧追机遇，敢为人先，创造了许多个“亚洲第一”、“世界第一”。而激励他永往直前、不懈进取的力量源泉，是伟大的事业之根。

1. 九曲回肠无穷尽

今天，我们面对转基因生物、克隆技术和纳米技术等，感到科学的脚步迈得太快了。但曾几何时，医学科学的力量弱得连治疗“肠绞窄病”的办法都没有。

1962年，医院收治了一个14岁的患肠绞窄的男孩，肠缺血已经6个小时。面对这个肠梗阻引起的肠绞窄病人，外科主任立即决定进行手术。打开病人的腹腔，无影灯下，只见小孩整个小肠发黑，一般的热敷、的卡因注射等治疗方法全部无效。而把小肠切除后，孩子将无法生存。小小的生命是多么的可贵，谁也不希望死神活生生地把他拽走。主任当即在手术台边召集科里医生进行讨论。

在场的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个孩子没有办法救了。黎介寿望着孩子苍白的脸，心情很沉重，他忽然想到了大姐黎民的死。

1934年，大姐从医学院毕业后就染上了伤寒，父亲把她送到医院，医生想尽了一切办法，还是没能挽救大姐的生命。大姐临终前那渴望生命的眼神，至今还印在黎介寿的脑海里。没想到，今天和姐姐一样的人出现在他面前。现在自

己也是医生了，他不希望眼前再有这样的事发生。一定要救救这个孩子！也许是天意，一瞬间，他想到了一种药，一种叫“苜胺唑啉”的药。他对主任说：“让我来治治看。”“你有什么办法？”“我想用苜胺唑啉试试。”主任还是不太相信：“能行吗？”

这是一种新药，在场的医生大都没有听说过，更不用说在患者身上使用了。黎介寿视野开阔，知识丰富，总是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东西。他说：“这种药对扩张肢体的动脉痉挛有作用，我想也能改善肠动脉的痉挛。”

看着黎介寿自信的样子，外科主任果断地说：“关肚子，按黎医生说的治。”奇迹真的出现了，用了苜胺唑啉后，孩子发黑的小肠开始变红。这说明小肠的血液运行已经开始恢复。

看到孩子的病情有了转机，黎介寿十分高兴。可是，小肠红了一段时间之后，部分区域又开始发黑，并出现了并发症，有时肠子会坏死，有时肠粘膜会溃烂，有时肠溃疡会出血，有时肠吸收功能会不全，真把黎介寿折腾苦了。

肠子坏死，他切除部分肠段；病情复杂，他大胆攻克难关。在当时没有任何成熟治疗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他阅读了大量的有关肠缺血的病理生理改变、肠的生理功能、肠的营养吸收等方面的医学资料，边学习边研究、边实践。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终于从死神手里夺回了小孩的生命。

在治疗这个小孩的过程中，黎介寿发现肠子的学问太大了，也太奥妙了，他要探索它，攻克它，他要为患肠道病人解除痛苦。从此，黎介寿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肠功能障碍治疗研究。

1968年，一位军队领导因车祸导致腹部受伤，被紧急送到医院。打开腹腔，肚子里的东西没有几样是好的，特别是肠子，被撞破了好几个洞，形成了肠外瘘。

肠外瘘，顾名思义就是肠子漏了。肠子就好比一条水管，水管破裂，水自然就要外流。肠子破损也是如此，瘘口张着嘴，病人吃多少漏多少，粪便从肠子中溢出来，大量细菌，特别是那些活跃的大肠杆菌，经常在肠内肠外兴风作浪。

手术台上，黎介寿仔细探查，发现这个患者肠子破的不是一个洞，而是6个洞。一个洞都不好治，何况是6个洞！

为了治好他的病，军区非常重视，把当时国内能请到的各路“神仙”都请来了：著名的外科专家曾宪九、裘法祖、傅培彬、吴蔚然、董方中，等等，会诊了一次又一次，讨论来讨论去，终究没有找到一个成熟有效的办法。

这也难怪，当时国内对肠外瘘的治疗研究还没有起步，此类病人的死亡率是 60—70%。送走了会诊专家，黎介寿决心要找到治疗的办法。

为了找到可行的方案，他整天坐在病人床前观察病情，记录生命指征，寻找最佳治疗途径。肠瘘病人和别的病人不一样，不太讨人喜欢，因为身上发出阵阵恶臭，常常呛得人都喘不过气来，可黎介寿不管这些。他常跟妻子程颖士笑着打趣，“我现在都成司马迁了，天天在记史(屎)。”

有段时间，黎介寿一边观察，一边在思索着一个问题：怎样才能把这个瘘口补起来？一天，他发现有个医生用胶水粘合开裂的笔套，顿时一个念头冒了出来：能不能用胶水把肠子瘘口粘合起来？

这个大胆的设想，既令人兴奋，也令他担忧。胶水是化学物质，对人体是否有副作用？他要进行试验，一定要试验。

这天，黎介寿走进自己的房间，然后关上房门，把事先准备好的碘酒、药棉、纱布、胶水等到放到桌上，一切就绪，他捋起左腿的裤管，举起手术刀，在自己的大腿上划开了一个长两寸多的大口子。当殷红的鲜血向外汨汨流出时，黎介寿将事先调剂好的胶水，一滴滴向刀口处涂抹。

作为医生，他知道如果出现化学反应，会对自己的身体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可是，为了试验数据，为了肠痿患者，他顾不得那么多了。

中国最早实施外科手术的医生，是东汉末年的神医华佗，他用自己发明的麻药“麻沸散”给病人实施麻醉，然后剖开病人的肚子对内脏进行清洗，用刀切除坏死的部分后将其缝合，最后缝好伤口，贴上膏药，病很快就好了。

华佗的传奇医术，令历代国人叹服。黎介寿想，老祖宗两千多年前就敢在病人肚子上开刀了，我这点探索又算得了什么？

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黎介寿大腿上的伤口慢慢愈合了。试验成功了。十多天后，他开始给病人进行补肠手术。可肠子和大腿是不一样的，大腿的上的肉是不动的，而肠子

是不断蠕动的，手术用乳胶补上后，一蠕动，乳胶就掉下来了。看到这个情形，黎介寿心里十分着急。

一连做了5次手术，肠痿也没有治好，这位患者不干了，哪有5次手术还治不好的病？患者是个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将军，个性鲜明，敢做敢为，骂起人来也像打炮一样，凶得不得了。一见到黎介寿就怒发冲冠，大发雷霆：“你这个医生，屁用也没有，开了这么多刀，还治不好我的病。要是再治不好，我就毙了你！”

这个倔老头还真不是在吓唬人，他的枪就放在床头。黎介寿有点委屈了，自己花了这么大的精力，最后还是落得个不满意。

但转念一想，黎介寿释然了：一连开了5次刀，身体还没见好转，放在谁身上都会生气，何况患者还是个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老将军？战争年代没有牺牲在战场上，如今，却有可能被一次车祸撂倒在病床上！黎介寿诚恳地说：“首长，我也想一次手术就把您的病治好，但我做不到，目前中国也没有一个医生能做到。请相信我，给我一点时间，一定会把您的病治好。”

通往成功的道路并不平坦，挫折是人生最好的学校。2米来长、粉红色的、九曲十八弯的肠子，成了黎介寿魂牵梦萦的事。那些天，黎介寿吃饭在想，走路在想，睡觉也在想，这肠子怎么这么不听话呢？

想来想去，黎介寿终于发现，病人营养跟不上，肠子的蠕动就难控制，手术效果就差。最好的办法是先护理一段，让病人养精蓄锐，再做手术。

养精蓄锐，说得轻松做起来难，病人吃啥漏啥，咋个养法？黎介寿开始查阅资料，寻找突破口。一天，他在阅读一本《美国外科妇产科》杂志时，看到了一篇肠外营养的文章。文章中报道了外国医学专家对一个先天性腹壁缺损的婴儿运用静脉营养，使这个婴儿存活了八个月。黎介寿一拍大腿：有了！

这篇小小的文章，一下子打开了黎介寿的思路，他敏锐地感觉到，这个方法可以使先天性腹壁缺损的婴儿存活，那么肠外瘘的病人也一定可以用这个方法进行营养支持。

听说黎介寿在研究静脉营养，一位内科医生不客气地说：“一个外科医生，不好好开刀，搞什么营养支持，真是

不务正业！”话传到黎介寿耳朵里，他没有当回事，“开刀是为救治病人，不开刀也是为了救治病人，不必拘泥于外科治疗还是内科治疗。”

黎介寿在实验室里进行了一系列营养支持实验和所需器械的试制。他先做了一个胃造口静脉导管，在动物身上进行营养支持方法的实验。这期间不知折腾了多少只无辜的动物，直到驾轻就熟为止。

然而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从浅静脉输入一般是5%的葡萄糖液体，这5%的葡萄糖何时才能把病人的身体催起来啊，实在太慢太慢。黎介寿是个爱动脑筋的人，他决定从病人的深静脉补充营养。稍微有点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浅静脉输液，连农村的“赤脚医生”都会，而深静脉输液，大医院的医生也未必见过。深静脉是人体的要害部位，处理不好是要人命的！这样做要冒很大的风险。

黎介寿做好充分准备后，在患者的锁骨下开了一个口子，小心翼翼地将导管插入深静脉，然后将事先调剂好的25%—50%的葡萄糖、氨基酸等营养液，输入患者的体内。

不到两天，患者脸色就开始红润了。患者身体养好了，黎介寿再次为他手术，成功了！

一个人越向高处攀登，遇到的困难也就越大。肠外瘘病人的引流与营养问题得到解决以后，腹腔感染、全身器官多功能不全就成了肠外瘘病人死亡的主要原因。

河南永城县的小伙子窦宝坤就是这样，原来身体结实得像头牛，可一次车祸撞破了他的肠子，亲人们抬着他跑了好几家大医院，肠子上的洞还是没有补上，吃啥漏啥。由于营养不良，他的体重从 125 斤下降到 47 斤，瘦得皮包骨头。看着日渐憔悴的儿子，爹含着泪对娘说：“娃看来是不行了，赶快准备后事吧。”

就在这时，人家告诉他，南京总医院有个专家黎介寿，能治这种病。爹把东借西凑来的钱缝在棉袄里，带儿子千里跋涉来到了南京总医院。

看着奄奄一息的窦宝坤，值班医生问黎介寿，这个病人要不要收治？谁都知道，这个患者仅仅只有一口气了，收下来是有风险的，说不定会死在手术台上。

“收！”医院哪有不收病人的道理？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能放弃。黎介寿搬来小凳子坐在宝坤的床头，一坐就是半天，生怕检查漏掉什么东西。

宝坤爹跑过不少大医院，见到过很多医生，他们一闻到儿子身上的恶臭就皱起了眉头，戴起了口罩。不怪他们，臭味实在是太难闻了，他做爹的也受不了。可黎介寿不一样，没有戴口罩。宝坤爹说：“黎主任，娃身上尽是屎，太臭了，您戴上口罩吧。”

黎介寿说：“戴上口罩，你就会觉得我怕脏，跟我就隔着一层。我不戴口罩，一是想告诉你我不嫌弃你的儿子，二是直接闻到气味便于观察。中医不是讲望闻问切嘛，戴上口罩闻什么？”

听到这样话，宝坤爹知道这孩子有救了。

经过几天的观察，黎介寿给窦宝坤制订了一个先用深静脉营养法恢复体质，再上手术台做手术的治疗方案，把治疗护理的重点，放在杜绝腹腔感染、防止器官多功能不全上，终于从死神手里夺回了窦宝坤。

窦宝坤出院回到家里，娘见他满面红光，笑容灿烂，不敢想是自己的儿子，拉着儿子的手左看看右看看，激动地说：“咱们家是哪辈子烧了高香，碰到活神仙了。”

黎介寿不是活神仙，但他做了活神仙做不到的事。

之后，他结合国内的实际情况，在营养支持的临床应用上不断开拓创新，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成果，先后研制了脂肪乳剂、3%甘油与3%氨基酸混合化氨基酸等。他还探索了肠外营养导致淤胆的主要原因，首次提出了“非蛋白质热量过高是导致肠外营养淤胆的主要原因”的理论，并将这一理论应用于临床，一大批病人在他的治疗下获得了新生。

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黎介寿的科研成果“全肠外营养应用淤胆的研究”以及“全肠外营养应用于感染病人的研究”，获得两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全肠外营养的应用研究”获得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1990年，黎介寿被选为中华外科学会营养支持学组组长，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中国临床营养支持的奠基人。

黎介寿不满足于得奖，也不满足于在国内领先，他要瞄准世界医学前沿，攻克世界医学难题，让更多的患者受益。

1988年8月9日，德国人完成了节段小肠移植；1988年11月13日，加拿大人完成了肝肠联合移植；1989年3月18日，法国人完成了全小肠移植，而中国还没有一家医院进行过移植手术。器官移植是当代医学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下，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整体医学水平的重要标志。黎介寿想，外国人能做到的事，我们中国人也要能做，也只有做小肠移植，才能最终解决小肠患者的营养问题。

1987年的一天深夜，一位13岁的姑娘因腹腔大出血在地方医院急诊手术，整个小肠被切除，剩下的肠子不能吻合，抬到南京总医院时，肠子是用两把血管钳夹住的。姑娘的父亲用渴盼的目光恳求黎介寿：“请您给她接一段肠子吧，要不，就把我的肠子给她！”

然而，当时整个亚洲都没有攻克这个难题。作为一名专门研究肠道疾病的医生，黎介寿却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患者离去。

那一晚，黎介寿把自己关在空荡荡的病房里。那个花季少女临死前哀怨的目光，在他的眼前不时闪现。这位曾经在

苦难岁月中饱受折磨、百炼成钢的硬汉，此时此刻却控制不住愧疚的眼泪。

面对越来越多的短肠综合症患者，年已花甲的黎介寿横下一条心：一定要把小肠移植这个难题攻下来，填补这项空白！

这是一次勇者对未知的探索，这是一次风险对荣誉的挑战。当时，肾、肝、心、肺、胰等器官移植都已广泛应用于临床，但由于小肠内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与细菌，移植手术面临排斥反应和感染两大难题。

然而，身为我国肠痿治疗先行者、临床营养支持奠基人的黎介寿，对自己在肠疾领域的探索成果充满信心，坚信研究一定能够获得成功。

科学研究举步维艰。每一关都要经历很多次失败，仅动物手术后存活 24 小时这个难题，黎介寿做了将近一年才突破。接着，他又定下动物移植术后成活 100 天，标志手术完全成功的目标。

当时，实验条件非常简陋，动物房里没有空调，夏天只能用凉水给猪降温，冬天只能生起煤炉取暖。每天晚上，黎

介寿都要坚守在动物房，看着猪安静地熟睡了，才放心地离开。

1991年春节，两头猪手术后都已成活了80多天，实验到了最紧张的关头。年三十晚上，黎介寿还带着学生在实验室，观察着猪的每一点反应。突然，一头猪身上的腔静脉管脱落了，他们连夜实施紧急手术，一直忙到凌晨两点多钟。

科学实验往往残酷无情。结果，一头猪手术后在82天时死去，另一头到了第97天也死了。无数次失败的打击，国内外同行的傲慢与蔑视，像一根无情的鞭子，抽打在黎介寿的身上。“屡战屡败，屡败屡战”，黎介寿和大家一起分析失败的原因，并不断给学生们“打气”：“既然外国人能做成，我们也一定能做成！”

1992年2月14日，经过1900多个日日夜夜的不懈努力，黎介寿终于在亚洲首次获得了猪同种异体小肠移植的成功。当又一抹黎明的曙光，照耀在彻夜未眠的黎介寿身上，这位被研究所人员亲切地称为“猪爷爷”的68岁的老人，终于结束了4年多与猪“相依为命”的日子。

忘我攀登者的太阳总在前方。大动物小肠移植的成功，为黎介寿进行人体小肠移植奠定了基础。又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实践，他完成了动物实验向临床的过渡。

1994年3月12日，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黎介寿早早地来到医院，今天他要为一个患者做小肠移植手术。他要完成一个梦想，这个梦想缠绕他近十年了。

这个病人叫杜新平，31岁，是铁路技工学校的女教员，因为做阑尾手术引起了肠粘连，从1975年到1993年，她一共开了9次刀，小肠截掉了很长一段，肚子也成了“花肚子”。这一回，她是因为慢性小肠结肠炎、反复肠梗阻、短肠综合症入院的。这样的病人，只能进行小肠移植了。

麻醉师打了麻药后，杜新平躺在手术台上，什么也不知道了。黎介寿走过去，看到小杜腹部因手术留下了好几处伤疤，不觉心里有点酸痛：这个病人太可怜了，但愿这是最后一次了。他拿起手术刀，果断地打开了病人的腹腔，呈现在眼前的是一段短小的小肠，还有一些粘连。

从医以来，已做过无数次手术，但没有哪一次，能有这次让黎介寿这么专注，这么重视。这毕竟不是一般意义的手

术。手术前，他把所有能想到的问题都想到了，把部下分成了取肠组、修肠组、手术组、监护组等数个小组，统一在他的指挥下行动。在黎介寿打开患者腹腔的同时，一段 2.5 米长的供肠也到位了，修肠组的人就马不停蹄地进行修复。所谓修复就是用剪刀修剪肠子的形状。黎介寿是艺高人胆大，他看一眼就知道什么地方能剪什么地方不能剪。看黎介寿做手术是一种享受，70 岁的人了，拿起手术刀来手一点也不抖。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为了解决做手术时手不抖，黎介寿每天都要做俯卧撑。此时黎介寿的手术刀游刃有余，虽然病人腹腔内感染和粘连都很严重，可手术做得很顺利。

手术室外，气氛比室内还要紧张，杜新平的亲属们以大门为中介，走过来一个人，又走过去一个人，又走过来一个人，脚步说明了他们的心情，他们的期待。

晚上十点多钟，新的小肠终于接在了杜新平的肠子上。黎介寿最后一次下达战斗命令：注意监护，上环孢素、甲基强地松龙、雷公藤……

这次手术的成功，打破了亚洲小肠移植零的记录，把中国的器官移植技术提高到国际先进水平。随后，人民日报、

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全国各大媒体，都纷纷报道了这一令人振奋的消息。小肠移植成功，成了当年中国医疗卫生系统中“十大重要事件”之一。南京总医院成为全世界能施行这一移植术的 9 个国家中的 24 所医院之一，是亚洲唯一的一家医院。

因为成就突出，不久，南京总医院普通外科被解放军总后勤部由“全军腹部外科专科中心”晋升为“全军外科研究所”，这无疑确立了南京总医院普通外科在全军的中心地位和牵头作用。一个京外驻军医院获得如此殊荣显然是不易的。

若把人生比喻成登山，有三种人：第一种人看到山那么高，就没有兴趣了。第二种人，从小开始就有人鼓励他，他也立志要登山，结果登到一半后，就觉得太累了。还有第三种人，就是一直往上走，不管有多少困难，他都要向山顶走去。黎介寿就是第三种人。

成功激励着黎介寿向着更高的目标迈进，攻克小肠移植后，他又把目光瞄准了肝脏和小肠同时移植的医学难题。

因为车祸导致肠坏死成了“无肠人”的司机叶青，两个月后又出现肝功能衰竭。黎介寿在动物实验成功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尝试。2001年4月24日，黎介寿对叶青实施了肝肠联合移植手术，手术历时13个小时，一段长达380公分的异体全小肠，与肝脏一起，被成功地移植到患者的体内，又一次填补了亚洲肝肠联合移植的空白。接着，他又攻克了亲体供肠移植、急性胰腺炎等世界医学难题，一个又一个病人因为他高超的医疗技术获得了新生。

永恒就是美丽，执着就是艺术，平凡铸就伟大。在肠道疾病研究领域，很多人都因漫漫无果而半途转行，而黎介寿却在这条路上走了60多年。在一次国际学术交流大会上，世界著名外科专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德瑞克虔诚地对黎介寿说：“你是全世界研究肠子时间最长的人，我们敬佩您。”

回首自己的成功之路，黎介寿坦然直言，“勇气是打开机遇之门的金钥匙。面对同一件事情，你有想法，他有想法，我也有想法，但真正要把想法兑现，就需要勇气，谁先有勇气，谁勇气最大，谁就能打开机遇之门。而勇气从何而来？”

它来自于对事业的强烈使命感、紧迫感和高度的责任感。事业，是激励我不断前进、永攀世界医学高峰的根！”

2. 从无到有成大业

在相拥着法国梧桐的中山东路上，有一幢端庄而又古朴的四层小楼。这是南京总医院全军普通外科研究所所在地。

这幢民国初年的建筑，尽管经历了近百年的风雨沧桑，但当你走进她，却发现她的每一个楼层，无论是门诊、病房、实验室还是网络中心，都蕴涵着时尚和现代气息。

然而谁也无法想象，60 多年来，是一位智者在这儿创造了从无到有的神话。黎介寿带领他的弟子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求实创新，走出了一条卓立群伦的发展之路。在这里，他们用睿智书写着春秋，用勤勉奏响着华章，用生命演绎着传奇。

给我一个支点，我将撬动地球；给我一点火花，我将绽放出绚丽的光彩。黎介寿从四张床起家，打造了世界一流的医学研究所。

“感谢老人家在竞争激烈的腹部外科界给我们分了一块蛋糕，切了一段肠子，而这一块最难做，却是病人需要的。”黎介寿的学生在内心深处充满了对老师的景仰。

1949年，25岁的黎介寿获得医学学士学位，从事临床外科专业。13年后的一天，面对一位小肠坏死的患儿，他束手无策，看着那渴望生命的眼神，他立志攻克肠疾这一世界难题。

在知识匮乏的上世纪60年代初，要了解国外的医疗信息是件难事，但病人需要他增长知识来拯救生命，这种为生命而学的感召力在他的内心世界涌动。

求知若渴的黎介寿，悄悄地想办法订了《美国外科文献》、《美国外科杂志》等英文书籍，白天怕被人发现，就在晚上11点以后躲在屋里偷偷地学。就这样，在这段求知难、信息闭塞的非常年代，黎介寿硬是靠着这一点点舶来的知识，边积累边摸索着踏上了疗肠之路。

不拘泥权威，不相信常规，黎介寿在医学研究和临床治疗中，有着否定前人的勇气和打破常规的魄力。

肠外瘘是创伤、手术后的一种严重并发症。过去，国内外医学界传统的观点是对肠外瘘要早期手术，肠外瘘病人实施手术越早效果就越好。黎介寿经过多年的艰苦研究，发现肠外瘘不同于一般的急性肠穿孔，瘘孔有“由小变大，由大变小”的自然规律，因此手术时机的选择就显得尤其重要。

于是，黎介寿在积累了大量的临床经验后，合理地提出了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治疗方案。

黎介寿经过反复论证后指出，患者因长期患病，入院时身体本来就很虚弱，马上就到手术台上做手术，对患者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最好的办法，就是先护理一段时间，给予科学合理的营养治疗，调理好患者的身体，待到患者的身体适合手术时再行手术，也利于患者的尽快康复。“治疗肠瘘应择期手术”这一突破传统的理论，使国内医学界对肠瘘治疗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一般来说，手术前患者的营养护理，传统做法是用5%的葡萄糖进行浅静脉输液，这一做法虽然安全方便，但要把患者体质恢复起来，需要漫长的等待时间。黎介寿创新提出，

直接经深静脉输入高浓度的营养液，使患者在较短的时间内快速恢复了体质，很好地提高了手术的效果。

一时间，外科营养支持成了全球医学发展的方向之一。国际权威学术机构、欧洲肠外肠内营养学会主席Pierre Singer教授称赞：“黎介寿开创的肠外营养支持，对治愈肠道疾病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目前，南京总医院全军普通外科研究所已成为全国营养治疗中心，25000余名患者接受了营养支持治疗。为了培养更多的临床支持人才，黎介寿牵头创建了国内一流的“临床营养支持培训中心”，每年承办两期国家级继续教育一类项目“营养支持的应用与研究”高级学习班，至今已培训1200余名营养支持骨干。

浙江女青年陈航因怀孕期间肠损伤，术后小肠仅剩30厘米，只有正常人的十五分之一，依靠黎介寿的肠外营养支持疗法，陈航恢复了身体健康。母性是女人的天性，遭受变故的陈航想生一个宝宝，当一个完整的女人。

如果陈航怀孕，就意味着肠外营养要维持两个生命的运转，这不单单是增加剂量那么简单。黎介寿认为，这既是圆

一个女人当母亲的梦，又是一个医学研究发展的方向。他请来妇产科医生一起研究，反复调整治疗方案。在黎介寿的精心治疗下，陈航怀胎十月，顺利生下一个健康宝宝，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完全依靠营养支持怀孕生育的“无肠女”。

因小肠只有 28 厘米被称为“无肠少年”的小朱，依靠肠外营养生活了 17 年，成为国内小肠最短、依靠营养支持生存时间最长的短肠患者。

1979 年，普通外科成为全军腹部外科专科中心。1995 年，晋升为全军普通外科研究所。而今，普通外科研究所已成为国家、军队、江苏省重点学科，南京大学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和国家卫生部临床药理基地、全军胃肠外科重点实验室。形成了肠痿、移植、营养支持、实验室等 12 个临床医学研究小组，拥有 208 张床位。年收容 5000 余人次，治愈好转率达到 96.4%。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面对曾经的不解和非议，黎介寿在医学的道路走得那样坚定，那样执着，那样的义无反顾。“学科发展有一个方向，我不愿意人家搞什么，我们就搞什么，我们所做的是人家没有做的，是没有很好开发的，

但是病人需要的。我的工作方法，就是只要看准一个方向，就执着地往前走。”黎介寿总是以超前的战略眼光审视普通外科的研究发展方向，以临床一线需要为科研出发点，使科研成果能直接更好地为病人造福。

有段时间，喜欢敲敲打打做手工活的黎介寿，办公桌上总是放满了钳子、锉子、锤子、注射器、尼龙管、水盆等，经过 2000 多次试验，他终于制成了注射器穿刺射管等工具，与有关工厂协作制成了可用于临床的器械，这一器械与方法得到推广与应用，直至 1985 年后才被更好的“舶来品”所替代。

在普外科领域，黎介寿开创了三个全国第一：外科营养支持、腹腔感染控制和小肠移植。上世纪 70 年代，肠痿治疗刚起步时，不少人劝他，这行当又臭又脏，是替人擦屁股的活，算了，还是干你的本来专业吧。但他不为所动，毅然选择了肠痿专科，最终发展成了外科领域的一个“王国”。搞小肠移植，在外科界是最难的手术，在当时的中国简直是如同“上九天揽月”，有人劝他三思而后行，但他却将这个难题做成了亚洲第一。

重症胰腺炎的治疗，是世界公认的医学难题，发病严重时患者肺、心、肾三大脏器衰竭，病死率高达 60%—65%。

2006 年，82 岁的黎介寿再啃“硬骨头”。经过潜心研究，他发现，这种病之所以死亡率这么高，主要是因为发病急，血液里产生、积聚了很多毒素，治疗往往没有见到药效，病人就死亡了。

经过反复论证思考，黎介寿打破以单一学科为基础的传统治疗模式，决定把连续性血液净化引入到急性胰腺炎的治疗中，采取早期控制炎症感染，通过体外循环治疗技术，利用滤过、透析以及吸附的原理，连续不断地清除机体内的有害物质，从而对脏器起支持作用。

结果收到了奇效，重症胰腺炎的治愈率一下子提高到 90%—95%，创造了世界最好成绩。先后有来自加拿大、新加坡、日本、澳大利亚的 19 名重症胰腺炎患者，包乘 SOS 国际救援专机慕名飞来南京，在黎介寿和他的学生精心治疗下起死回生。

2011 年春节，湖南长沙 28 岁的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刘炳炎命悬一线，可发病时他仍在当地医院住院。专家李维勤

通过网上会诊了解病情后十分犹豫：“病人病情这么重，距离南京总医院又这么远，万一病人送来就断气了，救不活怎么办？”

黎介寿得知后，回答：“这么年轻的生命，我们不能说放弃就放弃，一定要争取收治，而且要尽全力抢救！”

李维勤一方面跟小伙子家属建议，可以包“SOS”国际救援飞机来南京，既安全又可以争取时间；另一方面，在医院 ICU 病房空出床位，准备实施抢救。可左等右等，人还是没到。第二天一早，黎介寿查房时发现病床还空的，关心地问：“那个湖南的小伙子怎么还没到？”

原来，当天北京的“SOS”包机飞到长沙，患者刚要被往飞机上抬，血压急剧下降，非常危险。因此，飞机在为患者在长沙专门停留了一夜。

“飞机都能为小伙子停一夜，我们能更应该尽全力给予抢救！”刘炳炎飞抵医院后，黎介寿亲自带领李维勤等专家紧急救治。经过近 3 个多小时的手术，小伙子转危为安。

忘我攀登者的路，总是在前方。2010 年 6 月的一天，黎介寿的大弟子、现任普外科主任李宁走进他的办公室，高

兴地说：“刚才江苏省科技厅领导来电话，想把我们的科研成果‘肠功能障碍治疗研究’上报评选国家科技进步奖，征求我们的意见。”

黎介寿很意外：“不是评过奖了吗？”他清楚地记得，这项成果曾先后获得过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江苏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李宁说：“不一样，这次是评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黎介寿问道：“能行吗？”

李宁说：“行不行，是国家奖励办公室的事，我们报上去争取吧。”

黎介寿没有这个思想准备。因为他没有把自己的成果看得那么重。想一想，全国这么大，有多少优秀成果在申报，轮得上吗？

其实，他小看自己了。这项成果汇集腹部感染控制、营养支持、小肠移植等系列研究，是自己几十年和几代研究所人艰苦攻关的结果。

按照省科技厅的要求，材料报上去了。出乎意料，不几天，国家奖励网公布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初选获奖课题，“肠功能障碍的研究”名列其中。

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评选程序十分严格，课题审查通过后，是专家初评，然后是评审委员会开会讨论，接下来还要对课题当事人直接提问，还有现地考察，等等，几乎是过五关斩六将。

评审委员会通过后，接下来对课题完成者的提问。

提问以电话方式进行，提问的人在北京，回答的人在南京，提问和被提问的人是不见面的，也是不认识的。

十月的南京，春华秋实。这天，黎介寿把几名骨干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迎接来自北京的提问。这是一次考试，但更像一个隆重的仪式，李宁来了，任建安来了，李幼生来了，嵇武来了……普通外科研究所专家级的人物，都集中到了黎介寿的办公室，一同接受来自北京的考试。

大约9点钟，黎介寿办公室的电话响了，是北京来的，对方简单介绍了一下，便问道：“你这个课题在国际上影响如何？”

这个问题不复杂，黎介寿了解世界上目前搞肠道研究的所有医院，水平超过南京总医院普外科研究所的不多。他从容地说：“我们在这个领域的研究，目前在世界处于领先水平。我们曾在世界医学权威杂志上发表过 60 多篇文章，这个数字只有美国的匹茨堡大学器官移植中心比我们多。另外，我们的肠移植数量，在全世界所有医院中排第二。可以这么说，我们在肠功能障碍方面的研究，在国际上是有影响的。”

对方“嗯”了一声，好像还挺满意。接着又问：“‘肠功能障碍’这个名词能不能得到人家的承认？”

“人家”，指的是国际上的同行。黎介寿上报评奖的题目是“肠功能障碍的治疗”，在国际上发表文章也是这么讲的，人家如果不承认早就改了，可是没有改，说明人家是认可的。黎介寿自信地回答：“我在国际上发表的论文或演讲都是这么表达的，没有人提出过异议。”

是的，不仅没有异议，还很钦佩。一次，黎介寿在参加国际学术交流会时，他的“肠功能障碍治疗”发言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会后，国际权威学术机构、欧洲肠外肠内营养学会主席森格教授对他说：“我是过去众多研究该问题而无果者之一，看到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感到非常高兴，特别是你给出的如此漂亮的证明，请接受我对你令人赞叹的、惊奇的成果的祝贺！”

北京“考官”稍稍沉默后说：“我的问题问完了，你的回答我很满意。”

就两个问题？黎介寿有点意外。其实，成果都摆在那里了，问不问，就是一个形式。

当然，评审还没有结束。又过了一段时间，国家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带着国家农科院、军事医学院、北京医科大学等一批著名专家来到南京总医院，现场考察评奖课题。

专家们先是到病房考察，然后查看资料，再看实验室。特别是在病房里，他们围着肠疾病患者，不时地问这问那。其实，他们就是要进一步了解黎介寿，了解这个课题。整整一天，最后评委作了讲评，说什么都好，唯一的不足的是同国外交流少了一点。

这个不足，黎介寿是知道的。这些年，只有英国的学生来普通外科研究所培训见习过，这显然是太少了，与研究所的发展还很不适应，自己在这方面已有所考虑了。他说：“我们已经感觉到了，正在努力，准备派一些人出国学习，还准备请一些国外专家来我们这里讲学，争取使我们的实验室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这年8月的一天下午，最激动人心的消息来了。黎介寿正在病房查房时，协和医院的院长赵玉佩打来电话：“恭喜您，您的课题评选通过了，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赵玉佩是这次评奖的评委，同黎介寿相熟，第一时间通报了喜讯。

耄耋之年，人生洗尽铅华，黎介寿对一切都很淡定。但这次不一样，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他心里还是有点小小激动的。几十年来，在肠道疾病治疗研究上，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汗水，只有他知道。这个奖是对他这一辈子工作的肯定，是对全军普通外科工作的肯定，他怎能不高兴、不激动？撂下电话，他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的弟子们，让他们一道分享这份共同的荣誉。

喜讯迅速在普通外科研究所传开了。所有的人都激动万分。接下来，祝贺电话、短信是一个接着一个。但黎介寿很清醒。这是几代普通外科研究所人共同努力结果，是国运兴盛的结果。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祖国的发展，他个人是不可能获得这个大奖的。个人跟国家的关系是风筝跟风的关系。只有国家的天风浩荡，个人的风筝才能飞得更高更远。

2011年1月14日，黎介寿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从党和国家领导人手中接过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证书。

从北京领奖回来的那天晚上，女儿黎海菁专门给他做了很多好吃的菜。席间，她对父亲说：“爸爸，您获得这么高的荣誉，真了不起，我衷心祝贺您！您永远值得我们骄傲！”

黎介寿笑笑说：“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只是在事业上尽了一点力而已。”父女俩亲密无间，在这个大喜的时刻，更是无话不谈了。女儿又说：“爸爸，您院士也当了，大奖也拿了，事业和荣誉都顶天了，该退休在家享受天伦之乐了吧？”

毕竟是快 90 岁的人了，黎海菁顾及爸爸的身体，劝过多次，让他歇下脚步，在家颐养天年，享受天伦之乐，可黎介寿总是说自己的课题还没有做完。

顺着女儿的话，黎介寿说：“得大奖当然是好事，但不能忘乎所以，只有更加努力，才能对不起国家给我这么高的荣誉。肠道疾病研究还有很多需要我们去攻关的东西，不能因为有了点小小的成绩就骄傲自满起来，那就太肤浅、太没有境界了。”

其实黎海菁是最了解父亲的，他对医学事业的重视，甚至超过了对自己身体和生命的重视，怎么可能离开岗位歇下来呢？她也只不过说说而已。“爸爸，只要您高兴，只要您快乐，您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我都支持您。”

第九章 无垠之爱

“是谁的眼睛关注着忧伤，是谁的双手抚慰着病痛，是谁把生命的旋律一次次奏响——是你，是你用仁术创造奇迹，用爱心实现梦想……”这是无数患者康复后，对黎介寿的真情告白。

60 多年来，黎介寿把医德修行作为终生课题，把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作为终生追求，以大爱仁心，为万千患者送去健康和笑容。

1. 做医生就要爱病人

黎介寿对患者满怀深情，病人在他心里永远是第一位的。

“在一个具有道德感的医生面前，歌星和纤夫，总理和士兵，没什么不同。”做医生就要爱病人，是他恪守的从医信条。

黎介寿外出参加学术会议，心里总是放不下病人，一开完会就急忙赶回医院；每年的除夕夜，他都是在病房与患者一起欢度；他当医生 60 多年，救治了无数的患者，却常常为受到病痛折磨、特别是逝去的病人心里难过。至今，提起 20 多年前没能救活的肠痿女孩，他仍会伤心落泪。

找他看病的人，有的是党政要员，有的是高级将领，有的是基层部队的官兵，还有素不相识的普通群众，但他从来都是一视同仁，不分尊卑。对家庭困难的患者，他尤其关爱。

一天，黎介寿查房时，看到一位挺着大肚子的中年妇女在悄悄地流泪，旁边还站着两个悲戚戚的孩子。怎么了，黎介寿一打听，原来，这位妇女是患者周平义的母亲，两个孩子是周平义的哥哥。

周平义患的是肠痿，需要一大笔治疗费用。而他家在河南农村，全家仅靠父亲打工的一点微薄收入支撑着，治病已花光了他们家所有的钱。这些天，母子几人都是等到医院食堂快要下班时候，去捡些剩饭剩菜充饥，已经 3 天没有好好吃一顿饭了。而且，周平义的母亲还是有着 5 个月身孕的孕妇。昨天，护士长通知他们补交医疗费，可她打电话借钱，

一天时间下来，一分钱也没有筹到，眼看着就没有钱治疗了，母子怎能不伤心？

这一幕，立即触动了黎介寿内心的记忆。他想到了自己的童年，一个人在没有饭吃的时候，是多么需要帮助啊！他转身对身边的护士说：“把我的饭卡拿来。”并对挺着大肚子的妇女说：“不用难过。孩子的病不治好，我们是不会让他出院的，医药费我们一起来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

拿卡的护士来了，黎介寿把饭卡递到妇女的手中，和蔼地说：“你们先去食堂好好吃顿饭。”

周平义的母亲接过饭卡，眼泪就下来了。她没有想到在她走投无路的时候，有人向她伸了一把手。她想给黎介寿磕头，被黎介寿扶住了。

要成为一名好医生，首先要对患者充满同情。外表坚强的黎介寿内心情感十分丰富，他深知，为了治病，有的患者卖掉房子，有的卖掉口粮，有的卖掉家当，负债累累，还有的病人甚至因为无钱住院而选择了放弃……每当想起这些，他的心情就十分沉重。

为此，黎介寿十分珍惜每一次为患者看病的机会。不管学术活动安排得多满，每个星期一上午，都要坚持上院士门诊。一次到外地开会，原定星期天返回，可因为台风过境，飞机停飞，他心急如焚，立即给科里打电话，让工作人员通知病人，把门诊时间改在了星期一下午。年逾八旬的他改乘公共汽车，风尘仆仆地赶了回来，准时参加了下午的院士门诊。

黎介寿在学生眼里是一位严师，很多学生由于犯错都被他批评过，但他在患者面前，脾气却出奇地好。

有一位中年患者，由于长年住院，家庭拮据，脾气越发暴躁。一天早上，患者抱怨自己的检查报告来晚了，急躁的他居然冲护士发起了火，骂声越来越大，有个年轻医生怕影响其他患者休息，忙上前制止，没想到他连医生也一起骂，后来还连带骂起了黎介寿。见患者这样无礼，大家忍不住和他理论起来。

黎介寿听到动静后走了过来，问清原由，心平气和地向患者说明情况，患者的火气慢慢平息了。事后，年轻医生们感慨地对黎介寿说：“这位患者对你这么无礼，您还能忍受，

真是令人难以理解。”而黎介寿却说：“人得了病，心里烦躁，难免要发泄一下，当医生的，不能计较这些。”

有个年轻医生在门诊时，无意中对他的病人说，你的病情很不好，大概五年后就会转成癌症。患者一听就吓懵了，继而号啕大哭。

黎介寿得知后，心如刀割。事后，他找那位年轻医生，进行了耐心交流。他说：“尽管你说的是实情，是科学，但病人可不这样想。你这样说，就相当于判了他死刑，缓期五年执行，病人怎么受得了！作为医生，应当学点心理学，讲究语言表达的技巧。”一席话说得年轻人茅塞顿开。

黎介寿年轻时看过一幅油画，他一直难以忘怀：一个风雪交加的圣诞之夜，壁炉里的火焰熊熊燃烧着，人们在屋里纵情欢笑。而户外的冰天雪地里，一名医生肩背药箱，独自踏着没膝的积雪出诊。风雪中，药箱上的红十字格外醒目。

他从这幅画里读懂了：医生是为病人而存在的。为了病人的生命，远离温暖、欢乐是医生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份神圣时刻充溢在他的心头。

年近九旬的黎介寿，仍然坚持每周做两到三台手术，大家既心疼又钦佩地称他为“拼命三郎”。一次，他在为一名复杂肠痿患者手术时，突然心律不齐，脸色苍白，冷汗淋漓。黎介寿在心里默默命令自己：“为了患者的生命，你不能倒下，必须挺住！”就这样，他坚持站立了7个多小时，为病人成功手术。

病人得救了，黎介寿却一头晕倒在手术台上！苏醒后，他的第一句话就是：“病人的情况怎么样？”

2. 人命关天

黎介寿对患者极端负责，对工作极端热忱。

“人命关天！没有责任心，医术再高明，也不是称职的医生。”他始终以病人满意为标准，对医疗护理中存在的不够规范的行为，从不姑息迁就。

处于昏迷状态下的重症病人，手术后经常因剧烈疼痛而手脚乱动，极易拉扯输液管，影响正常治疗。护理人员迫不得已，用绷带将病人手脚绑起来，有的病人手脚都被勒紫了。

黎介寿查房时，看在眼里，疼在心里，“这样病人怎么受得了啊！”一连几天，他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琢磨着怎么用更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几经实验，终于发明了一种适合重症患者术后专用的“约束带”，并在不少医院推广。

黎介寿对工作极端热忱，在他看来，只要能为病人送去健康，就是吃再大的苦，冒再大的险也在所不惜。

一次，一位身患肺癌、肺气肿，具有高致病、高传染性的老将军突然窒息，黎介寿不顾危险，口对口为病人吸痰，病人转危为安，但黎介寿的咽部却因此发生了严重感染。不少人说：“他的病传染性那么强，难道你不知道后果吗？”黎介寿却说：“我很清楚。但是，我是个医生，面对病人的需要，我别无选择。如果感染一下就能救一个病人，这很值，我愿意！”

一位患者在门诊就诊时，被黎介寿诊断出患有严重的炎症，必须立即住院治疗。由于家庭经济拮据，患者面露难色。夫妇俩商量了好久，还是选择回家。

黎介寿对患者说：“你的病情很严重，一定要住院治疗，如果是因为没有钱，我个人可以给你垫付住院费。”

“你的同情我们很感激。但天下的病人很多，你救济得了吗？病人最需要的，不是经济上的救济，只要医生认认真真地把病人的病看好，就感激不尽了。”

病人的话让黎介寿禁不住黯然神伤。此后，他多次用这件事教育身边的医务人员：患者最需要的，不是同情的眼泪，而是医生治病救人的妙方。

黎介寿甘为科学献身，为病人谋福利，从不计个人荣辱。

北京青年杜志伟，本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在读研究生，但风华正茂的他万万没有想到，无情的病魔摧垮了他。由于得了多发性息肉，腹内又长了一个巨大的肿瘤，还有肠痿，瘤子无法切除，四年了，没有吃过一口饭。他辗转全国多家知名医院，都无法治疗。很多医生惋惜地说：“我们已经尽力了，只能熬一天算一天了。”

当患者住到南京总医院普通外科研究所的病房里时，已经瘦得不成人形了。小伙子眼含热泪，拉着黎介寿的手，奄奄一息地说：“黎爷爷，我已经四年没有吃过饭了，我不奢求生命能有多长，我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能好好地吃两顿饭……”

黎介寿的眼睛湿润了。他仔细地检查后，深知要满足患者这“小小的要求”有多难！要摘除巨大肿瘤，患者很可能死在手术台上。

有人劝他：“你别冒这个险了！一旦失败，会影响你的个人声誉！”但患者的需要就是创新的动力，黎介寿早把个人名利得失置之度外。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实现病人的愿望！

也许是上天垂怜这位年轻人，经过反复论证，黎介寿终于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绕过瘤子将两段完好的肠子接在一起。小杜终于能吃饭了！他满怀感激地出了院，美美地吃了两年饭，游玩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后来，由于肿瘤越长越大，无法救治。临死前，他对家人说：“是黎爷爷让我的生命延续了两年，让我再次品尝了饭菜的滋味，让我真正感受到了亲情。虽然我还不到30岁，但我没有任何遗憾了……”

3. 要做有良知的医生

从医 60 多年，黎介寿廉洁行医，洁身自爱，从不利用手术刀和处方权为自己谋取私利。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医生，我们不能治好了患者的身体，却又使患者陷入生活的困境。”兄弟俩有一个共同坚守的从医理念：任何对于红包和好处的非分之想，都会在长久的觊觎中，冲淡医生的责任心，降低医生的医术水平。要永远记住，人类和其他生灵的健康，远远比医生的腰包更重要。

面对有的医院医生给患者开高价药、乱检查、收红包的现象，黎介寿十分痛心。他常对身边的人说：“不少患者家在农村，条件并不好，有的是借钱来看病的，有的甚至卖掉了家当，如果我们再收他们的红包，于心何忍？做医生的，一定要为患者着想，能省的则省，能减的则减，决不能收患者的红包，发昧良心的财。”

有天晚上，黎介寿吃过饭从家里来到医院，路过急诊室门口，看到一帮人吵吵嚷嚷的。干什么呢？他走过去一看，担架床上躺着一名十七八岁的小姑娘，已经不省人事。他问一位正在诊断的年轻医生：“这个病人怎么了？”年轻的医生回答道：“是急性化脓性胆管炎。”

这种病如果不立即手术，随时会有生命危险。他焦急地说：“那还不赶紧手术？”他身边另一位年轻医生拽了一下他的衣角，轻轻地对他说：“病人还没有交住院费。”

黎介寿明白了，原来是钱的问题。难道钱比生命还重要吗？黎介寿不容置疑地说：“救人要紧，立即手术！”

患者的父亲听到黎介寿关切的话语，哽咽地说：“这是我的女儿。突然发病了，临时找亲朋好友借钱，没有凑足治疗费用。我家里还养了两头猪，等卖掉了一定把钱补上。”

黎介寿说：“不管有没有钱，我们都会尽力抢救的。”随后，他走进手术室，亲手给这个小姑娘做了手术。

第二天，他召集普通外科的医务人员开会，对大家说：“我们不是经常讲要以人为本吗？做医生的，以人为本就是要以病人为本。医生如果见死不救，以钱为本，就丧失了职业操守。无论什么时候，在普通外科研究所，决不能出现对不起病人的事！”

说到这里，黎介寿加重了语气：“医生开刀的双手，就是为托起病人的幸福而存在的。我们做医生的，在有限的天

赋之上，还有无限的天职，如果天职被忽略和遗忘，最终受害的，不仅仅是患者，还有我们自己。”

当今社会，有很多人整天都围绕着两样东西在追求：一个是追求有钱，一个是追求值钱。

有钱和值钱是两个概念。有钱的人不一定值钱。值钱是个人价值观的体现。不断追求高尚的过程，就是让自己不断值钱的过程。黎介寿就是后一种人。

在他眼里，钱不重要，医德最重要。黎介寿一直希望自己做一个良医，良医首先要有良心，没有良心就谈不上做良医。这些年，很多被他挽救了生命的人都想感谢他，有的给他送红包，有的给他送礼物，但他从来没有收过患者一分钱、一件值钱的礼物。

一位多年来饱受肠痿折磨的患者经他治愈后，执意要送一条金项链表达感激之情。遭到谢绝后，他就将金项链悄悄放在黎介寿的办公桌上。等黎介寿发现时，病人已坐上了返回老家的火车。他立即查明患者的家庭住址，让一名出差的学生中途下车，专程到病人家，退还了金项链。

但他也有“破例”的时候。2003年7月，“无肠农妇”马秀兰，在“新闻联播”中看到南京总医院全军普通外科研究所开展小肠移植手术的消息后，带着女儿丈夫卖破烂攒下的一千多元钱从黑龙江赶来，找到黎介寿，迫切要求为她进行小肠移植。三个月后，马秀兰终于实现了换肠的愿望。

临出院前，马秀兰一整宿没有睡，连夜给黎介寿精心绣制了一双鞋垫，上面绣着一对燃烧的红烛，一针一线饱含了感激之情。

“我该怎么报答您的大恩大德呢？您要是不嫌弃，这双鞋垫就送给您吧！”握住黎介寿的手，马秀兰泣不成声。

黎介寿高兴地收下了。在他看来，这不是一双普通的鞋垫，垫上它，就会时刻记起患者那份朴实的感情，脚底板就会踏实，腰杆子才不会弯！

还有一次，黎介寿不仅收了钱，还收了100万。

这天，他突然接到一个上海来的电话，对方对他说：“我是上海华东医院的外科主任，我很早就从《肠外瘘》杂志上知道了您，也很仰慕您。我有个同学的丈夫是香港人，患严重肠瘘，想请您医治。”

黎介寿客气地说：“请他来吧。”

为慎重起见，这位外科主任又来到南京总医院，当面与黎介寿进行了交流，临走时还把黎介寿撰写的《肠外瘘》一书带走了，说是给病人看看。

几天后，患者来了，是由三个医生护送来的。患者王某是香港某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患直肠癌并发症，在香港医院做了手术，因肠粘连分不开，切掉了一断肠子，只剩下一截 80 公分长的短肠，形成了肛门瘘。后来又去了美国和加拿大，都没有治好。为了日常护理，他请了三个私人医生，一个内科医生管吃药，一个外科医生管换药，还有一个医生管大便造口的护理，身上整天背着一个尿袋子。

这个病把王董事长折磨得太苦了，10 年间没有出过家门。黎介寿一看，就知道病人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给他量身定制了一套治疗方案，一个月有了效果，二个月就有了明显效果，三个月就好了。

王董事长做梦都没有想到，他的病还能治好，那几天，他不知有多高兴。当黎介寿出现在他病床前时，他对黎介寿

说：“您的医术太让我钦佩了。我想表达一下对您的敬意。您不用担心，我的公司效益还不错。”

黎介寿听出来了，王董事长这是要表达心意，也就是说要送他一点什么东西。他能要吗？别说医院有规定，就是没有，他也不会要。他说：“我给您看病，是一个医生应尽的职责，天经地义，用不着谢的。”

《圣经》上说“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王董事长信奉基督教，从来都不吝啬钱，更何况有人治好了他的病，不表达一下心意，似乎将来就更进不了天堂。他诚恳地对黎介寿说：“我知道，您有自己的职业操守，个人是不会接受我的赠予，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不可以为你们医院做点事？”

这句话一下子提醒了黎介寿，他忽然想到了自己正在筹划设立人才培养基金的事。

黎介寿年轻时，几次想出国深造，但条件不允许，这给他留下了深深的遗憾。他想，现在国家发展了，医院条件好了，这个遗憾不能在年轻人身上发生了。他要为年轻人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成才环境，使他们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去国外

学习深造。这是普通外科研究所发展的需要，也是站在世界医学制高点上，培养创新型医学人才的需要。

因而，他想到设立人才培养基金的事。而这需要一大笔资金，钱从哪里来呢？这事让他犯难了很久很久，现在王董事长执意要表达心意，那就借梯上楼，让他出点力吧。

黎介寿说：“那好，我现在正准备搞一个人才培养基金，您如果能支持一下，我代表医院和学生们谢谢您！”

王董事长很爽快：“这个太好了。香港人在大陆率先设立教育基金的，就是我的父亲，周总理还表扬过他。现在您要设人才培养基金，我当然愿意支持，出100万好不好？”

“当然好。”黎介寿本来就没有想到会有患者来赞助，现在王董事长一下子给了这么多，他还能说不行吗？他感激地说：“谢谢您的支持！”事后，黎介寿把这件事向医院领导作了汇报，医院领导也很支持他。

黎介寿总是替病人着想，在治疗费用上能省则省。他始终认为，能让病人花最少的钱治好病，是医生践行医德医风的具体体现。面对医疗系统有些医生给病人开高价药、乱检查的现象，他十分痛心。

他经常提醒身边的医务人员：“君子爱财，但要取之有道。收‘红包’、拿‘回扣’，无异于让病人雪上加霜，屋漏遭雨，于心何忍？”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黎介寿不仅自身医德高尚，还十分注重科室医德医风建设，规范医护人员的从医行为。

每当有新的人员到普通外科研究所工作，接受的第一次教育，就是医院和研究所有关医德医风制度规定的学习，重点内容印发人手一册。

“医务人员不收红包，感谢您的配合支持”、“收送红包均属违法，请您爱护医护人员”……在普通外科研究所病房的醒目位置，有关廉洁行医内容的警示牌比比皆是，时时处处提醒医护人员遵照执行。

研究所率先在医院推行“十个不准”行医规范，定下“不准私自外出有偿手术、会诊，不准开大处方或开单提成”的“铁律”。医德医风考评进入技术职务评审，进入立功受奖评定。多年来，研究所的医德医风建设一直走在医院的前列，被军区表彰为“医德医风建设标兵科室”。

4. 绝不轻言放弃

黎介寿为了实现对患者的承诺，永不自满、永攀高峰、永不言败。

“人的生命是最可宝贵的，做医生的不能轻言认命”。他经常教育医护人员，患者享有健康的权利，作为医生，要善待每一个生命，绝不能轻言放弃。

有一次，普通外科收治了一名 40 多岁的女病人，她患的是胆原性败血症，医疗护理要求非常高，稍有差错就会导致死亡。黎介寿带着年轻的医生们连续三四天对患者进行观察治疗，每 20 分钟打一次针，几天下来，治疗组的人都累得精疲力竭了。

这天晚上，黎介寿对小组的同志说：“今天晚上可能有转机，如果患者脚发热，立即给我打电话。”

凌晨一点多钟，患者的脚果然发热了。学生们却不忍心在这个时间把黎介寿吵醒，但老师吩咐过的话又不能不听。经过激烈地思想斗争，大家商量后，还是决定给老师打这个电话，同时约定：如果电话铃响两声，没有人接就挂掉。

结果，电话铃只响了一声，黎介寿就拿起了电话。此时，他还没有睡，正在查找文献，研究救治的方案。事后他对人说：患者的病没有治好，我心里总是不踏实，睡不香的。

黎介寿学识渊博，医术精湛，素有“医学艺术家”的美誉，病人敬重他，学生们也很崇拜他。但他经常说自己是一只“笨鸟”，是患者的生命和健康驱使他不停地思考，不懈地学习、研究和拼搏。

2003年，中央某媒体一位主任记者，患严重肠痿，多方治疗无望。国内几家大医院的专家都说：“你就认命吧！”被抬到普外研究所时，1米70的个头，体重只有35公斤。

“很多专家都已经给我‘判过刑’了，我对治好自已的病信心不大”，病人从牙缝中艰难挤出这句话。

从不“认命”的黎介寿，为他做过一系列检查后，坚定地告诉他：“你的病可以治，而且一定能治好！”

老院士一句话，让患者重新看到了生命的曙光。第一次手术后，他的末端回肠出血，可一时找不到出血点，情况十分危急。当天下午，黎介寿再次为他做了血管造影，还是没有找到。大家连续讨论了五、六个小时，仍然没有结果。

那天晚上，黎介寿将病人的相关资料带回家，反复查看琢磨，直到凌晨，终于在一个细微处找到了出血点。考虑到患者的身体已不允许再次手术，他巧妙地在出血点植入一个气囊，通过压迫止血，用最简单的办法解决了大难题。

经过5个月的精心治疗，患者恢复了健康，重新回到了心爱的工作岗位。为报答救命之恩，这名蒙古族患者在黎介寿八十寿辰，带着家人专程从北京赶来，献上洁白的哈达，深深地鞠躬致谢。

一位20多岁的云南女孩，由于身患肠疾用药不当而失聪，家人都叫她“小聋女”。女孩肠痿十分严重，久治不愈，粪便外溢，浑身散发着浓浓的臭气，家人将其视为累赘，多次欲将其驱出家门。在云南省妇联的帮助下，“小聋女”来到南京总医院普通外科研究所求治。黎介寿为她减免了昂贵的治疗费用，并亲自为她做手术。

康复出院的头几天夜里，“小聋女”多次在睡梦中笑醒，并大声喊叫：“我好了，我再也不臭了！”

出院前，黎介寿前来送别。“小聋女”一直笑个不停，反复说着一句话：“黎爷爷，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您……”

她的话语是那么的朴实，神情没有任何修饰。黎介寿无比欣慰，用笔在纸上写道：“不用谢，这是医生应该做的。”

黎介寿经常教育学生们，为了患者的生命和健康，即使只有 1%的希望，也要作 100%的努力。

有一个重症患者，同时患有肾衰竭、肠痿等多种病症，病情非常严重，住进医院时，家人已经有了放弃的念头，黎介寿知道后，多次鼓励他的家人要全力救治，不到最后一刻决不能放弃。这天下午，他到外地做学术报告。一边开会，一边多次打电话回来，询问患者的病情，在黎介寿的关心下，科里为患者制定了详细的治疗计划，全力投入救治。经过大家的精心治疗，这个患者奇迹般地活了过来，后来完全康复。直到现在，这个患者和家属还对黎介寿深深感激。

这些年，黎介寿取得了一系列世界第一、亚洲第一、中国第一，有人说他的这些创造多属“偶然”，其实，这些“偶然”的背后，是执着的探索与苦苦的追求；这些偶然的源头，是患者的需要；这些偶然的动力，是对患者深沉的爱。

大爱铸忠诚，丹心系民生。黎介寿的年龄越来越大，但对患者的感情越来越难以割舍。

黎介寿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在有生之年，成立一个基金会，救助困难病人。为此，他曾经到处奔走，但因为自然人不具备筹建基金会的资格，这件事成为他的一个遗憾。

有一首歌叫做《向天再借五百年》，黎介寿听了以后很有感慨。面对无限热爱的医疗卫生事业，他深感岁月不饶人，禁不住激情澎湃。“我不想再活五百年，只要能给我二十年，我可以为更多患者服务……”

第十章 桃李满天

人才培养，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实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黎介寿把人才培养作为一项伟大的工程，躬身实践，诲人不倦，培养了一大批顶尖人才。

1. 看到学生在成长，就像自己的科学生命在延伸

黎介寿常说：“看到学生成长，看到事业后继有人，就像自己的科学生命在延伸。”多年来，他甘当绿叶护红花，将学生推向前台，培养成才。

1968年，黎介寿被下放到安徽金寨，他从当地的初中生中吸收了8名弟子，从基础知识教起，手把手地教动物手术，为当地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这是他第一次带学生。

1979年，面对当时人才青黄不接的局面，他先后开办了军区、全军腹外科训练班，为全军培养了大批人才。1985年，南京总医院与第二军医大学联合办学后，他开始带研究生。他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规定每人三个月必须交一篇综

述文章，每周安排一名年轻医生在科里讲课，每周邀请地方大学讲师上两堂英语课，逼大家学习。

如今，在普通外科研究所，只要学生们有问题向黎介寿请教，他总是耐心地给以解答，一时解答不了的，他会找来书籍或上网查询，尔后再告诉学生以及答案的出处。学生们的每一篇论文，他都要仔细地阅读、修改，每一篇至少修改三遍以上。许多学生都珍藏着他亲笔修改过的文章，并以此勉励自己。

黎介寿先后发表过 600 多篇学术论文，而经过他修改后发表的论文就有 800 多篇，甚至许多出自他手的论文，经常见不到“黎介寿”三个字。他提倡，谁执笔的论文，谁主研的科研课题，谁的署名就排在第一。当学生们在他指导下取得了成果，要给他挂名时，他婉言拒绝：“我重视的是对患者有利的结果，荣誉是谁的，我并不关注。课题是你们做的，我没有权利挂名。”

这几年，一些复杂、高难度手术，他常常让学生主刀，自己在一旁做助手；接到学术会议邀请，他尽量让弟子去参加；约他写的书稿，他让年轻人领衔。他还尽力将年轻优秀

的科技人才推荐到各级学术机构，以提高他们的知名度，把一大批年轻人推向前台，让想干事、能干事的人干成事。为了提高学生的知名度和业务水平，他全力筹措经费，甚至自己掏钱，帮助学生把论文寄往国外权威机构修改或出版。

嵇武是国内第一个腹腔镜专业的硕士和博士，2002年以来一直跟着黎介寿进行临床博士后研究工作。一天，他向黎介寿汇报了自己在腹腔镜方面的科研设想。黎介寿当即问了他两个问题，一是什么是当前的腹腔镜手术，国外是怎样开展的；二是腹腔镜机器人在普通外科应用的现状如何，前景怎样。作为这方面的专家，嵇武却无法全面、准确地回答。因为这两个问题，在国内基本还没人关注，在国外也仅仅是少数几个研究中心才开始探索。在黎院士的指导下，嵇武迅速调整了研究思路，不再满足于国内领先，而是瞄准了国际前沿，开展创造性的研究，先后有多项研究成果填补了国内、军内空白。

黎介寿始终站在学科前沿，把世界医学难题作为主攻方向，着力培养高层次人才。他每天都要挤出时间读书、看报、

上网，及时了解世界医学前沿信息，把握医学研究方向。所以他给每个学生的论文开题和科研选题，都具有前瞻性。

年轻的博士江志伟，一心想着多做手术，将来成为“一把刀”。黎介寿却让他从事肿瘤患者营养支持方面的临床研究。开始，江志伟心里有些想法，经过黎介寿多次的谈心鼓励后，他安了心。如今，他在肿瘤晚期患者的营养支持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回想当初，江志伟感慨地说：“黎院士真是用心良苦，在他身边工作，我们会有更大的作为。”

博士李幼生，是个极具发展潜力的肠道疾病年专家，国外一些研究机构想请他去搞异体小肠移植。面对出国深造的机会，李幼生动心了。

黎介寿得知后，并没有批评眼前这个年轻人，而是帮助李幼生分析利弊关系。他找到李幼生，语重心长地说：“在肠道疾病方面，东方人发病机理与西方人有较大区别，黄种人与白种人有很多不同，你在亚洲肠道疾病研究上已经有了一定基础，立足国内成才将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听了黎介寿的教诲，李幼生出国深造的念头算是打消了，但接下来李幼生却遭遇了科研“瓶颈”。他全身心投入

研究“肠移植供体取肠保存”这一课题，接二连三遭受失败，几乎失去了信心。

黎介寿看在眼里，也急在心上，“必须把他的信心树起来！”黎介寿再次找到李幼生，并与他促膝长谈：“幼生啊，只要研究方向没有错，就要坚定地走下去，千万不能半途而废、一挫就折。如果那样，我们还有什么科研精神可言？”

为帮助李幼生破解课题“瓶颈”，黎介寿多次主持召开专题讨论会，分析原因、找准对策。经过黎介寿的悉心指导，李幼生终于在“肠移植供体取肠保存”上取得突破，填补了国内空白，并在当年被表彰为“全军十大学习成才标兵”。在黎介寿的帮助和指导下，李幼生还挑起了国家重点研究项目“973 计划”课题中“移植脏器慢性失功的免疫学应用基础研究”的大梁。

为给人才提供充足的养分，黎介寿把普外研究所学科细化为肠外瘘、肠移植等 12 个治疗组，按每个学生特点设计发展方向，让他们在不同专业领域尽显所能。

大弟子李宁一度为如何选定自己的专业发展方向心神不定。看到别人改攻新专业后成果不断，他坐不住了，找到导师黎介寿，提出另起炉灶一试身手。

黎介寿告诉李宁，“搞科研不能总盯着成功时的兴奋场景，要做好艰苦奋斗、甘于寂寞的准备。”李宁按照导师设计的“成长路线图”，20余年如一日把普外专业作为主攻方向，先后获得军队和省部级6个一等奖，当选全军普通外科专业委员会主任。

谈及导师黎介寿的教导，李宁、李幼生感叹万千：“黎院士是我们成就事业的‘大树’，既遮风挡雨，又提供养分，正是他不停地给予我们无私的帮助和手把手的指导，我们才会取得今天的成绩。”

在黎介寿的眼里，人人均是可造之才。只要你肯努力，他就会不遗余力的助你成才。

2004年，从南京总医院传来喜讯：普通外科护士长倪元红的论文《临床营养支持的护理与研究》获得中华医学科技奖二等奖。一时间，国内同行纷纷投来敬佩的目光。

获得这样一个奖项，对于南京总医院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新闻，然而，这次为什么会连国内同行都引起关注？原来，这一成果完全是由护理工作者研究和实施的，并且所获奖项也是全国护理学术研究领域有史以来的最高奖项。

提及课题研究的始末，护士长倪元红激动万分：“如果没有黎介寿院士的引导点拨和悉心指导，我不可能取得这个奖项！”

一直以来，人们总认为护理工作只是做一些简单的事情，科技含量低，更谈不上有什么科研项目可做。然而在营养支持研究之初，黎介寿就提出“三分治疗，七分护理”的全新理念，倡导护理人员写文章、搞科研。他找到倪元红：“我们在搞营养支持的研究，你也可搞搞营养支持的护理研究嘛，成功后将对患者病症改善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必定能在国内引起反响。”

听了黎介寿的话，倪元红心里还有些发虚：“过去只听说护理人员写文章，没有听说哪个护士搞科研，如果做不成怎么办？”

“不敢第一个吃‘螃蟹’，哪还有个什么科研精神？你放心做，不要怕丢人！”黎介寿态度坚定。

在黎介寿的指导下，倪元红选定了肠营养支持的护理作为研究课题。她在工作之余，拿起了笔，把自己在营养支持护理工作实践中的所看、所想、所悟，进行了系统地总结梳理。

科研工作毕竟没有平坦的大道。倪元红一次又一次地遭遇过科研“瓶颈”，然而，每当她想要放弃或是停滞不前时，黎介寿总是伸来援助之手，为她加油、为她鼓劲。终于，经过不懈努力，这一科研成果荣获中华医学科技二等奖，成了迄今为止全国护理科研获得的最高荣誉。

2011年1月，南京总医院创新研究成果《肠功能障碍的治疗》，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这是该年度全国医院系统唯一的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该项目的研究，形成了肠疾病全系列针对性治疗的标准和规范，创新发展了传统战创伤腹部外科治疗新模式，使我国肠功能障碍治疗的整体水平进入世界领先行列。

而值得世人关注的，除了这项大奖本身的光环和不易，还有其它很多方面不为人知的感动和震撼。为了这个奖，普通外科研究所几代人付出了无数心血。特别是黎介寿院士，是理所当然的第一功臣。

在获奖名单中，既有初出茅庐的“八零后”，也有护理人员……然而，最初黎介寿将自己的排名放在了最后一名，以此来鼓励年轻人。

2. 要为年轻人撑起一把“保护伞”

黎介寿经常鼓励学生治疗要果断，同时勇于为学生们承担责任。他对医务人员讲：“我就是全所的‘总备班’，有什么问题我负责。”

对一些手术风险较大的病人，他总是主动揽过来。在研究所，大伙儿都叫他“消防队员”，医生们在手术台上下来了，总要喊他“救场”，他总边穿白大褂边笑着说：“我又要去‘救火’了！”不少人劝他：“您是院士，又不是经治医生，把这些棘手问题揽过来，会砸了自己牌子的。”可他却说：

“你不为年轻人多承担些责任，他们就放不开手脚！这个‘消防队员’我必须当。”

一次，一位老干部需要动手术，学生们怕手术失败，心存顾虑。他对助手们说：“有责任我担着！”边说边走上手术台，为这位老干部主刀。

在学生们眼里，黎介寿就是普通外科研究所这棵大树的根，他源源不断地为绿叶新枝输送营养，却从不与绿叶争抢阳光。

当外科医生，整天刀光血影，意想不到的险情随时会发生。心里紧张，手下必然忙乱。现任普通外科主任李宁忘不了，他刚当外科医生时，嗓门大、性子急，遇到紧急情况免不了对助手和护士喊几声。黎介寿就让他跟着自己手术，边做示范边轻声说：“主刀医生一定要稳当，你稳当，助手才能稳当。”

“双套管”是黎介寿几十年来心血的结晶。利用“双套管”引流治愈了无数肠痿患者及胰腺炎患者。同样的一根双套管，不同的人用起来，引流效果大不相同，关键是要领悟它的精髓。

2003 年的一个上午，学生李明给一名重症胰腺炎患者行双套管引流，由于坏死组织太多，把几根管子都堵起来了。面对这样的情况，李明急得满头大汗。这时黎介寿来查房了，看到了这个问题。便说：“对于这个病号来说，双套管的护理难度是很大的，但掌握了技巧就能顺利引流了，你们看着，我来做个示范。”引流的活又脏又臭。李明连忙说：“黎院长，哪能让您来引流啊！”黎介寿笑道：“今天我示范一下，下次你们遇到这种情况就知道该怎么办了。”说着，他就动起手来。看着 80 多岁的老人弯着腰给患者换药，在场的 20 多名医生敬仰之情油然而生，大家目不转睛地盯着黎院士的每一个动作，将黎院士的手法记在心里。

学生李幼生开展“肠移植供体取肠保存”课题后，首次给一名患者做手术，因这类手术风险性大，易出现意外情况，在手术长达八九个小时的时间里，黎介寿始终站在一旁“保驾”。

这不是一般的“保驾”，外科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上级医生在场，出现医疗事故由上级医生负责。

手术终于成功了，为了避免病人术后出现并发症，黎介寿又带着李幼生在病房细心护理：每 10 分钟给病人测一次血压，每半小时测一次心率，每一小时量一次体温……为以后治疗此类病人，积累了极其宝贵的数据资料。

黎介寿对学生的无私之爱，还体现在他求才若渴的胸襟上。

虞文奎是黎介寿带的一名博士研究生，无论是人品还是业务素质，都深得黎介寿赏识。2005 年 5 月，临近毕业之际，黎介寿让他留在研究所工作。出乎意料的是，小虞拒绝了。

细谈之后才知道，他的家人认为部队医院调动频繁，出国或深造的机会少，容易荒废专业，不利于发展，不想让他参军，已给他联系了地方一家非常有名的医院。对此，黎介寿耐心地做工作，渐渐打消了他的顾虑。但其家人仍然表示，不让其当兵。

这时，有人劝黎介寿：“普通外科研究所想要什么样的人才没有啊？想留或想来的人才多呢，你费这个力干什

么？”黎介寿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是一个很有发展前途的年青人啊！”

一向不愿求人的黎介寿院士破例了。他多次找到干部部门，寻求解决的办法，并致函南京大学，希望校方为这名学生落实编制，让其在南京总医院工作，培养军地通用人才。这在军地都没有先例，是很棘手的事情。但在黎介寿的反复努力下，事情办成了。如今，这种人才引进的新模式已成为医院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的新亮点。

2004年初，博士后嵇武有喜有忧。喜的是，他的科研课题“腹腔镜技术拓展在普通外科应用”正式立项了；忧的是，这一世界前沿性课题，是国内外攻关的热点，可南京总医院没有相匹配的高水平实验室。

正当嵇武一筹莫展时，黎介寿当了他的坚强后盾，经多方联系协调，以合作研究的方式，把嵇武送进香港玛丽医院国际腹腔镜研究中心。在这个世界一流的实验室里，嵇武完成了课题研究。学成归来，嵇博士将国际最新的腹腔镜技术应用于临床诊断和治疗，使南京总医院腹腔镜技术跨入国际先进水平。

3. 严师出高徒

黎介寿崇尚严谨治学，为高层次人才锻造成长平台。他总是教育学生，不能仅仅把眼光放在国内领先上，而要锁定世界一流，赶超国际先进。

被誉为“平民院士”的黎介寿，温文尔雅，从不对患者发火，是个受人尊敬的“老爷子”，但在培养学生时却要求非常严格，发起火来也很可怕。

有一天，黎介寿带领弟子们到手术室做手术，不成想，术前竟接到这样一个电话：“黎院士，您快到门口来一下吧，您的一位学生和人吵起来了！”

来不及多想，黎介寿赶紧赶到手术室门口。原来，电话里说的学生，正是刚刚分到科里并在他手下学习的年轻医生。

“怎么回事？吃火药了！”黎介寿非常气愤地问。

工作人员向黎介寿介绍：“这个小伙子不遵守手术室规定，不穿鞋套就往手术室钻，好心提醒他，他不接受也就算了，反而还说人‘临时工’多管闲事。”

黎介寿细细盘问得知，这个弟子前一晚忙着加班赶写论文，结果没能按时起床，想到一大早要随老师手术，被老师知道起得晚影响不好，所以紧赶慢赶地往手术室里冲，把规定忘了个干净。

“本来跟她解释想让她通融通融，可她怎么也不答应，所以就吵来了。”那名弟子向黎介寿解释道。

黎介寿非常恼火：“你还有脸说？赶紧跟人家赔礼道歉。什么地方都讲求个规矩，不管人家是什么身份，只要是依规矩行事，我们都应该尊重。做人都做不好，还当什么医生？”

说完，黎介寿忙带学生向那名临时工道歉。第二天，交班会上，那位弟子还做了深刻检讨。此后，科室医护人员把“规矩似钢铁，谁碰谁流血”铭记心上。

黎介寿平时和蔼可亲，但如果发现谁怠慢了患者，后果相当严重！不少学生对黎老“怒摔病历”的事，印象非常深刻。

那次，驻皖南部队一名军官不慎摔成重伤，虽经全力抢救仍无力回天。在组织死亡病例讨论时，黎介寿见经治医生病历记录不够详细，怒不可遏，“啪”地一声把病历摔到地下：“他是我们的患者，可更是我们的战友、我们的兄弟啊！”老人的眼圈都红了，所有的人都为之动容。

有时，学生们在工作中出了差错，他并不马上指出错在哪里、为什么会错、怎样去解决，而是用“读书”的方法对学生们进行“惩罚”。他要求学生在学习中认识自己的错误，吸取教训，改进方法，弥补不足。出了什么问题，就自己去找这方面的书和资料来看，从书中找原因、找方法、找答案，然后在科室学术研讨会上做读书报告，一人犯错误，大家受教育。

黎介寿对弟子们的专业学习抓得极严。会做、会说、会写，他用这六个字来要求他的学生。

会做，就是手术要做得漂亮；会说，就是能在讲坛上阐述自己的看法；会写，就是能发表论文撰写专著。学生李幼生说：老师“训人”实在太狠了，有时简直一点面子都不给。他训人的途径有二，一是考，二是查。

考，就是当众提问。在手术台上，在病房里，他随时都会对你发问，而且有时还“诈问”。比如某个问题的答案是甲不是乙，你开始答甲，明明对了，若神情紧张，心里也无把握，这绝逃不过他的眼睛，他会盯着你追问：到底是甲还是乙？你心中一慌，可能就又答乙了，当众出丑了。他紧跟着就会板着脸说：为什么不多读点书？要是人命关天的紧要关头，能犹犹豫豫吗？

再就是查，他每次查看病历和化验结果时，你站在旁边看得心里直发毛，多半会有毛病被挑出来。查病人，如果发烧的没有看咽部，没有进行肺部听诊没有查血象；如果有内科情况没有及时请人会诊；如果大便次数多的没及时做直肠指诊或者便秘几天没有采取通便措施，所有外科医生容易疏忽的事都会被他很容易地查出来。一旦查出来就训你，训的话还很难听：如果让你也憋上几天大便，你会怎么样？挨训

的时候心里真不舒服。但我听他说过：你心里难过，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上世纪80年代，护士彭南海因写字认真、工整，经常帮助黎介寿抄写书稿。由于刚参加临床工作时间不长，对一些专科用语不了解，一次，她把文章中的“胃大部切除”，抄成了“胃大部分切除”。

黎介寿看到文章后，并未生气，而是耐心向她讲解胃肠手术的方法，甚至护理上的注意要点都一一叙述。就这样，彭南海对早期肠外瘘治疗中的“吸、堵、补”护理技术有了充分了解，渐渐对普通外科的前沿理论知识有了感性认识，对从事这样的职业也越来越有信心，在护理专业中也渐渐找到了方向。

普通外科每年接收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危重症、疑难病患者，肠瘘病人又脏又臭，特别是小肠移植病人病情复杂，给护理工作带来极大挑战。20多年来，彭南海共带领过5位护士长，负责了所有小肠移植手术的特别护理，建立了小肠移植围手术期护理规范，多次在全国护理大会上交流发言，

发表了数十篇相关护理论文，参与并获得了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黎介寿良好的职业修养，像润物无声的春雨，深深影响着周围的医务人员。

科里一位年轻医生，在一次主刀直肠癌切除手术时，只用了不到两个小时，就把病人的坏死直肠摘除。这名医生有点兴奋，“啪”地把从病人身上切下的一段肠子扔进手术盘。这时，他忽然发现站在一旁的黎介寿眼神凝重，表情不悦。

手术后，黎介寿对这名医生说：“病人身上的坏死组织也是病人身体的一部分，不能轻视和亵渎，这也是对病人的尊重。”

黎介寿为人和蔼亲切，但在工作中却是眼里进不得沙子的人。科里不少医生护士敬慕他，与其说把他当作主任、院士，不如说更愿把他当作严父。他在生活中关心部属，但出了差错，他会毫不客气地批评，并责令责任人罚做“读书报告”，这种形式起到了很好的教育引导作用。长期以来，大家对他的批评已经无法割舍。

护士长叶向红说，她已经把他当作自己的父亲一样敬重了。一段时间，她没有受到黎介寿的批评，感觉很不习惯。一次查完房后，她说：“黎院长，您好久没有批评我了，是不是不喜欢我了？”直问得黎介寿笑起来：“小叶，这段时间你们这里管理很规范，批评就算了。但是，你如果敢懈怠，我就不客气了。”一席话逗得大家捧腹大笑。

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普通外科还没有一个本科生，到 1982 年才有军医学院的本科生，1985 年才有了研究生。黎介寿提出“就地取材，因人施教”的想法，在南京总医院开了几届短训班，从最基本的理论开始，结合实践培养队伍。当时的短训班旁边有一座小桥，被外界戏称之为“桥北大学”。这所“大学”虽然设施简陋、条件艰苦，但从这里走出了很多一流人才。

4. 好德行比学问更重要

黎介寿致力于传承从医理念，倾心培育德“医”双馨的有用之才。

曾有年轻学子向黎介寿讨教什么是真正的医德。

黎介寿回答：“医德应该由病人来评判，作为医生是不能给自己的医德打分的，从这种意义上讲，医德修行没有句号。”

一天，一名术后患者一口浓痰堵住喉咙，主治医生第一时间没有赶到处置，导致患者出现险情，黎介寿得知后，对这位主治医生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没有想到这位医生还感到挺委屈：“我不过是迟到了两分钟嘛。”

黎介寿是个温和的人，但这次他火了：“两分钟还了得？”随后，他把普通外科研究所的医护人员集中到会议室。黎介寿手掐秒表，神情庄重地说：“现在开始憋气试验！”

不到两分钟，一个个都憋得脸红脖子粗……黎介寿说话了：“一个健康人憋两分钟都受不了，何况是病人呢？你们想过病人的痛苦吗？两分钟，对病人来说太重要了，搞不好是要出人命的。”主治医生当场作了检讨。

有一次，病房里收治了一个新病人。晚上，看到这个病人病情比较稳定，年轻的经治医生就跑去看电影。黎介寿查房发现后，立即派人把他找回来，严厉地批评了他。这件事

对这位经治医生触动很大，从那以后，他就整天扎在病房，潜心钻研临床医学，终于成为普通外科研究所的学科带头人，全军普通外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这位经治医生，就是大家今天熟悉的著名普通外科专家李宁。

黎介寿始终不忘引导学生，把工作放在第一位，生活放在第二位。

他经常给学生们上思想政治教育课，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教导学生：“一个人心中想着祖国的医学事业，就能百折不挠，任何艰难险阻也挡不住攀登的脚步；如果心中想着个人名利，就会左顾右盼患得患失，最终是不会有有什么大出息的。”在他的引导和人格精神的感召下，学生们自觉克服“自我设计”、“自我奋斗”等追逐功利思想，把爱国奉献作为自己的人生坐标，在祖国医学事业的拼搏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曾经有一位“得意门生”，黎介寿在他身上倾注了大量心血，不仅亲自指导他写论文、搞科研，还排除万难，专门送他到国外留学。希望他能学成回国，为祖国的肾脏病事业作贡献，为患者造福。一次，当谈及在国外学习有何收获时，

这位学生说：“跟着世界一流的导师，当然有收获了。原来跟着你，只知道要‘享受工作’，来到这里后，才感觉到外面的世界真精彩，不光要‘享受工作’，更重要的是还要懂得‘享受生活’。”

素来治学严谨、工作至上的黎介寿一听就火了：“在中国，还有无数的患者，渴求着我们用学到的技术，为他们解除病痛。只有我们都‘享受工作’了，他们才能‘享受生活’，如果我们总是在‘享受生活’，等待他们的，可能就是再也不能‘享受生活’了！在我们研究所，‘享受工作’永远是第一位的。”

导师的话深深触动了学生的心。这以后，学生们无论在哪里工作，都把“享受工作”当作“第一要务”，勤奋工作，孜孜不息，如今他们都成了普通外科界的知名专家。

第十一章 笑对选择

一生奔着光明走

——对话黎介寿之一

雄鹰选择了蓝天，所以越飞越高；河流选择了大海，所以奔腾不息。人生如果选择了崇高，该是什么样的非凡境界？

对话黎介寿院士，聆听他近乎传奇的“人生选择”，走进他惊涛骇浪的内心世界，触摸到的，是一个人民医学家与时代一起跳动的脉搏，是一优秀名共产党员朴实而高尚的灵魂……

在走与留的十字路口，黎介寿的选择是：留下来，服务新中国。

问：1949年，是个特殊的年份，国家面临选择，人民面临选择。您选择留下来，有过犹豫吗？

答：没有犹豫。当时国民政府中央医院的很多医生都和我一样，没有被反动派的威逼利诱吓倒、迷惑，坚定地选择

留下来，服务新中国。当年那种对冲破黎明前黑暗的期盼，那种迎接新中国的激动心情，现在的人可能很难体会的到。

问：能说说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吗？

答：（陷入回忆）这么跟你说吧，当时就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变了，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笑容。我们每天就听着城外的炮声，觉得一天天近了，心里头像烧着了一样。

问：在南京解放的前一天晚上，听说您和弟弟喝了顿酒，平时喜欢喝酒吗？

答：从来不喝。但是那天晚上，1949年4月22日晚上，就是想喝酒。黎明就要来了，心里面高兴啊。另外，我们也是在为自己留下来的选择干杯。我们兄弟俩喝得很痛快，喝完连酒瓶都砸了（爽朗地笑了）！

问：留下来是自己的判断还是受周围人的影响？

答：跟谁走不跟谁走，不是下赌注、随大流。我从旧社会走来，对反动派的统治深恶痛绝，早已失去了信心。日本人轰炸长沙时，我夹杂在逃难的人群中。飞机在上面丢炸弹，血淋淋的断腿就从我头顶上飞过去。而国民政府的软弱，让人十分寒心。

问：您对那个时代，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

答：那可真是民不聊生！就拿我和弟弟来说，上学时连讲义都买不起，只能从别人那里借来，用毛边纸一页页誊抄。日寇入侵江西，学校几经迁徙，为了生活，我们不得不利用星期天摆地摊。即便是民众如此穷困潦倒，当局还要求刚毕业的医学生必须西装革履，保持“体面”。没办法，我们兄弟俩只有去卖血。这样的政府是毫无希望的。

问：怎么看当年的选择？

答：当时毕业实习的 28 个同学中，有人去了台湾，也有人转道去了美国、新加坡。他们中有的比我富有，但学术上多数没有什么成就；也有的在外国发展，但那也是在替外国人打工。我感到自己当初的选择是对的！

从选择入党到成为党的一分子，黎介寿的誓言是：永远对得起自己的信仰，一辈子忠诚自己的诺言。

问：您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最早从什么时候开始？

答：最早是在医学院上学时，有一回听在上海工作的亲戚说想去延安，那是我第一次对延安产生印象。后来，学校

里有同学去了延安，他们说那里有个进步的、民主的、有活力的政党。

问：但那时的认识并不是很清晰。

答：的确。在国民政府的学校里学习，一般学生根本接触不到那些“赤色理论”，只是在参加“反饥饿、反内战”游行时，听说领头的都是进步学生。那时对共产党的认识就觉得这个党敢给穷苦老百姓说话，心里面很向往。

问：您对党何时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

答：还是来自于耳濡目染。我亲眼目睹了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的严明纪律，解放时进城就睡在大马路上，不挠民。我也到过朝鲜战场，很多伤员伤没好就嚷着回前线。共产党的队伍深深吸引了我。

问：为了入党，您先后写下 27 份入党申请书，由于特殊年代的原因都没得到批准，想过放弃吗？

答：说老实话，还真没有想过放弃。那时候我就只有一个想法，感到自己之所以没能入党，还是因为没有改造好，离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标准还有差距。就这么简单，从不抱怨。

问：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您受了一些委屈，为何始终不改初衷？

答：我始终坚信，那些打击和迫害我的人，决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

问：历经 30 年，当您终于站在党旗下宣誓时，怎么想？

答：当然是激动，很激动，这辈子我站过很多次领奖台，也有很多次高兴的时候，但从来没有像入党那次那样，当我一字一句随着领誓人念完入党誓词时，我突然就觉得有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我暗暗告诫自己，这辈子一定要对得起自己的信仰，对得起这面鲜红的旗帜。

问：入党，就意味着要用一生的时间，去兑现对党的承诺。

答：入党不是一阵子，而是一辈子。我从不认为，自己加入了党的组织，从此就一直先进了。相反，我把入党看作是争取先进的开始。作为一名党员，要有“怕落后”的意识，才能永葆先进。

问：有人说您是一个信念老人，您怎么看待信念？

答：信念是事业的生命，是一个人的灵魂。坚守自己党的信念，是一个党员的政治品质。

在个人前途和国家命运之间，黎介寿的体会是：只有把自己的奋斗目标融入国家蓝图，才能成就美好的人生。

问：在做小肠移植前，您已经在肠道疾病研究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为什么还要搞小肠移植？

答：在器官移植中，数小肠移植难度最大。当时，外国人先干成了，我就想，外国人能干成的我们也一定能干成。当时，也有人提醒我，都过了花甲之年，搞好了，当然锦上添花，但搞砸，就可能身败名裂。我觉得，一个人心中装着祖国的事业，任何艰难困苦业压不垮他。就这样开始做下来了，七八年时间，就做这件事。

问：很敬佩您老的精神，怎么能坚持得下来？

答：科学研究不是今天做茶壶，明天做茶杯，认准了就要坚定地做下去。

问：您成功了，实现了自己的目标，这是不是意味着个人设计和自我奋斗很重要？

答：我赞成必要的个人设计，但一定要融入国家前途和命运，一定要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去奋斗，如果心里只有自己的利益，那就会患得患失，最终也成不了大器。

问：您想干成的事都干成了，是因为智商高吗？

答：（摇摇头）绝对不是！我只能说我不笨，但并不是聪明。我经常说自己是“笨鸟先飞”，别人可能一次做成，我不行，我得慢慢来，我不放弃。

问：这是一个老话题了。有不少国外著名医院和医学机构开出优厚的待遇，想邀请您到国外工作。

答：医学没有国界，但医学家是有国籍的。我对那些外国朋友说，我是中国人，在中国我有干不完的事业。

问：您一直鼓励学生出国学习进修，不担心他们不回来？

答：出国不仅能学到国外先进的技术，还是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我们现在有些年轻人，一说到国外，就如何如何地好，总觉得外国的月亮就是比中国的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我去过很多西方国家，以前是羡慕，后来是比较，现

在觉得还是我们的好。我就让学生们出去看，亲眼看了就明白了。他们都回来了。

问：1948年6月，您就跨进了南京总医院的大门，一直在这所医院里学习、工作和生活，您怎样看待南京总医院？

答：我对南京总医院怀有深厚的感情。可以说，没有南京总医院就没有我的一切。个人的本事再大，离开组织给的平台也难有作为。我要感谢历届医院党委、领导的知遇之恩、关爱之情，继续为医院建设作出贡献。

在病人需要与专业发展面前，黎介寿的追求是：始终把病人的需要放在第一位，以解除患者的病痛牵引学科发展。

问：您是什么时候与肠子较上劲的？

答：很偶然。1968年夏天，医院来了个肠痿病人。我先管了3个月，领导见我管得好，就把他交给我了。我也没有什么经验，边干边学，摸着石头过河，这样就管了他4年。他治好了，我也对肠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问：您一根肠子走到底，全凭兴趣吗？

答：兴趣是一个方面，病人的需要还是主要的。治好肠痿后，肠子营养问题解决不了，所以就搞营养支持，后来有些病人肠子切掉了，就搞短肠研究，短肠不行就搞肠移植。所以我总结了四句话：业之所需、兴之所近、时之所至、力之所能。

问：普通外科是大专业，那里有很多东西可以做，为什么您专注于肠子？

答：病人的需要就是我专业发展的方向。2000年初，肝移植做得很多，当时有好多人劝我做，好像做了肝移植，就能代表一个医院外科的水平。我坚持不做。因为我感到，这个已经有很多人做了，不需要再多我一个，而肠疾病领域还有很多难题没有解决，我要在我的有生之年，争取多为患者解除一些病痛。

问：看了普通外科研究所这么多研究成果，觉得你们真了不起。这里面学科发展的动因是什么？

答：医学学科发展的动因，首先源于人类对生命的关爱。医生离不开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科学精神针对的是病情，

而人文精神针对的是感情。可以说，医学是“人”学，是“仁”学，是“善”学。

问：在一次国际学术交流会议上，世界著名外科专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德瑞克曾经虔诚地对你说，您是“世界上研究肠子时间最长的人”。

答：做得时间长，不代表做得就好。同行夸赞我，我更不能歇脚，我还需要努力，争取干出点名堂来。

在对待事业和名利上，黎介寿的看法是：一味地追名逐利往往一无所获，而追求事业常常得到名利。

问：黎老，看到您今年初拿到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特别为您感到高兴。在获奖名单上，我们看到您和博士、硕士还有护士排在一起。

答：这个奖不仅仅属于名单上的 15 个人，它属于我们这个团队，凝聚了普外研究所几代人的心血。我从不认为，我一个人能把所有的事情干完，浑身是铁，也打不了几颗钉啊。

问：您对名利看得很淡。学生们发表了 2000 多篇论文，课题是您定的，思路是您出的，论文是您亲手修改的，但您坚持不署名。

答：我一直提倡好的学风和作风。比如在论文署名这个问题上，我就要求谁执笔的论文，谁主研的科研课题，谁的署名就排在前面。给学生们改论文，我只是尽到了一个导师应尽的职责。

问：名利对一个人不重要吗？

答：也不能这么说。你干出了成绩，得到了组织的认可，给予你一定的荣誉，会激励你更加努力地工作，去争取更大的事业和成就。对于我来说，看到学生们在成长，看到事业后继有人，就像自己的科学生命在延续。这是我最感欣慰的事。

问：怎么摆正事业和名利的关系？

答：要摆正这两者的关系，关键看哪个打头，到底是冲着什么去的。如果一味地追名逐利，那往往一无所获；而如果追求事业，却常常得到名利。我始终认为，历史是不会埋

没一个人的。只要埋头做事，干出了成绩，党和人民自然会给您荣誉。

问：医院领导说，您给南京总医院培养了一笔“无形资产”，那就是您的团队。很多学生都感激地称您为“金子般的铺路石”。

答：人才是最大的资本。其实，培养学生，也是事业的需要。外科医生的工作是团队工作，应该团结，相互尊重，相互支持。器官移植是现代技术复杂、要求高的手术，是一个系统工程，更是显示着团队的重要，决不是手术者一人之功。众人划桨开大船。我们研究所的所训只有简单的四个字“团结、敬业”，唯有发挥大家的智慧、力量，我们的事业才能越做越好。

面对守业与创业，黎介寿的忠告是：要用创新的眼光去探求未知的东西，千万不要停下来。

问：采访中，不少学生都说您接受新鲜事物比年轻人还快，是普外科最能学习、最会学习的人。

答：（微笑）还是他们年轻人学得快学得好。

问：您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

答：不断学习，不断创新，这是治疗病人的需要，也是我做科研工作的需要。我需要不断接受新的东西，我也非常愿意学习新的东西，这样能使我的治疗研究不断进步。比如科研或者看病中遇到一些疑难问题，解决不了的，我就上网去查。我现在讲课用的幻灯片、课件，都是我自己做，人家做的很难与我讲课的内容相一致。这么多年来，我的感觉是，书越读越想读，临床课题越做越多。

问：十多年前，您成功当选院士，在一般人看来，守住老本就足够了。但您和您的团队不断得到新的发展，还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答：我常跟学生说，是按部就班、四平八稳地“守业”，还是选择敢于争先、永不满足地“创业”，决定了一个人能走多远，也决定了一个学科未来建设与发展的走向。世界医学发展一日千里，不创业、不创新，就会落伍，就只有死路一条。比如，肠粘膜干细胞移植，对我们来说还只能算是开了个头，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所以说，创新永无止境，医学永无止境。

问：可创新、创业谈何容易？听说您搞小肠移植仅仅动物试验就做了5年。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您？

答：医学是个很严谨的科学，也是一门寂寞的学问，举步维艰，一定要有坐冷板凳精神。所以，我经常说，想要成功，就必须专注。一个专注的人，往往能够把自己的时间、精力和智慧，凝聚到所要干的事情上来，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这是一种精神、一种境界。特别是在面临诱惑、遇到挫折时，专注的人往往能够不为所动、勇往直前。

问：您老已经近九十岁高龄了，应该是颐养天年的时候了，可您每周还要做两到三台手术，为什么还坚持在临床、教学、科研一线？

答：做了一辈子外科医生，对临床、对病人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在他们中间，我能找到科研的方向，发现病人的需要。如果有一天真的不能站在手术台边上了，反而会不适应。只要身体条件还允许，我会一直做下去。

问：去年拿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这对于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答：这是一个新的起点。医学世界奥妙无穷，难以穷尽。就拿我研究的小肠移植来说，也仅仅是解决了一部分问题，移植成功后，国外可以生存的时间目前还比我们久。所以，我们的研究还要不断地进行下去，还要朝顶峰爬。

问：您最感到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答：现在有两件事能让我特别高兴：一是治愈了病人，看着病人走出我们的医院；二是别人没有做过的课题，我们研究做成功了。

问：走过了大半辈子的从医之路，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您对他们有什么忠告？

答：我最怕的，就是年轻人走老路，人家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所以我对我的学生讲，决不要把自己的眼睛蒙上了，要用创新的眼光去探求未知的东西，千万不要停下来。

问：黎老，人生很多时候都在选择，现在回过头来想想，为什么您每次选择都是对的？

答：我相信真理，追求光明。奔着光明走，向着真理走，永远不会错！

2. 信念点亮人生

——对话黎介寿之二

从医 60 多年，黎介寿攀上了世界医学高峰。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60 多年来，他走过了怎样与众不同的人生历程？他走过的路又给人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

约访黎介寿院士，走近他近乎传奇的人生历程，走进他心有灵犀的内心深处，触摸他与时代一起跳动的脉搏。

“人的一生中会面临许多选择，但紧要处就是关键的两三步。选择跟共产党走，选择参军入伍，是我一生最重要最正确的选择！”

问：为什么黎氏三兄弟中学毕业时都选择学医的道路？

答：像大多数那个年代中国普通家庭一样，我们一家人过着贫穷的生活。我的父亲患有心脏病，他希望我的大哥黎鳌能学医济民。子奉父命，大哥学医。1937 年，父亲病逝，全家生活如雪上加霜。1943 年，大哥黎鳌毕业后到江西国立医学院任教，我才结束了颠沛流离的中学生活。当时，只有医学院和师范院校学费和吃住免费，也因为到江西可以得

到大哥的接济，我放弃了学工的梦想，来到江西读医学院。可以说，我学医并非完全心甘情愿，有点无奈。但实习期间，看到疾病给老百姓带来的痛苦，我产生了很大的同情心。这也是我后来能够安下心来当医生的主要动因。

问：南京解放前夕，中央医院有一批医生跟随国民党政府去了台湾，你选择留下来，有怎样的考虑？

答：毕业后，我和弟弟同时到南京中央医院当实习医生。1949年春，医院根据上司的命令，陆续安排医生跟随国民党官员撤到广东韶关，后来又从那里去了台湾。那时，我们对国民党腐败无能深恶痛绝，对民不聊生的社会状况心痛不已。我们的少年时代受尽了磨难，读大学时也是异常艰苦，我们兄弟俩甚至缺少最基本的纸笔和课本。那天晚上，南京城外炮声隆隆。我和哥哥颇有点血气方刚的味道，扎扎实实地喝了顿酒，喝完酒连酒瓶都砸了。我们兄弟俩相约，留下来跟共产党走。

解放前，南京夫子庙是娼妓云集的地方，那地方正派人都不敢去，病人到医院看病都要先检查有没有淋病。解放后不到一年，这个丑恶现象就完全消失了。解放军接管中央医

院后，我报名参了军。人的一生中会面临许多选择，但紧要处就是关键的两三步。选择跟共产党走，选择参军入伍，是我一生最重要最正确的选择！

问：这个经历、这个选择对你一生有什么样的影响或启示？

答：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经历过备受外国列强凌辱、民不聊生的旧中国，再看看我们强大的新中国，起码有三点启示：一是必须爱国，有国家，才有国人；二是你怎样爱国？要尽自己努力，为国家做一点事情；三是在个人的生活要求上不要高标准，而在自己的事业上要不断有新的进步。现在，我鼓励我的学生出国去深造。出国前，我会跟他们说，要把出国作为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时机，出去看一看，现在中国发展了、日渐强大了，人家对我们的态度和以前不一样了；同时，也要看看外国人对咱们中国人是不是真正平等了。如果还没有真正平等，也不要怨天尤人，我们回国后更应该多做工作、多出成绩，使我们的国家更加强大。

“人生自古多磨难，但磨难也往往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作为一名医生，面对病人渴望的目光，个人的荣辱又算得了什么。”

问：在那段是非颠倒的日子里，您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和迫害。面对人生磨难，您当时是怎么想的？

答：那时，我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受到冲击，后来又下放到农村改造。那段时间，身心备受煎熬，但我没消沉下去，而是尽己所能为当地农民治病。我常常起早贪黑扛着锄头上山挖草药，回来洗净晒干，磨成粉，制成丸，无偿提供给病人。当时，我都做好了在农村一辈子当“赤脚医生”的打算。直到今天，还有些学生问我，为什么能够在那么困难的环境里挺过来，我告诉他们，当时我的想法很简单，我热爱我的祖国和人民，相信我们的党。人生自古多磨难，但磨难也往往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作为一名医生，面对病人渴望的目光，个人的荣辱又算得了什么。

问：您饱受磨难时，拒绝了低迷和消极，选择了坚强面对。当时怎么想？

答：我们身边也有一些人，面对磨难看不到前途，而是怨天尤人，采取了消极颓废的态度，最终一事无成。的确，面对磨难，对人是一种考验；面对磨难是什么态度，也是一种选择。我出生在外强欺凌、多灾多难的旧中国，看着解放后祖国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我始终相信我们的党。因此，我不能忘记神圣的使命，不能忘记医生治病救人的天职。事实证明，积极地学习和工作，也许是承受磨难、开辟未来的最佳良药。正因为那个特殊时期，我忍辱负重，不忘学习、争取工作，才为后来的厚积薄发、开辟医学新天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个人心中想着祖国的事业，任何艰难困苦也压不垮他。如果心中只想着个人名利，就会患得患失，最终也难有什么出息。”

问：改革开放后，祖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我们发现，您是年过半百开始肠疾病治疗研究的，为什么当时有这么大的魄力？

答：俗话说，“人过四十不学艺”。但我觉得，如果能为祖国医学事业趟开一条路，就是吃再大的苦受再多的累都值

得。的确，如果那时就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恐怕就不会有今天外科研究的这些成绩。

问：1996年您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时，有人曾惊讶地说，别的院士都是大医院、大科研单位产生的，而你却是从一个普通医院出来的；别的院士都是搞了一辈子老本行，而你却是半路出家搞肠功能治疗研究的。您自己怎么看这个现象？

答：不管你在科研单位也好，在普通医院也好，能研究、能创新、能治病就是硬道理。要想取得成果，你就必须创新。不少同行说我在肠疾病治疗领域开创了七个第一，我的体会就是，病人的需要就是我敢于创新的原动力，有时哪怕冒点险也值得。

“能当上院士，我是生逢其时。没有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我很难有今天的成就。所以，生逢盛世，当不虚此生。”

问：快90岁了，应是颐养天年的时候。您还坚持在临床、教学、科研一线，都有怎样的考虑？

答：我常说，能当上院士，不是说我们的水平有多高，贡献有多大，过去许多水平、贡献在我们之上的前辈，都没

当上院士。能当上院士，我们兄弟三人是生逢其时。没有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很难有今天的成就。所以，生逢盛世，当不虚此生。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生命的最大意义又是什么？我觉得，作为一名医生，把自己的生命融入工作，融入奉献，融入为患者服务之中，这样的人生才是最有意义的。

问：这是一个老话题了，有不少国外著名医院和医学研究机构诚挚邀请您到国外工作，并提供优厚的待遇，你都拒绝了。为什么？

答：对于人才来说，凤凰要把高枝占；对于用人单位来说，栽下梧桐引凤凰。在医疗市场日益国际化的今天，国际间人才流动是正常的。现在，我与一批国际医学权威保持着良好的协作关系，也有不少研究机构聘请我和我的学生到国外做研究工作，但我们不去。我认定一个理，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科学家是有国籍的，我是中国人，在祖国有我干不完的事业。过去，都是发展中国家人才向发达国家流动，中国也不例外。随着国家发展强大，国外的人才也会向中国流

动。最近，国外有些名校陆续要求派人到我们研究所进修深造，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记者：采访中，不少学生都说您接受新鲜事物比年轻人还快，为什么能做到这样？

答：我十分欣赏这句话，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岁月不饶人，我是快 90 岁的人了。人老经验丰富，但也容易固步自封。我常对我的学生说，夕阳无限，我还要发光发热，多做工作，拓展事业；功成名就，一个人脑子里就或多或少存在着老经验、老习惯、老办法，常常“顽固”地表现出来，我也需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吐故纳新”。其实，既夕阳无限，也生命有限。在有限的生命中，我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培养新人上，新人辈出是夕阳无限的最好注释。

第十二章 大家眼里的“大家”

黎介寿是一个医学科学界的传奇,为什么他能够登顶医学巅峰?他有着怎样的精神境界?他的成功,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启示?

带着这些疑问,笔者深入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机关、科室和病房,与医院领导、机关和医务人员面对面,座谈解析学习“院士精神”的体会和感悟。

从医60多以来,黎介寿院士凭着对党和祖国的赤胆忠诚,对军队医学事业的执着追求,以毕生的心血、精力和智慧,诠释着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以创新的勇气、思路和作为,矢志攀登世界医学高峰;以诲人不倦的“人梯”精神,倾心培育出一大批顶尖人才;以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品格和仁爱之心,惠及万千患者。

座谈中,大家纷纷感到,黎介寿院士是我党我军培养起来的优秀党员干部,是国防建设事业的忠诚战士,是医疗科技战线的杰出代表。在他身上表现出的“特别讲政治、特别敢创新、特别能奉献、特别守医德”的精神,充分展现了一

个共产党员践行先进性要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风貌,集中体现了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优秀知识分子的崇高境界。

1. 风雨无阻,信念如磐

理想信念是一个人的精神支柱,是永葆共产党人先进性的前提和基础。黎介寿院士特别讲政治,始终保持坚贞不渝的理想信念。向黎介寿院士学习,就是要学习他面对艰难困苦、百折不回的理想信念,学习他面临各种考验、始终坚持首位的政治本色,在实际工作中讲政治、讲大局、讲服从。

陈忠良(政委):黎介寿院士自觉坚定理想信念,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他对党无比信赖。“文革”期间,尽管他饱受磨难,却从没有忘记医生的天职,一次次地不顾个人安危为老百姓看病,对医疗技术的钻研也始终没有停止过。他对祖国无比忠诚。青少年时代,为了求学,他饱经战乱,辗转四方,生活颠沛流离。国民党逃离大陆时,他毫不犹豫地留下来为新中国服务。抗美援朝时期,他义无反顾地

参加了前线医疗队，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改革开放后，他的知名度与日俱增，面对国外的高薪聘请、优厚的生活条件，他不为所动，一如既往地扎根在祖国这片沃土上，创造了骄人的业绩，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他对军队无比热爱。长期以来，始终保持姓军为兵的本色，面向基层服务官兵，潜心致力于为官兵解除病痛，把全部的心思和精力用在保障打赢上。透视黎介寿院士成长成才的经历，坚定的理想信念是根、是魂。

史兆荣（院长）：医务人员要有正确的奉献观，一个医生，无论自己感到自己做出了多少贡献，最终都要用广大患者的评价——这个最科学、最公正、最无私的“天平”来称量，都要看是否抓住了学医为民、行医利民这一“总开关”；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黎介寿院士交出了满意答卷。从医 60 多年来，他在为患者服务的实践中时时体现以人为本，处处维护广大患者的根本利益，始终把患者的情绪作为第一信号，把患者的需要作为第一选择，恭敬地、全身心地奉献着。

叶向红（护士长）：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黎介寿受尽磨难却矢志不移。即使是在那种艰苦、复杂的环境下，他仍然做出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院士精神”让我们看到，磨难源于外界，坚韧则源于内心。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和拼搏向上的进取精神，是战胜挫折、摆脱困境、超越困境的灵丹妙药。人的能力有大小，天分有高低，生活的环境有优劣，但只要理想不灭，奋斗不止，拼搏不断，都会成就一番事业，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辉煌。正如一位成功者说：大多数失败者其实不是被打败，而是自己放弃了成功的希望和理想。能够感动别人、改变命运、获得成功的，永远是那些能够全力以赴与挫折抗争，一次次倒下又一次次奋力站起来的人。

吴善新（政治部主任）：快乐是什么？快乐从哪里来？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黎介寿院士说：“当一条生命从我手中获得重生，我最快乐。”从院士质朴的话语中，我找到了医生快乐的源泉。业绩能给人带来快乐。“把事业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唯有自主创新”，从医 60 多年来，黎介寿从未停止过创新的脚步。责任能给人带来快乐。人命关天，来自各个方面的重重压力，黎介寿院士体会着责任的

含义；无数次炼狱般的攻关，黎介寿院士从不忘自己的使命。奉献能给人带来快乐。黎介寿院士的一生充满选择，他选择了艰苦环境，选择了牺牲奉献。在选择中，他诠释着奉献，体验着崇高，收获着快乐。忠诚能给人带来快乐。黎介寿院士把个人的价值与苍生福祉紧紧想连，那是何等的荣幸；当祖国医学的地位经过自己的努力得到提升，那是何等的幸福。

彭南海（总护士长）：黎介寿院士一路走来，受组织培养之恩，受医院历届党委造就之恩。他笃行“受施慎勿忘”，积极奉献他人，回馈官兵和社会，他的爱心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军营的主旋律一起同频共振。回想我们身边的少数科技干部，有了成绩时说“感谢谁呀，应该的”；失败时抱怨“从来没有人真正帮助过我”；步入成功时则宣扬“路是自己走出来的”，黎介寿院士的“知恩图报”当让他们汗颜。“院士精神”告诉我们，任何人都不能脱离社会、组织和集体而单独存在，父母的养育之恩，老师的教育之恩，党和国家的培育之恩……人之一生，一路走来，有多少关爱

需要铭刻在心，有多少恩惠需要及时回馈？当以忠诚回报组织，以奉献回报人民。

任建安（主任医师）：自律是一种信仰。黎介寿院士的身份不可谓不尊，地位不可谓不高，但他始终牢记，自己的言行举止，必须对组织负责，对组织纪律必须怀有敬畏之心，决不能随心所欲，做游离于组织之外的人。自律是一种觉悟。自觉做有觉悟的“一把手”，自觉克己自律，不把“班长”变“家长”，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自律是一种素质。从黎介寿院士的自律中，可以看出一个医学大家、一个领导干部的素质及德性。“善禁者，先禁身而后人，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后身。”一个管不住自己性格和欲望的人，怎么可能领导好一个单位，怎么能带领一帮人谋发展？

李幼生（主任医师）：部队医院同时面对市场和战场，既要适应市场，又要服务战场。黎介寿院士认为，医院永远不是市场，不可能按照市场的运作规律驾驭医院。穿着军装，永远要为部队服务；不仅要服务，还要恭敬地服务、全身心地服务。他以实际行动引导大家，闯市场切勿迷失了方向，为兵服务永远是军队医院的根本。市场再大，永远也不能忘

记自己姓“军”名“兵”。即便是最基层的士兵，也应得到最优质的服务。

尹昌荣（副院长）：在黎介寿院士看来，当科学家和当官，这两个价值观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认同，一个人很难同时办好这两个角色。一些懂业务的去搞行政，他们一旦选择了这条路，就必须告别自己的学术生涯。黎介寿院士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自己的事业，因为他有一个好的科研平台，有一支好的科研队伍，这是个做学问的平台队伍，而不是做官的平台队伍。黎介寿院士走得执着，走得辉煌，走得没有遗憾。

范颂杰（医务部主任）：黎介寿院士喜欢一首歌，叫做《向天再借五百年》。他说，他并不是想再活五百年，只是想在有限的生命中，尽量多地为患者作贡献。按照自然规律，人总有一天要走向生命的终结。那么，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生命的最大意义又是什么？这是每个人尤其是每一名共产党员必须搞清楚的大问题。人生有限，事业无限。我们应该像黎介寿院士那样，把自己的生命融入工作，融入奉献，融入为患者服务的伟大实践，这样的人生才是最有意义的。

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壮丽的青春得以延续，宝贵的生命得到永生。

何进（政治部副主任）：从黎介寿院士为患者服务的言行，我们很容易感受到医者的核心价值准绳，那就是人品好、医德正、党性强。所谓人品好，就是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中讲的，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医德正，就是学医为民、行医利民，始终坚持“厚德、精业、创新、至善”；技术优，就是医术精湛，善治人所不能；党性强，就是看小自己、看大位子，看轻享受、看重职责，看开得失，看清奉献，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以党的立场为立场，以党的利益为利益。这个价值标准，是所有医务人员的“镜子”。

2. 生命不息，追求不止

执着追求、不懈攀登对于事业的成功与否至关重要。黎介寿院士特别敢创新，始终保持永攀高峰的执着追求。向黎介寿院士学习，就是要学习他争第一、创一流的工作标准，

学习他敢为人先、勇于探索的意志品质，在本职岗位上建功立业有所作为。

杨国斌（副院长）：黎介寿院士凭着对医学事业的挚爱，不断地向医学科学高峰攀登。他“一条肠子通到底”，终成医学泰斗。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什么是执着，什么是坚毅，什么是奋斗，什么是创业；从他身上，我们读懂了“目标有多高，行动有多远”。发展的机遇总是垂青那些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人们。向黎介寿院士学习，就是要学习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学习他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务实作风，以昂扬的精神状态促进本单位、本部门的建设发展。

李宁（普通外科主任）：黎介寿院士当了四年“猪爷爷”，终于取得了肠移植动物实验的成功。他成功的事实表明，贪图安逸、养尊处优创不了佳绩，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出不了实绩，弄虚作假、投机取巧成不了真绩。唯有求真务实、埋头苦干，才能创造出实实在在的成绩。我们科技干部做科研、搞学问，必须脚踏实地，一切从实际出发，在科学把握自身条件、发展环境和制约因素的基础上，形成切实可行的发展思路，并以实干的行动来谋求目标的实现。

倪元红（护士长）：黎介寿院士用毕生的追求诠释了什么是“专注”。专注是一种精神、一种境界。“把每一件事情做到最好”，“一根肠子通到底”就是这种精神和境界的反映。一个专注的人，往往能够把自己的时间、精力和智慧凝聚到所要干的事情上，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特别是在遇到利诱、遭到挫折的时候，专注的人能够不为所动、勇往直前，直到最后成功。相反，如果心浮气躁、朝三暮四，就不可能集中自己的时间、精力和智慧，干什么事情都只能是虎头蛇尾、半途而废。

陈新建（政治协理员）：黎介寿院士在科研攻关上是模范，在协作攻关上也是典范。我们少数科技干部，对现代医学攻关的协作精神不够重视，对一些重大的科研协作课题，明知道靠一己之力难以完成，宁愿做不成，也不愿意主动与人合作，分享荣誉。这种思想和表现在过去被称作是“文人的劣根性”，“宁愿自己好不了，也不让别人好”，是极其有害的，归根到底影响了医教研工作的协调发展。

王与荣（副院长）：黎介寿院士年近九旬，仍坚持全日制工作，办公室的灯每天都要亮到很晚。敬业是他走向成功

的根本途径，也是永攀高峰的精神源泉。对他来说，工作和患者就是自己的生命。我们在工作中要大力提倡这种敬业精神。敬业是一种崇高的思想境界，认真负责、持之以恒、精益求精，这些都是应该大力提倡的敬业行为。一个人敬业，能使提高个体能力素质成为可能；一个单位的所有人员都敬业，造就一番大事业就指日可待了。

郑汉高（院务部部长）：过硬的能力素质要在创新发展中锤炼。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乃至一个人能力素质的扩展与升华，都是在创新中实现的。品味黎介寿院士的精彩人生，如果当年仅在外科学简单重复“炒炒冷饭”，他就不可能主动作为，成就一代医学大家。历史和时代的精英开拓创新的成功范例告诉我们，是选择按部就班、四平八稳地“守业”，还是选择敢于争先、勇超一流地“创业”，决定了我们医务人员人生价值的走向，决定了个人能力素质的走向，决定了我们南京总医院未来建设与发展的走向。

何进（政治部副主任）：有一位哲人曾经说过，“辛辛苦苦过舒服日子，舒舒服服过辛苦日子”。在成长进步上，我们往往只看到别人风光无限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别人为此付

出的艰辛劳动。有一种现象值得我们深思，凡是在工作中肯吃苦的、挑大梁的，能够耐得住学术寂寞的，成长进步相对就要快一些；凡是悠哉游哉过日子、熬年头、不思进取的，成长进步就相对要慢一些。为了成功，黎介寿院士的付出比常人要多得多。相反，我们有的年轻医务人员在做人治学上出现浮躁情绪，认为搞几篇论文、弄几个科研成果就“功德圆满”了，忽视了打基础、求长远的工作。这么做，只会是与机遇擦肩而过。

吴旭峰（副政委）：过去，当外科医生们一窝蜂热衷于心、肝等大器官移植的研究时，黎介寿院士却另辟蹊径，将研究方向转向了小肠移植这一世界难题。他成功了，这是敢为人先和创新发展的成功典范。科技进步来自源源不断的创新。一个单位，一个人才，如果创新的源头枯竭了，其科技进步就会停止。创新，关键是要有创造性的想法和构思，更重要的是要像兄弟院士一样，有勇于实践的行动。

江志伟（主任医师）：创新意味着冒险精神，冒险精神意味着有风险，有风险就意味着有失败，而且可能有很多失败，只有不怕失败才能成功。在创新的问题上，谁也不愿失

败，但谁也避不开失败。倘若急功近利，今天投入了，恨不得明天就成效显著、立竿见影，则往往事与愿违。倘若急于求成，看到失败就气急败坏，则必会令人心灰意冷。倘若心浮气躁，搞短平快，欲一鸣惊人，最终也只会适得其反。苛求成功，无异于给人戴上“紧箍咒”。黎介寿院士经常教导我们：“科学是讲求实际的，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需要付出艰巨的劳动和恒久的耐心”。

丁岚（护士长）：谦逊的黎介寿院士，经常说自己是一只“笨鸟”，要努力地“先飞”起来。从这里，我们感受到了大家风度。勇于承认自己笨，并不断以自己的努力去“先飞”，这是一种多么可贵的精神啊！事实上，世上决没有至善至美无瑕疵可言的人和事，重要的是，看你有没有敢于正视自我的决心和勇气，看你有没有“先飞”以至“高飞”的信心和能力。“院士精神”告诉我们，要实事求是地看待自己，在生活中不断解剖自己并虚心接受别人对自己的批评，脚踏实地做一个求真务实的人，这样才能“化蛹成蝶”、“展翅高飞”。

3. 醉心桃李，甘为人梯

只有矢志培育大批人才，才能让科学技术和科学精神传承不息。黎介寿院士特别能奉献，始终保持诲人不倦的大师风范。向黎介寿院士学习，就是要学习他诲人不倦、倾心培育的“人梯”精神，学习他严谨求实、精益求精的精品意识，努力造就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为国防建设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刘云（护理部主任）：黎介寿院士“扶植新秀，甘做人梯”的精神，不仅令人敬仰，也发人深思。这种精神源于对祖国医学的责任意识。他在科研之路上从没有懈怠也从不敢懈怠，但他深深知道，科学事业不是一两个人的事情，不能靠单枪匹马、单打独斗，必须发扬团队精神；科学事业是年轻人的事业，必须扶植一茬又一茬的新秀，形成后浪赶前浪之势。这种精神源于黎介寿院士的长远眼光和宽阔胸襟。无私让奉献更加高洁，当事业上成绩卓著，多种荣誉接踵而来的时候，院士振臂高呼，让年轻人挑大梁；当年轻人取得成绩和荣誉时，他把这些成绩和荣誉当作自己的成绩和荣誉，为之欢欣鼓舞。

任建安（主任医师）：选择做黎介寿院士的学生，是我们的幸运。导师在学术传授上非常严厉，但他的严厉包含着爱，没有爱的严厉往往是很危险的，从他的严厉上可以看出他对学生寄予的希望。导师始终给我们以信念，给我们做科学的信念、患者至上的信念。我现在也当老师，也带研究生，我也把这种信念灌输给我的学生。有了信念，导师还给了我们科学的方法，信念加方法，才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传承。

李宁（普通外科主任）：现在有些研究生只是想拿到一个文凭，作为一个老师来说这是最伤心的事，因为他不只是在教你一门手艺，他是在把你领入科学的殿堂，你必须走上正确的路，才能攀上科学的顶峰。黎介寿院士就是这样的导师，他不光教给我们迈入科学殿堂的知识，而且引领我们去探索未知领域，在探索未知的过程中教给你方法。

导师执着地钻研，从临床中敏锐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然后借助实验室去回答这些问题，得到的答案再回到临床。当这种科学的方法为我们所接受，再跟随这种导师，你就会无怨无悔地去做很多事情，因为你走上了一条正确的科学研究之路。

导师经常说，诺贝尔奖获得者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培养出来的，大科学家是大科学家培养出来的。他总是教育学生，不能仅仅把眼光放在国内领先上，而要锁定世界一流，赶超国际先进。他鼓励学生出国深造，但从不忘引导学生，出国不是赶时髦，也不是为了表明一个人的成功，出国的目的是了解学习医学发展的趋势，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国际化的眼光，之后才能明确目标，才能做大事。

易学明（医院原院长）：黎介寿院士倡导立足自我、自主培养适合学科发展的高层次人才。1982年前，南京总医院从医学院毕业的大学本科生少之有少。在黎介寿院士倡导下，医院办起了短学制培训，从最基本的理论开始，结合医疗实践培养人才队伍。那时候有个笑话，说我们医院有个“桥北大学”，因为院区有座小桥，短训班就在桥的北边。这所“大学”虽然设施简陋、条件艰苦，但现在医院很多挑大梁的人才，很多蜚声海内外的著名专家，都是从“桥北大学”走出来的。

江志伟（主任医师）：“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科学家是有国籍的。”黎介寿院士总是把热爱祖国看作是一个医学科

学家最大的医德。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教导学生：“一个人心中想着祖国的医学事业，就能百折不挠，任何艰难险阻也挡不住攀登的脚步；如果心中想着个人名利，就会左顾右盼患得患失，最终是不会有有什么大出息的。”我们现在有少数科技人员，在国内时千方百计想着出国，刚踏上国外的土地，就忙着申请绿卡，算计着找个挣钱的好工作，想方设法留在国外。我们要学习“院士精神”，自觉克服“自我设计”、“自我奋斗”等追逐功利的思想，把爱国奉献作为自己的人生坐标，在祖国医学事业的拼搏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沈慰峰（院务部政治协理员）：培育人才重在培育精神，在黎介寿院士看来，一个学生如果没有得到科学精神的真传，就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人才。现在，我们有的医务人员在自己的课题遇到技术困难时，不是想方设法去钻研攻关，而是找出很多客观原因为自己开脱，当以这种科学精神为鉴。

4. 德医双馨，是为大医

崇高的职业道德，是立身从业、做好本职工作的基本标准。黎介寿院士特别守医德，始终保持情系患者的高尚品格。向黎介寿院士学习，就是要学习他情系患者、一切为了病人的崇高品德，学习他坚持操守、严于律己的可贵精神，塑造人民军队的良好形象。

史兆荣（院长）：我们南京总医院把“厚德、精业、创新、至善”作为院训，这就决定了医务人员在人生标准上，只能把为伤病员服务作为立身做人、从医从政、党性修养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为伤病员服务，是我们的“道德经”。老一辈靠它创立南京总医院的“金字招牌”，新一代靠它传扬南京总医院的美名。黎介寿院士以实际行动念好了这个“道德经”，丰富了这个“道德经”，他的行动带动了一大批年轻医务人员立足本职默默奉献。我们许多老同志退休后，不接受地方的高薪聘请，主动回聘到我们医院医教研工作一线，也正是在这个“道德经”的影响下为医院建设发光发热，不遗余力。实践告诉我们，谁在这个“道德经”上想得深、解决得好，思想根子扎得牢，谁就能在得与失、荣与辱、牺牲与奉献的考验面前，永葆共产党员和白衣卫士的本色。而

谁在这个问题上疏于思考、解决不好，谁就会淡忘党员的标准，钻到自己的利益小圈圈里去。

吴善新（政治部主任）：“当医生就要爱病人”，这是黎介寿院士的行医格言。他把博大的医学人文精神，化作了病人无微不至的爱，陶冶了一代又一代南总人的心灵。医学究竟是什么？医学是爱的艺术。黎介寿院士用行动作出了解答：医学不是纯科学，而是人类情感的一种表达。科学家更多地诉诸理性，艺术家更多地诉诸情感，而医生则必须集冷静的理性和热烈的情感于一身。

徐建华（政治部协理员）：医者德为先，行医先做人。人民医生，就是要为老百姓办实事，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而要落实在行动上”，“医生的最高境界不是学术认可，也不是‘一把刀’，而是病人的认可”，黎介寿院士质朴的话语，是对“医生为了谁”这一问题的最好诠释。

朱维铭（主任医师）：谋发展需要市场，但医院永远不能成为市场。正是从这个认识出发，黎介寿院士在制定研究所的发展规划时，从没有一味地去追求经济指标，而是首先

明确一个根本理念——医院作为救死扶伤的机构，必须坚守道德标准；一味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对红十字的亵渎。

朱元馨（门诊部副主任）：道德是要用医德医风来体现的。黎介寿院士以规范医疗管理为龙头，教育引导医务人员用最基本的道理约束自己——钱一定要取之有“道”：必须坚持为患者合理看病、用药的做法；不论对内还是对外服务，必须视病情用药和检查，在确保治好病的前提下，从最低价的处方开起，用常规药治疗救人。医生就是医生，医生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人，看病也是做买卖。医生不能成为“医药代表”，不能和药商联手，吃回扣，捞好处。

陈声容（妇产科护士长、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在医院，黎介寿院士永远有一种“不踏实感”，他永远像等待发令枪响的运动员。无论白天黑夜，只要一声命令，立刻就得放下一切，奔向救死扶伤的工作岗位，去当一个永远处在备班状态下的“消防员”。老人经常在梦中惊醒，总感觉到有什么事情。于是，打电话问值班医生，知道病人都安然无恙，才能再次安睡。然而，恰恰是他的这种“不踏实感”，换来了病人的“踏实感”。

任建安（主任医师）：在众多闪亮的头衔中，黎介寿院士最看重“临床医学家”这个称谓。在他看来，医生就是医生，医生不是四处“走穴”的明星；医生的本职是治病救人，医生的岗位在门诊部、手术室；医生不是在电视里频频露面的新闻人物，医生不是飞来飞去作报告，动口不动手的“专家”。他对自己每周一次的院士门诊十分珍惜，十分尽职，始终牢记躬身践行医生的本份。

唐星明（秘书）：“院士精神”告诉我们，作为医生，要有为科学、为患者献身的精神。医生的冒险精神不仅来自于对真理的追求，也来自于对患者的感情。一个医生如果不愿意冒险，就只能成为修机器的匠人，而不能成为医学大师。人心都是肉长的，只要医生深怀仁爱之心，患者都是通情达理的。当然，患者理解医生也是有条件的。在临床中，尽管误诊是客观存在的，但医生不能以此为借口，无视生命的尊严，随意让患者付出无谓的牺牲，承受无谓的痛苦。患者可以宽容正常的失误，却无法宽容因敷衍塞责、草菅人命造成的失误。

陈忠良（政委）：“做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医生”、“做什么样的党员”，是我们医院科技干部忠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本职工作中体现先进性的最现实的切入点。医务人员要保持先进性，要学习“院士精神”，自觉从政治信仰、医德医风、党性修养等方面“三省吾身”，“以德润身”，使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的宗旨真正进入头脑，内化为自觉意识，成为最高行为准则。

大医精诚、大爱无垠。

学习“院士精神”，有一种情愫始终在我们心头激荡：“院士精神”如碑，当可广而告之，昭示天下；更当弥足珍贵、流芳百世。

感悟“院士精神”，有一种启迪将永留我们心间：当所有的喧嚣过后，尘埃落定，真正能够被历史铭记的，是那些利国家、兴事业、济苍生的人和事。只有时时刻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里，把事业的责任牢记心上，才能创造出真正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功绩，才能真正为人民所铭记、为历史所铭记。

第十三章 真情追忆

1. “兄弟院士”眼里的“院士兄弟”

哥哥眼里的弟弟——

黎磊石身上始终有一股子“气”：朝气、锐气、正气

弟弟黎磊石性格有棱有角，爱憎分明。他这一生，骂了不少人，得罪了不少人，但从来没有骂过、得罪过一位病人。

他身上有一股子年轻人特有的“气”：朝气、锐气、正气，这股“气”的支撑他在感恩中奋勇前行，在感恩中创新发展，在感恩中回报人民。

弟弟身上的“气”，激起他永远坚守对党和祖国的忠诚。

文革时期，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他被造反派关进“牛棚”，精神上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折磨。那时，很多知识分子由于承受不了非人打击，信仰的支柱彻底倒塌，选择了自杀。出来以后，我曾问他，你为什么不自杀？他说，我不自杀，因为我相信，那些打击迫害我的人，绝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在身心备受摧残的岁月里，他仍然坚持一边改造，一边

为人民服务。 与他有着相同的经历，我们兄弟俩在这一点上，心意是相通的。

行医 60 多年，永恒不变的信仰和追求，激励他永远坚守忠诚，坚决拒绝国外高薪厚遇引诱，在医疗一线躬身实践、孜孜以求，为祖国医学发展、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奋力开拓。

弟弟身上的“气”，促使他不为名利浮华所累，勇敢担当起军人的职责与使命，永葆创新发展的昂扬斗志。

过去，他曾经为自己的祖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却没有在世界的“发言权”，感到自责与羞愧。他努力了，凭着“两个半”医生，一万元启动经费，用 20 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肾脏病学 40 年发展之路。今天，他的研究所拥有了中西医结合治疗肾病“6 个国际首创”，众多临床研究成果，让洋人为之惊叹。近年来，研究所被冠以“世界肾活检之王”；多靶点治疗狼疮性肾炎的临床成果，轰动了国际医学界；“连续性血液净化”战创伤救治课题，被列入国家和军队“十一五”重点课题。

在培养学生上，弟弟曾经说过：“如果这辈子培养不出超过我的人，我死不瞑目！”2004年，他的学生刘志红，光荣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后来，他们俩又一起受聘于美国布朗大学，这是这所国际著名的大学成立以来，第一次聘请中国人担任客座教授。

弟弟身上的“气”，激励他永怀对病人的深沉大爱，永修崇高医德，永葆革命军人和白衣战士的精神风骨。他当兵60多年，在各个岗位上调动几十次，经历调职晋衔、立功授奖几十次，从没有违反纪律向组织伸过手，要过实惠。他年年出国，但从不受国外灯红酒绿、糜烂生活的蛊惑。

他常跟学生们讲，没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就很难真正成就事业。前些年，弟弟罹患癌症。临手术了，我去看他，问他还有什么要求。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说：“我不怕死，作为一名医生，深知生老病死是科学的必然。但说实话，我害怕离开我的病人，害怕离开我的讲台。手术失败了，死在台上也无所谓，但如果还活着，就一定要保证我的脖子还能动，好让我还能为学生讲讲课。”

这些年，研究所一直实行每周 6 天工作制，不断缩短住院周期，通过设立方便门诊、建立预约制度，把方便让给病人。今年以来，在不降低住院医疗质量的前提下，进一步优化流程、提高效率，将病人平均住院日由 14.5 天缩短到 6 天，使平均住院日与国际看齐，解决“看病难、看病贵”这一全国性的难题。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党的先进性，证明人民军队的先进性！

弟弟眼里的哥哥——

求真、求新、求实，是黎介寿不变的追求

哥哥黎介寿为人随和，但骨子里透着坚韧。求真、求实、求新，是他坚守的人生信条。

60 多年来，他始终把对党的真信、真爱和追随，作为奋勇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

他常说，身处好环境，更要干出好事业。作为一名老兵，他经常思考自己的使命是什么，要担起什么样的责任？在不断思考和实践中，带领自己的学科，争创军中一流，冲出国门，走向世界。

过去，他在肠外瘘治疗、临床营养支持、重症急性胰腺炎的救治、肠移植、损伤控制性外科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硕果累累，为中国胃肠外科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成为全世界研究肠疾病时间最长的人。

全小肠移植手术，作为肠衰竭患者最理想的治疗方式，是世界上公认的器官移植领域最大难点，是一个国家器官移植乃至整体医学水平的标志，也是我国进入临床常规应用的最后一个大器官移植项目。目前，国内只有南京总医院仍在从事这一移植技术的研究

在哥哥牵头组织下，他的研究所成功完成了亚洲首例全小肠移植，之后又广泛吸纳国际上的先进经验，成功完成了14例同类手术。

近年来，经他组织手术的4位“换肠人”，均达到或优于国际上此类手术病人的恢复标准，从而使这一技术由临床研究发展为临床常规手术；使我国小肠移植术达到亚洲领先水平，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哥哥深知祖国医学事业的振兴，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意义；深知我国医学科技的整体水平，同世界先

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深知作为一名军队外科医生，理所应当把提高为部队服务、为战场准备的水平和质量，作为不断努力的动力和方向。知识的危机感、创新的紧迫感，促使他放弃享乐安逸，加快前进步伐。现在，高龄的他，仍然坚持每周看门诊、教学查房，参与重大手术，每天加班加点工作。

坚持创新发展，不断勇攀高峰，是哥哥始终保持的一种精神状态。在漫漫人生道路上，他遭遇过政治上的坎坷，生活上的磨难，也遭遇过科研攻关的失败，但从没有灰心丧气、萎靡不振，始终坚持在医学科学领域的探索创新。正是在这种创新的奋斗中，他找到了前进的动力和生活的乐趣、获得了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成功经受了名利和进步的考验，抵御了现实社会物质生活的种种诱惑和侵蚀，保持了旺盛的思考力和创造力。

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行医，是哥哥对病人永远的承诺。作为一个老医生，他始终坚信并终身践行“医者最大的医德，就是要爱病人”。

他经常告诫学生，如果你的从医生涯中，从来没有过解决不了患者的病痛，就食不甘味、夜不能寐的经历；从来没有过半夜三更打电话到病房，查探患者病情的经历，就不是一个称职的医生。

在“潜规则”盛行的今天，医院也不是一座孤岛。但他始终强调，面对物欲、利欲的诱惑，医务人员一定要坚守道德底线，始终把病人利益放在第一位。在他的研究所，从实习开始，医护人员就被反复教育：每一个病人，该做什么检查、该用什么药、该做什么手术，必须遵循科学规律，必须符合病人实际，不要去考虑能不能赚钱。研究所不实行科室收入与医生奖金单纯挂钩的分配机制，药品收入占医疗收入的比重，严格控制在规定的范围内。

院士看发展、抒心声

——永怀感恩之心，牢记服务宗旨

60 多年光阴，只是历史的一瞬间，古老而又年轻的中国，走过了一段极其不平凡的发展道路；而对于个人的生命

历程，却几乎是全部，兄弟院士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祖国医学事业。

2007年，兄弟院士被列入中宣部“时代先锋”重大典型，在军内外广泛宣传，“特别讲政治、特别敢创新、特别重开拓、特别能奉献、特别守医德”的精神深深扎根。2009年5月，中央军委胡主席签署通令，给在科学技术研究中取得显著成绩的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副院长黎介寿、黎磊石院士记一等功。

抚今追昔，他们浮想联翩，感慨万千，而最急于表达的却只有两句话：永怀感恩之心，牢记服务宗旨。

黎介寿：我从24岁开始当医生，60多年了，个人的事业融入祖国医学事业的发展，不断求索，不断进步。刚离开校门，我只是一个不谙世事的普通学生，是各级党组织、各级领导，是周围一茬又一茬同事，是人民军队这所大学校，是军队医院这方高天厚土培养、帮助了我，使我成长为有一技之长的医学专家。

60多年的光阴，记录了个人成长的篇章，也见证了祖国和军队医药卫生事业壮大的光辉历程。

黎介寿：1948 年底，我衣冠不整地穿着一身蓝布旧学生装，站在当时中央医院（现南京总医院）的铁栏门前，一长串学子排着队等待填写实习医师登记表。昔日中央医院的头等病房，也就是我们今天的 39 病区普通病房。60 多年的变化今非昔比，今天医院的医疗设备和工作条件，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早已超过当时中国的最高水平，达到现在现代化的国际水平。当年能够在美国当实习医生的大夫，回国后就是一流学者专家，而今天医院的众多专家，都是长春藤医校、布朗大学等著名“洋学堂”的客座教授，中外医院共同承担培养学生的任务……这些在当年，是想都不敢想的。

兄弟院士有个共识，现在是他们从医 60 多年来最好的时光，这 60 年，是党和人民、是军队赐予的，这 60 年所取得的成绩，无一不根植于这个伟大的时代，根植于温暖的组织，根植于军队医院这方沃土。饮水思源，作为一个有良心的科技干部，一定要学会感恩，感人民的养育之恩，感组织的培养之恩，感领导的知遇之恩。

黎介寿：党和国家“四个尊重”的政策，给我们带来了事业上的春天，也带来了为之奋斗回报的崇高责任。我们的好

政策、好机遇，是各级组织给的；我们的好平台、好环境，是军区和联勤部、南京总医院给的，我们当以忠诚回报组织，以奉献回报人民。

2. 逝者长已矣，生者当自强

2010年3月10日早上，在上班的路上，黎介寿突然接到一个电话，“黎院长，黎磊石老师走了。”

是弟弟去世了，仿佛一声惊雷。黎介寿立即让司机调头去弟弟家。此时此刻，他的心里像是被一个铁棍击打了一样，很沉很痛。

这些年，他生命中三个重要的亲人都离他而去了。1989年6月，妻子程颖士走了。1999年8月，大哥黎鳌走了。现在弟弟又离他而去。

弟弟黎磊石相伴他的时间最长，从童年、青年、中年到老年，从小学到初中、高中、大学，到总医院工作，就一直

在一起，一辈子就没有分开过，他们相互鼓励，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可以说是互为你我、亲同形影。

医院把一幢小楼分给了他俩，西边是普外科，东边是肾脏科。他俩都在这里上班，共同追求着自己的事业。有趣的是，他们有太多太多的相似之处：上班在一个楼，住居也在一个楼，黎介寿住 15 层，黎磊石住 14 层；职务相同，一个是全军普外研究所所长，一个全军肾脏研究所所长，两人都是南京军区总医院的副院长；成就相同，都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专业技术特级。这么多相同，恐怕在全中国也找不到第二了。兄弟俩就像一对盛开的并蒂莲，在南京总医院鲜艳绽放。黎介寿自己感到这辈子很幸运，有这么一个伴随他一生的好弟弟，这是他的福气。可是，10 多年前黎磊石患了前列腺肿瘤，尽管病魔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但仍坚持自己的课题研究，把我国的肾脏病治疗提高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直到生命的最后的一刻。

走进弟弟的家，弟弟躺在那里，身上覆盖着白布。此时，黎介寿用手抚摸了一下弟弟的手，泪水一下子从眼眶中涌了下来。弟弟走了，真的走了。过去他来弟弟家时，弟弟总要

热情迎接，可现在他再也起不来了，永远地走了，连一句交待的话都没有跟他说。他忽然感到自己特别的孤独，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孤独。

2010年3月16日7时58分，黎磊石因患癌症长期医治无效，在南京逝世，享年84岁。南京市北京西路一处普通公寓，告别了它的一位院士主人，将“一切为了病人”的故事永远封存于此。

面对弟弟的逝世，黎介寿伤感而坦然，“无论对谁来说，死亡都是可怕的。面对死神，相信弟弟对生命也有着无尽的留恋，但他心中想的更多的是他的患者，他的事业。按照自然规律，人总有一天要走向生命的终结。那么，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生命的最大意义又是什么？这是每个人尤其是每一名共产党员必须搞清楚的大问题。人生有限，事业无限。逝者长已矣，生者当自强。我们应当把自己的生命融入工作，融入奉献，融入为患者服务的伟大实践，这样的人生才是最有意义的。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壮丽的生命得以延续，宝贵的生命得到永生。”

“为党的事业奋斗一生、奉献一生，这是我们三兄弟的约定。”黎介寿痛失胞弟，怆然泪下。

10月21日13时，根据黎磊石生前遗愿，他的骨灰被安撒长江，与他魂牵梦绕的事业与追求融为一体。而11前，黎鳌逝世后，他曾亲手将大哥的骨灰撒入滔滔江水。

轻风拂挽联，菊花寄哀思。黎磊石院士去世后，温家宝、习近平、李克强、刘延东、李源潮、徐才厚、蒋树声、桑国卫、梁光烈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发来唁电、唁函或敬献花圈和花篮。

弟弟的送别仪式，黎介寿没有参加，他把深深的伤痛和怀念埋藏在心底。而人民对黎磊石院士的爱戴在这个悲伤的季节里恣意蔓延。

在送别的人群中，有军地领导、有黎磊石生前同事，还有学生、医院代表和亲朋好友。近2000人胸前别着白花、手持黎老生平，在殡仪馆外排出数百米长的队伍，前来送别这位国际肾脏病学家、中国近代肾脏病学界的一代宗师和开山鼻祖。

“执着杏林大爱无垠终身不悔，刚直人生笑傲苍穹英灵走好。”

“英名誉中外，大医惠后学。”

“大医风范称楷模有口皆碑，磊石精神如皓月光照人间。”

“为苍生辛劳耕耘桃李遍天下，为科学淡泊奉献成果誉全球。”

幅幅挽联表达了社会各界的哀悼、痛惜、怀念之情。短短几日间，大量发自肺腑的纪念文章见诸媒体。社会各界人士 3000 多人自发来到黎磊石院士的灵堂，寄托无尽的哀思。

“中国走了一位大医，世界痛失一位白衣战士。”不少人一早就赶到殡仪馆，为的是送黎磊石院士最后一程。

“中国的医学事业，要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拥有一席之地；中国人要到国际上去开分店！”黎磊石铿锵的话语，至今仍回荡在黎介寿的耳畔。

安坐在弟弟曾经生活的公寓里，黎介寿的思绪又回到了 60 多年前，回到黎氏三兄弟同甘共苦、激情燃烧的岁月。

1944年，大哥黎鳌当上了中正医学院的外科讲师，接着又兼任总务长。当时，黎介寿和黎磊石正在读大学三年级。颠沛流离的生活、紧张劳累的学习，使黎介寿的身体越来越羸弱。黎鳌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果断把两个弟弟接到家中一起开伙，宁愿自己节衣缩食，也要抚育好两个弟弟。

大嫂汪素娟白天要上班，做饭的重任就交给了黎介寿和黎磊石。黎介寿全面继承了母亲黎周霞烹饪的技艺，轮到他做饭，全家人就有口福了。芥菜、藤藤菜等普通的蔬菜，到了他的手里，就变成了色香味俱全的佳肴。

透过弟弟的遗像，黎介寿仿佛又看到兄弟三人团坐火锅旁，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思绪又转回到1946年，黎介寿和黎磊石就要从江西中正医学院毕业了。六年级到南京实习时，当局规定，医学生都要着西装上班，正规上岗。

着西装、穿皮鞋固然潇洒，可黎介寿和黎磊石从小到大连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都没有穿过，更不用说西装和皮鞋了。

大哥黎鳌和大嫂汪素娟商量后，把家中唯一值钱的结婚戒指摘了下来，到当铺换了一些钱，为黎介寿和黎磊石各置办了一身西装。

黎鳌夫妇拎着西装兴冲冲地回到了家，却发现黎介寿和黎磊石身上穿着廉价的西装，手腕上戴着明晃晃的手表。黎鳌不知所以，厉声责问两个弟弟：“你俩不挣一分钱，这衣服和手表是从哪儿来的？”

黎磊石闭着嘴不说话，黎介寿的表情肌在微微颤抖，不敢正眼看他的兄嫂。看着两个弟弟苍白的面容，黎鳌恍然大悟：这两个愣头青一定是卖血去了！

得到证实后，黎鳌把手里的大包小包全掀在床上，气愤地说：“这个家再穷，也轮不到你们俩去卖血，要卖也得我去卖，介寿身体那么弱，攒这么血容易吗？你们马上就要实习了，把身体搞垮可怎么办啊……”

看着暴怒的大哥，流泪的大嫂，黎介寿和磊石像两个做错了事的孩子，吓得一声不吭。黎鳌默默地走到两个弟弟面前，把他们紧紧地搂在怀里，久久没有说一句话。

如今，那一身西装早已不在了，哥哥黎鳌、弟弟黎磊石也随风而去，化作一缕大爱无垠的忠魂。黎介寿突然想起他们三兄弟共同的约定：生，共饮长江水；死，共聚长江魂。

推开窗户，面向大江伫立，黎介寿喃喃而语：弟弟，安息吧！大哥已张开温暖的臂膀，在大江里等你。我们三兄弟曾立誓一生服务祖国和人民，我们是祖国和人民的儿子，我们的一生属于祖国和人民。人生终有期，未来，就让我们在滔滔大江中团圆吧。

主要参考书目

1. 江伯友：《大医院士》，2012
2. 高铭华：《兄弟院士》，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
3. 孙晶岩：《放飞的生命》，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
4. 相关新闻、文件资料